

目次

武夷文化研究

- 宋代建阳书坊出版再论 金雷磊 (1)
试论朱熹的君主观 周燕芝 (5)
武夷传统民居的构造特征解读 林超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

- 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路径
..... 陈维 (16)
内涵·逻辑·实践：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
三维探析 王季昆 (21)

社会·法律研究

- 流动夫妻的婚姻是如何走向不稳定的？ 刘琳 (26)
泉州市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对策研究
..... 刘佳丽，吕津，陈毅华 (32)
论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适用
..... 张阿妹 (37)
民法典编纂下关于人工生殖亲子关系的法律重塑
..... 李皎 (43)

文化·传播研究

- 文学翻译中原语文化预设与受众定式思维考量
..... 林佳佳 (49)
“非遗”将乐南词传承现状考察 唐进宝 (54)

武夷学院学报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210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5-1293/G4

第39卷 总第184期

2020年 第2期(月刊)

编辑委员会

- 顾问：付贤智 黄汉升 兰思仁
杨江帆 李宝银
主任：吴承祯
副主任：郑细鸣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道明 刘卫群 任宇红
许亦善 李宝银 李远华
吴承祯 陈锋 沈慧芳
杨昇 张品端 张志雄
张乔根 张国林 郑细鸣
姜景莲 姚进生 赵升云
郭翠莲 梁丽萍 雷能忠
廖斌

编辑部

- 主编：吴承祯
副主编：郑细鸣 沈慧芳 陈果
责任编辑：叶丽娜 冯起国 白琳
聂传朋 白晔 张文静
英文审译：魏景春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融合与构建：妈祖海外传播的多维文化力因素
 林 晶 (63)

浅析民国时期《闽北日报》广告语言特色
 吴 丹 (70)

旅游·经济

文旅业视阈下乡村科普资源空间格局及开发
 王光辉 (74)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研究
 魏佳思 (79)

高等教育研究

汉语俗语在留学生中级口语教学的考察分析
 杨鹤澜 (85)

MOOC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生自主性学习策略研究
 罗锦英 (90)

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基于安徽省6所高职院校的问卷调查
 魏 婷, 王东华, 田 荣 (94)

基于EGP和ESP学习策略的比较研究 陈紫娟 (98)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翁委凡 (105)

宋代建阳书坊出版再论

金雷磊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宋代建阳书坊出版图书数量多,内容广,传播远,号称“图书之府”。书坊有牌号可考者,就有三十多家,甚至有的还是出版世家,实现了编、刻、印、产、销的一体化。所出书籍有理学著作、书院和学校教材、科举考试复习备考用书等。书籍字体多为颜体和柳体,附有牌记,上图下文,图文并茂,具有图书封面观念。

关键词:建本;出版盛况;出版类型;出版风格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01-04

书坊出版,即书坊刻书,就是书商在所设书坊、书肆、书铺、书堂刊刻书籍。书坊出版一般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坊刻范围很广,内容上以民间日用的历书、字书、韵书、佛像、年画、通俗唱本最多;其次就是童蒙读物、医药书、占卜书、还有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类书、制艺(八股文)、试贴诗;也有一些名气较大的书坊刻印正经、正史和子集类书籍。宋代建阳作为当时全国三大出版中心之一,所出版的“建本”“麻沙本”,风格独特,独领风骚。其书籍传之四方,行销海外,影响深远。本文主要就目力所及范围内所掌握新材料,对建阳书坊出版业再作探讨。

一、建阳书坊出版盛况及原因

书坊出版是宋代福建图书出版的主流,据资料记载,仅建阳书坊有牌号可考的有余仁仲万卷堂、余彦国励贤堂、崇化书坊陈八郎书铺、虞平斋务本堂、麻沙刘氏书坊等三十多家,甚至出现了一些刻书家族。比如余氏书坊,从北宋就已经达到规模,叶德辉在《书林

清话》中评价:“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余氏刻书为当时推重,宜其流传之书,为收藏家所宝贵矣”。^[1]宋代余氏刻书又以余仁仲为代表,余仁仲生平无考,文士,绍熙年间,以“余仁仲万卷堂”“余仁仲家塾”名号刻书甚多。他还刊刻了很多经注本,有《礼记注》《公羊传解诂》《谷梁传集解》等,校勘精良、刻印精美。余氏所刻之书,为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宝,余氏书坊出版也是薪火相传,一直延续到清初,仍然一片繁荣。经营六七百年,时间长,刻书多,影响大,实属全国罕见。建阳余氏是古代福建最著名的刻书世家。蔡氏也是建阳刻书世家,代表是蔡琪的一经堂。蔡琪,字纯父,嘉定间刻《汉书集注》一百卷、《后汉书注》九十卷等。

实力雄厚的书坊出版产业已经拥有书版、刻版、印版和装订等工序环节的工匠以及营销人员,还拥有自己的编辑、校对队伍,甚至一些书坊主人还集编、刻、印于一身。实力较弱的书坊经营业务则以翻刻为主。福建书坊还大量接受来自省内外的官、私委托刻书。如咸淳三年(1267),建宁知府吴坚、刘震孙刻印祝穆《方輿胜览》,绍熙四年(1193),桂阳军学教授吴炎刻印《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等。

建阳出版的书籍上自六经,下至训传,坟籍大备,且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供举子课读及场屋夹带用的讲章类书籍,更是百倍于经史,出版书籍数量居全国

收稿日期:2019-06-14

基金项目:三明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A201806);福建
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JAS180446)。

作者简介:金雷磊(1981-),男,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论研究。

之首。据方勺《泊宅编》记载,在北宋元符、建中靖国年间(1098-1101),举子就已经知道“建本”,并能以此纠正杭州州学教授在出题时使用版本的错误。可见,北宋时期,建本就已经在全国各地传播。有些建本甚至传至高丽、日本等海外国家。

建阳书坊出版主要集中在麻沙和崇化两地,两地风景优美,景色怡人。南宋刘克庄《崇化麻沙道中》一诗写道:“经行爱此人烟好,面俯青溪背负山。半艇何妨呼渡去,小桥不碍负薪还。远闻清磬来林杪,忽有朱栏出竹间。此处安知无隐者,卜邻容我设柴关。”^[12]两地书坊林立,热闹非凡,又称“两坊”“书林”。南宋祝穆《方輿胜览》载:“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13]建阳出版的书籍又被称为“麻沙本”。“历史上,麻沙的声名远在崇化之上。但实际上,被称为‘麻沙本’的刻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崇化刻印的。由于麻沙、崇化两地相距甚近,刻书家之间交流频繁,故两坊刻本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刻本未署明刻印地点,实不易区分。因此,藏书家往往以‘麻沙本’‘建本’乃至‘闽本’统称之。”^[14]

建阳书坊之所以如此繁荣,既与当时建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又与当时的人文环境相关。可以说,宋代建阳的天时、地利和人和造就了商业性出版的繁荣。

其一,宋代建阳自然环境优越。建阳地处闽北,地理位置优越,是北上江西、浙江,南下闽南、广东的必经之地。同时,刻书所需物质条件完全具备。建阳地处江南丘陵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群山包围,山高林密,森林资源丰富,盛产松、柏、杨、柳、樟、枫、楠、梨、枣、竹等,其中樟、梨、枣是雕版所用优质材料,竹类品种繁多,可为印书提供丰富的造纸原料。建阳历来就是福建竹纸生产的中心,用于印书的竹纸,名“建阳扣”,当地人称“书纸”。松又是制作印墨的优良材料。书籍生产需要的竹木原材料能够就地取材,据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为图书出版提供优越的条件。

其二,宋代建阳人文环境浓厚。随着北方中原文化南移,地处闽北的建阳文风鼎盛。诞生和聚集了一大批本土和外地理学家与文人学士,如游酢、胡安国、胡宪、胡寅、胡宁、胡宏、李侗、蔡元定、蔡渊、蔡沆、蔡沈、蔡格、蔡模、蔡权等。这些理学家和文人学士的到来,带动了闽北地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刺激了建

阳书籍出版。宋代科举事业不断改革,考试更加公平,平民子弟有了上升的通道,建阳士子读书之风逐渐兴起,使得书籍市场繁荣。特别是一些应付科考的参考书,销量极大。事实证明,宋代建阳考中进士的人数在福建名列前茅。这与建阳书坊书籍出版活动密不可分。再加上北方战事频繁,建阳相对比较安全,为建阳图书出版提供了安全保障。

二、建阳书坊出版类型

建阳书坊商业出版者编辑与出版的图书主要有理学类书籍,学校教材,科举考试用书、时文范本等。这些书籍对于理学知识的普及和理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参加举业的举子应付科举考试提供了帮助。

其一,建阳书坊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是刊刻和传播理学书籍。比如“二程”著作就在如此: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究使杨公已侵板三山学宫,《遗书》《外书》,则庾司旧有之。乙未之火,与他书俱毁不存。诸书虽未能复,是书胡可缓?师耕承乏此来,亟将故本易以大字,与文集为一体,刻之后圃明教堂。赖吾同志相与校订,视旧加密,二先生之书,于是乎全。时淳祐丙午,古汴赵师耕书。^[15]

赵师耕淳祐间知泉州,提举福建常平司(庾司)时,看见过三山学宫本《二程文集》和庾司本《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二程遗书》《二程外书》因为火灾和其他书籍一起焚毁。赵师耕认为,其他书籍可以不再刊刻,但是,二程书籍刊刻与出版刻不容缓。于是,把《文集》《遗书》《外书》合三为一,重新编辑、出版。从标题“麻沙本二程先生文集后序”和“刻之后圃明教堂”来看,此书是在麻沙书坊雕印。

出版这些书籍其原因一方面宋代重科举,研读这类书籍是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另一方面是因为闽北作为朱子理学的发祥地,这类书籍拥有大量读者。同时,也是为了适应闽北书院发展的需要。书院文化、图书出版与理学传播关系紧密。据统计,两宋时期福建书院有85所,其中闽北44所,占全闽书院52%。这些书院绝大部分是朱熹及其后学所建,各地

朱子门人先后汇聚这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学术发展为图书出版与传播提供动力,而图书传播与普及又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的繁荣。许多当地文人,如袁枢、宋慈、叶廷珪、魏庆之、黄善夫、祝穆等,也参与到图书传播事业中来,他们都从事过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有的本人就是书坊主。文人和书坊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推动了建阳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书院师生是书籍出版业稳定的读者群,书坊出版书籍也是教学用书的主要来源。当时书院的办学水准较高,一般属于高等教育阶段,教学内容也多为儒家经典和理学。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其门人所注的《五经》,以及周、程、邵、张等理学先贤的著作都是书院教学的重要用书。

其二,书院师生自己的书稿、著作往往选择就近原则,在建阳书坊出版。如朱熹就曾经看到了书坊出版业的方便与快捷,他在《答黄商伯》中说:“《洪韵》当已抄毕,幸早示,乃此间付之书坊镂板,甚不费力。”¹⁶⁴在《答巩仲至》中,又说:“此间匠者工于剪贴,若只就此订正,将来便可上板,不需再写,又生一重脱误,亦省事也。”¹⁶⁴他们因此而形成了书坊出版业的作者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院师生既是书坊出版业的读者群,又是书坊出版业的作者群。书坊为传播闽学人物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印刷、出版的便利,也为闽学人物彼此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书籍媒介。理学思想通过书籍媒介得到传播,书籍媒介的广泛传播又扩大了理学思想的影响。

其三,建阳书坊还大量出版科举考试书和范文选本。如状元策、翰林馆课、八股时文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一些供夹带抄袭用的巾箱本,其内容专门是为了应付科考,这是建阳书坊出版的专利,官府和私家绝对不会这样来做。宋代注重教育,官学、私学并重。又大兴科举,以诗赋、经义取士。为了迎合广大学子求学、应试的需求,麻沙书坊还雕印了许多名人的范本投放市场,并对其诗文按照内容进行了分类,名曰“类编增广……”。如北宋刊刻的《类编增广老苏先生(苏洵)大全文集》八卷,南宋乾道年间刘仲吉宅刊刻的《类编增广黄先生(黄庭坚)大全文集》五十卷。这些文集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颇受市场欢迎。

当时全国好多地方还没有出版科举考试参考书等书籍,而民间书坊就已事先刊行,在民间传播。这一

方面表明书坊主敏锐的市场眼光,敢为人先,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另一方面也表明书坊编校成员对科举考试命题方向有所把握和研究,完全有能力编辑出版此类书籍。李淑在《应考试进士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奏(景祐五年正月)》中记载:

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臣以为朝廷崇学取士,本欲兴崇风教,反使后进习尚异端,非所谓化成之义也。况考校进士,但观词艺优劣,不必嫌避正书。至如近日学者编经史文句,别为解题,民间雕印,多已行用。考试之时,不须一一回避。其经典子书之内,有《国语》、《荀子》、《文中子》儒学所宗,六典通贯,先朝以来尝于此出题。只是国库未有印本。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所贵取士得体,司业有方,稍益时风,不失淳正。如允所请,兼乞编入贡举条贯施行。¹⁷¹

李淑的上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科举参考书的巨大经济价值,连官方都还没有意识到,而书坊主就已经嗅出了其广阔前景,提前刊刻,在知识分子当中广泛流传,既方便了举子应付科考,又为书坊主带来了利润,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作为当时出版中心的建阳书坊,更是如此。

官方对于民间流行的科举考试复习参考用书也持宽容态度,他们认为评价进士,只需要考察他们的“词艺优劣”即可,“不必嫌避正书”。《国语》《荀子》《文中子》等儒学所宗书籍,先朝以来经常围绕此类书籍出题,而国家学校竟然没有印本。于是,上奏请求国子监雕印颁行。

三、建阳书坊出版风格

建阳书坊出版业从诞生之初,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浙本”“蜀本”不同,具有鲜明的闽北地域特色,带有闽学家思想的印记。其独特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字体多为颜体和柳体,正文横轻竖重,小注横竖一样,多为细笔。如黄善夫刊刻的《史记》、《后汉

书》等,结构方正,笔画严谨,锋棱峻峭,瘦劲有力。当然,除了颜体和柳体外,还有其它字体。如黄三八郎刻本《钜宋广韵》就是仿褚遂良体,建本《周易注》《晋书》仿宋徽宗瘦金体。

二是刻有牌记。牌记又称书牌、刊记、木记,多出现在书名页、序文、卷末或目录之后,主要记录刻书时间、地点、书坊主姓名和堂号等。牌记有各种形状,如长方形、碑形、香炉形、钟形、炉形、亚字形等,或者没有边框随行书写。牌记既是一种版权保护手段,又是一种广告宣传形式。同时,也装帧了图书、美化了版面。

三是上图下文、图文并茂。建本多为正文配置插图,以图补文,图文并茂。这种形式可以让读者赏心悦目。历书最早将儒家经典配上插图的做法,就是在建阳书坊。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插图本《周礼》,就是南宋时期建阳刻本,有图三十六幅。其中有一幅《天子玉路图》,描绘的是周天子乘“玉路”出行,前呼后拥的情形,线条流畅,生动形象,充分体现了宋代版画艺术的进步和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曾经见过此书,他曾说过:“书坊印得《六经》,前有纂图子,也略可观。如车图虽不甚详,然大概也是。”^[8]再比如现存最早日用百科全书插图本《事林广记》,此书也是配有多幅插图,构图适合,其中《夫子杏坛之图》,表现了孔子率门下弟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动情景。

四是具备“封面”意识。朱熹淳熙十四年(1187)在武夷精舍编纂《小学》时,写信给刊刻此书的蔡元定道:“示喻箴法如此,甚平正简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别有意指也。试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阳多阴少,则终为阳者少;在少者阴多阳少,则定为阳者亦

少。乃阳贵阴贱,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小学》误字再纳去数纸,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学之书》可也。”^[9]可见,朱熹已经开始使用“封面”一词,“封面”意识萌芽。

宋代建阳书坊出版,主要以理学类书,教材和科考书为主,一般是比较通俗和畅销的书,也是能赚钱的书。“在政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系统中,坊刻不仅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10]建阳书坊出版在推进图书事业发展,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8.
- [2]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149.
- [3] 祝穆.方輿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181.
- [4] 卢美松.八闽文化综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369.
- [5] 赵师耕.麻沙本二程先生文集后序[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5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90.
- [6] 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764.
- [7] 李淑.应考试进士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奏[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29-230.
- [8]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59.
- [9] 朱熹.答蔡季通[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4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49.
- [10] 肖东发.民间坊刻与我国早期出版印刷业[J].编辑之友.1990(4):60.

(责任编辑:陈 果)

On Jianyang Bookshop Publishing in the Song Dynasty

JIN Leilei

(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 Jianyang bookshop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and a wide range of dissemination. It is known as the “House of Books”. There are more than 30 brands in the bookstore, and even some of them are publishing families, which have achieved the integration of editing, engraving, printing,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he books published include books on science, textbooks for colleges and schools, and books for review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book fonts are mostly Yan style and Liu style, with an inscription attached, the figure below, the picture and text, with the concept of book cover.

Key words: Foundations. Publishing grand occasion. Type of publication. Publishing style.

试论朱熹的君主观

周燕芝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朱熹君主观的本质是指朱熹理想状态下君主所具备的特征。朱熹的君主观是站在其作为“道统”继承人的立场上阐发的。他认为君主之形象应该是大臣民众的道德榜样;君主之职责则是识相用相;在君臣之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君臣之间“相亲一体”。朱熹君主观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良好的政治,于朱熹而言,君主之身份,是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合作人。

关键词:道统;朱熹;君主观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05-05

余英时先生在其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曾阐述了自己对朱熹君主观的见解,他认为朱熹理想中的君主是一个无为而治的虚君。君主只需要以“纯德”作天下之标准,并“选用一个好人作相”即可,其余的事情则由以宰相为首的众官员去做。^[1]笔者对余英时先生关于朱熹君主观的见解不完全赞成。通过翻阅朱熹关于君主言论的史料,笔者认为余英时先生的见解忽视了朱熹对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视,以及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朱熹执着于正君心,认为君主的职责是识相用相,除了实现君主树立“纯德”之标准的理想外,更深刻的原因是朱熹认识到君主在政治中所发挥的决定作用。此外,朱熹理想的君臣关系更是反映了朱熹对于君主在治理国家,实现良好的政治的重要作用和所处位置。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朱熹理想之君主,是树立纯德,是选用好人作相,但并不是一个无为而治的虚君。

一、君主之形象:道德榜样

“人君以其一身而立极之标准于天下也”^[2],朱熹

认为,君主应该以身作则,为众臣和百姓树立道德榜样。关于君主所树立的道德榜样内涵,朱熹做了详细阐述,其主旨是“顺天理、灭人欲”,即君主自身行为要符合天理,而“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3]在此原则下,君主的各方面行为皆达到以下标准,才能算是有德之君:(1)言语动作:“每出一言,则必反思之,此于修身得无所害乎?每行一事,则必反思之曰,此于修身得无所害乎?小而颦笑念虑之间,大而号令黜陟之际,无一不反思之。”^[4](2)皇室之私:“盖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妇之别严者……其齐体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采有德、戒声色、远技能者……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达,请谒不行者,家之齐也。”^[5](3)用人处事:“择端人正士刚明忠直,能尽言极谏者,朝夕与居左右,不使近习便利捷给之人得以窥司。”^[6]以上三个方面是在修身、齐家以及治国三个不同维度中对君主本人的道德要求。其中,修身乃是第一位,“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7],而又“修身之本在于正心”。因此,朱熹认为,使君主成为理想中有德之君的根本方法在于“正君心”,而他为实现这一理想,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8]由于朱熹在朝为官时间较少,向君主进言的机会也就较少。所以,朱熹会尽可能抓住可以为君主进言的机会,以向君主陈述正君心之说。例如,孝宗皇帝

收稿日期:2019-08-26

作者简介:周燕芝(1995-),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两宋政治思想研究。

即位后,诏求直言,朱熹便向皇帝上书,让孝宗正心诚意。再如,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受宰相赵汝愚推荐,被任命为秘阁修撰兼侍讲,此职位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可以早晚都入宫讲学,这对朱熹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几乎每天都会求见宁宗为其讲学,而所讲之内容皆是让君主正心诚意、修身以治国。朱熹认为自己力量甚微,他将正君心的期望也寄托在了君主身边的近臣。朱熹曾对宰相留正说“伏愿丞相试熟记之,而亟阴求学士大夫之有识虑气节者相与谋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见忠邪之所在……然后天下之贤可以次而用……”^[2],留正作为常伴君主的宰相,朱熹希望他能与有见识谋略的士大夫一起正君心,使君主成为有德之君,能善辨忠奸、用贤臣。

此外,朱熹还赋予古语“皇极”之新内涵,以作为衡量君主个人道德品质的标准。“皇极”是《尚书·洪范》中的一个概念,在朱熹之前,其主要含义为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的解释,“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4],是指一种抽象的治国之道。(其内涵较为丰富,但与朱熹“皇极”之义完全不同,由于和文章无关,故不多赘述。)而朱熹将其解释为“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2],即作为君主,给臣民作出典范并且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要求“既居天下之至中,则必有天下之纯德……无一些不善”^[2]。君主有纯德而无不善,正是“顺天理、灭人欲”的另一种说法。由此,“皇极”成为君主修身立政的要求,而“有纯德无不善”则成为衡量君主道德品质之标准。

试问朱熹为何认为君主之形象应为臣民的道德榜样,并且执着于实现君主成为有德之君这件事呢?文章分析有两点原因:(1)朱熹为道统之传承人。

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至于孔子,集厥达成,然进而不得其位以施天下,故退而笔以六经,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近世大儒,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2]

在朱熹看来,以周公为界,尧、舜到周初在位的上古圣君贤相皆是“德位兼备”,兼具“内圣”之德与“外王”之才的圣人,此时道统与治统合二为一,所以政治良好,

天下长治久安。自周公以后,道统中断,与治统相分离,内圣与外王不复合一,君主皆是有位无德之君。君主只有学习内圣之学,效仿上古三代之圣贤,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为臣民树立道德榜样,才可实现良好的统治。孔孟虽继承周公之学,但因未得到君主之位,只能著六经以传道统之学,而无法行道统之实。秦汉以来,孔孟之学中断,“而尧舜禹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2]直至韩愈重申孔子之学,河南程颢及其弟程颐始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由此,传承道统之学的责任便落在宋儒手中,以二程嫡传身份自居的朱熹自然也就成了道统之学的传承人。使皇帝成为有德之君则是传承道统之人的责任,所以朱熹认为君主应为臣民树立道德榜样,并执着于向君主进言“正君心”之说以实现其有德之君的理想,是在履行自己传承道统之学的责任。(2)朱熹认为君主有德、正君心是万事之根本。“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2]君主为表率,为臣民树立道德榜样,百官万民向君主学习,如此,每个人都有良好的道德,就能拥有良好的政治。

“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5],朱熹继承了董仲舒的观点,认为若君主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皆正。朱熹将君主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作为善政善治的先决条件,在君权至上的君主制度下,提倡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对君主行为的限制,君主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时不能出于一己之私,要顺天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君主暴政的实施。但另一方面,这种道德制约只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并未对君主行为产生实质性的限制,在遇到不顾道德束缚而一味使用强权独裁的君主时则会显得苍白无力。

二、君主之职责:识相用相

职责即是指任职者为履行一定的职能,所负责和承担的工作任务。文章使用职责一词,意在强调朱熹理想中君主所担负的职责、责任。再者,职责一词中包含分工的思想,即有君主之职责,则相对应有宰相之职责。这是朱熹君主观中的一大特点。

“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2],朱熹认为上至君主,下至百姓,人人各有其职。而君主的职责是“论相”,即任用贤能、正直有为的人才为宰相;宰相的职责则是正君心,矫正君主的错误,使君主成为有德之君。“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2]“苟当论相者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则人主失其职矣;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而以趋承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以容身固宠为术,则宰相失其职。”^[2]如果君主选用宰相时只按照自己的喜好标准去选用迎合自己的人而不选用能矫正自己过错的人才就是失职,而宰相一味的迎合上意,阿谀奉承,不去用孔孟圣学教化君主,则是宰相失职。

君主与宰相的职责是相互统一的。因为在朱熹看来,倘若宰相履行了其职责,以传承孔孟之学为主旨,以正君心为要务,就会使得君主成为贤明有德之君。相应的,贤明有德之君也会履行其职责,选用正直有为之才,以正君心。所以,只有两者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才能实现纲纪明体统正尊卑有序的朝廷,二者缺一不可。“君相、各尽其职,就可使朝廷上下有序,体统正而纲纪明。”^[2]对于实现理想中良好的政治,朱熹将宰相的力量也参与进来,而不再是只由君主一人之好恶所决定。这里蕴含着分工思想,即若将良好的政治作为一个目标的话,朱熹对任君主之职和任相之职的人分别给予不同的工作职责,倘若都能履行好职责,目标就可实现。

朱熹认为君主的职责是识相用相,既然是职责,即意味着如果失职,君主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是以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近习皆得以窃弄权威,卖官鬻狱,使政体日腐,国势日卑。”^[2]君主失职,未任用正直有为正君心之才为宰相,其左右近臣皆是玩弄权术卖官鬻爵之辈,则导致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再深一层,国势衰微就有可能亡国。而在世袭制下,君主亡国是最耻辱的事情。朱熹在这里给君主们敲响了警钟,告诫他们失职的严重后果和难以承担的责任。再进一步考察,为何朱熹认为君主的职责是识相用相呢?在朱熹看来,君主作为人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秦汉以来之君主,皆是有位无德之君。宰相作为常伴君主之人,若能常向君主陈述“正君心”之说,使

君主成为有德之君。如此,君主才能制定出利国利民的决策,才可实现良好的政治。另一方面,“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台者总于宰相,而宰相兼总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出政令”^[2],宰相作为官僚集团的首领,管理众职,对朝廷政事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只有选任良相以协助君主治国,才能政治清明,国泰民安。

朱熹将君主的职责限定于识相用相,进而突出宰相在实现良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增强的反映。因为在朱熹看来,君主应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共同治国。所以,君主选用怎样的宰相辅助其治国,将对国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例如:

神庙,大有为之主,励精图治,事事要理会过。是时却有许多人才。若专用明道为大臣,当大段有可观。明道天资高,又加以学,诚意感格,声色不动,而事至立断。当时用人参差如此,亦是气数舛逆。^[6]

在朱熹看来,神宗任用王安石还是程颢,会决定政治的走向,倘若神宗任用了程颢,将政事大有可观。于君主来说,选用良相贤相,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故朱熹将其作为君主所履行和承担的职责。这也是北宋以来文彦博、程颐等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在朱熹这里的延续和继承。

三、君臣之关系:相亲一体

分析朱熹关于君臣关系的思想,其本质是从另一种角度来审视朱熹的君主观。朱熹在君臣关系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主要是从君臣之间的日常相处方式以及君主与士大夫在治理国家时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这也只是自渡江后,君臣之势方一向悬绝,无相亲之意”^[6],朱熹在表达自己理想之君臣关系时是从南北宋两朝的差异出发的。他认为,与北宋相比,自渡江之后建立的南宋王朝,君臣之间上下尊卑严苛,没有了以往的“相亲”之意。“相亲”,一词中“相”,乃是指君臣之间相互、彼此的互动,“亲,与親义同,本义是父母……由本义引申指亲爱、亲密、亲近、直接接触、亲密

可靠的。”^[7]相亲之义即是说君臣在日常相处的状态上应该是亲爱平等、相互亲近的。而在治理国家方面,“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诚其意于堂陛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诚实、刚明公正之贤以为辅相,使之博选士大夫之聪明达理、直谅敢言、忠信廉节,足以有为有守者……”^[8]朱熹认为,君主要选用有才能之臣辅助以治理天下,而臣子则需要有德之君的赏识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二者相互依赖,君臣协作,共为一体,在君主对臣子的主宰和支配的基础上共治天下。因此,总结来说,朱熹的理想君臣关系则是君臣在平等相亲的相处方式下,以良好的政治治理为目标,二者相互依赖,共为一体,即“相亲一体”。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君尊臣卑思想的代言人,文章认为朱熹的理想君臣关系是相亲一体,这与以往的观点不同。但如果从宋朝建立以来之国情以及朱熹道统之学继承人的身份两方面分析,有理由认为“相亲一体”为朱熹理想之君臣关系。

宋太祖以武将之身份于五代乱世中登上帝位,为防止重蹈五代之覆辙,建国之初,便颁布了一系列严防武将叛乱的措施,并由此奠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宋朝以科举取士的方式广纳贤才,选拔官吏,使“士”阶层的政治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宋建国之初,太祖便定下“不杀大臣”的祖宗之法。有宋以来,君主与臣子的关系与以往之朝代有着显著的不同,司马光因变法之事与神宗在朝堂之上辩论、程颐坚决要求坐席在朝堂之上讲经、王安石与神宗的千年相知,这些皆是在其他朝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方面体现了君主对臣子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北宋以来君主与臣子在相处中的平等与亲爱。随着“士”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他们的自我主体意识也在加强。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胡安国、程颐的“君臣一体共治”,都反映了他们作为臣子,要参与政治,以天下为己任与君主一体共治天下的理想。而这,在王安石这里,也真正得到了实现。身在南宋一朝的朱熹,面对着高宗宠信权相秦桧而与众臣背离,君臣之间没有基本的信任的状况才会发出“自渡江之后,君臣无相亲之意”的感慨。

前文说到,朱熹认为周公之后的君主皆是无德之君,只有在传承道统之学的士大夫教化下,学习孔孟之学以正君心,才能成为有德之君。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的身份是帝王师,以引导君主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君臣之间应该是师生关系,师生之间的相处是平等、亲爱。而朱熹作为道统之学的传人自然也坚持这一观点。

“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缘是亲爱一体”^[9]。在朱熹看来,君臣相亲一体是事事做得成的主要原因,事事做得成,则最终所要做成之事便是实现良好的政治,可见朱熹理想的君臣关系最终指向依然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在现实的君臣关系中,王安石和神宗的相遇相知更是朱熹理想君臣关系的具体实现。“荆公初相,以师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礼甚厚。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辄改容,为之欣纳。盖自三代而后,君臣相知,义兼师友,了无形迹,未有若此之盛也。”^[10]君臣相知,王安石以师臣自居,这是相亲;神宗委王安石以重任,辅助其治理天下,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得君行道,这是“一体”。所以朱熹言道“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11]。

四、余论

朱熹理想君主的特征,是一个尊于道统并与臣子相亲一体,能为大臣百姓树立道德榜样的君主。其君主观的逻辑主旨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君主之形象,君主之职责以及君臣之关系,最终的指向都是实现良好的政治。在朱熹看来,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特征的君主,是实现良好政治的必然途径。

有宋一朝,臣子主体意识增强,他们认为,作为臣子其责任不再是为君主,而是为国家为天下。以朱熹为例,其君主观虽在言君,而其真正目的却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对孔孟“道高于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道统与君主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君主应服从于道统,“道”的实现,即作为最终之目的良好政治在现实社会的实现过程,君主这一身份在其中,是实现最终目的的凭借和依据。因此,于朱熹而言,君主的实质身份是其实现政治理想的合作人。至于后来,朱熹思想却成为尊君忠君的“官方”学

说,这与后世学者和统治者的改造与选择性使用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78-179.
- [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354,665,669,619,1620,631,1252,454,3454,572,1583,589,680,623-624,624,624,624,586,426,3034.
- [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8:9976.
- [4] 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49.
- [5]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1904.
- [6] 朱熹.朱子语类[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443,3012-3013,2997.
- [7] 胡培俊.常用字字源字典 常用字源流探析[M].武汉:崇文书局,2012:484-485.
- [8] 刘兆祐.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编年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7.

(责任编辑:冯起国)

On Zhu Xi's View of the Monarch

ZHOU Yanzhi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119)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Zhu Xi's view of the monarch is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monarch in Zhu Xi's ideal should have. Zhu Xi's view of the monarch is based on his position as the successor of "Confucian pedigree". He believes that the image of the monarch should be the moral example of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the duty of the monarch is to appreciate and appoint the prime minister; On the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official, Zhu Xi believes that it should be "intimate and mutual achievement". The ultimate goal of Zhu Xi's view of the monarch is to achieve good politics. For Zhu Xi, the identity of the monarch is a cooperative person who helps him realize the ideal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Key words: Confucian pedigree; Zhu Xi; view of the monarch

武夷传统民居的构造特征解读

林超

(武夷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地方传统民居作为地域传统文化之瑰宝,既是地方先民给予后人的珍贵遗产,亦是现代地域性建筑创作重要的灵感来源。主要从构造体系、材料语汇与细部装饰三大方面对武夷山地区传统民居的构造特征进行分析解读,一方面助力武夷山地区传统地域文化之研究,另一方面也为武夷山地区现代建筑的地域性创作提供素材。

关键词:武夷山;传统民居;建筑构造;地域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2-0010-06

传统民居是我国地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和发展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区域文化等多种地域因素密切相关。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绚丽多彩、姿态万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1]武夷山位于福建省西北部,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不但拥有奇秀的自然风光,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地方传统民居亦是风采动人,极具特色。本文主要以武夷山地区现存的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从构造体系、材料语汇与细部装饰三大方面对该地区传统民居的构造特征进行一定解读。

一、构造体系

传统民居的构造方式是当地居民在长期利用及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的智慧结晶,它凝聚着先人们世代传承的劳动经验与生活技巧,是体现建筑地域性的重要载体。武夷山传统民居主要以木构架体系作为结构支撑,以夯土结合砖石作为非承重的围护墙

体,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影响着建筑的外部形态。

(一)木构架体系

武夷山地区盛产木材,因而当地民居所采用的梁、柱、板等构件多以木材为原料加工而成,为典型的木构架体系。我国传统建筑的木构架体系主要有抬梁式与穿斗式两种。在武夷山地区,穿斗式木构架因用料节省、适应性强,被广泛用于山地、临河民居的主体及合院式民居的厢房部分。至于合院式民居重要的厅堂空间,一些年代较早的民居则多取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使用的做法,以获得高大开敞、内聚完整的空间效果。(见图1)与北方的传统抬梁式不同,这里的三架梁、五架梁没有直接顶在童柱柱头,而是插入童柱柱身,带有一定程度的穿斗色彩,故也有学者称之为“插梁式”^[2]。在木构架的挑檐做法上,武夷民居也颇具特色。年代较早的合院式民居往往采用斜撑式梁头进行挑檐,即在檐柱挑出的丁头拱上方设置大型板状的猫梁式斜撑,其上再加以一板斜向下的起拉系作用的小猫梁式插拱,两者交汇处则添加梁垫似的小插拱,从而稳稳地托起挑檐檁。^[3](见图2)而年代相对较晚的民居一般采取简单的梁头式挑檐,即不采用斜撑构件,将梁头直接伸出以托檐檁。

收稿日期:2019-07-08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JT180568)。

作者简介:林超(1986-)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



图1 武夷民居中抬梁式与穿斗式的混合使用

Fig.1 Mixed use between Tailiang system and through-jointed timber frames in Wuyi traditional dwellings



图2 武夷民居中的斜撑式挑檐

Fig.2 The overhanging eave with diagonal bracing in Wuyi traditional dwellings

(二) 围护体系

武夷民居的外围护体系以夯土墙体为主,墙基勒脚用块石或卵石垒砌,厚度为0.4~0.6米,外观粗糙却格外结实牢固,甚至可以历经百年而不倒。在一些村落中,不少民居的木构架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破败损坏,但其夯土外墙却能久经风雨而巍然屹立,表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至于讲究一点的合院式民居,其外墙或砌空斗砖墙,或采取当地特有的三段式墙体。这种墙体分上、中、下三段,分别由不同材料组合而成。下段墙基由于直接接触地面,最易受潮,故采用不惧水的卵石垫底,其上再加实心青砖或条石,以有效隔绝潮气。中段为墙身的主要部分,采用掺有碎瓦、碎瓷片、细石砾的黄土夯筑,高度可达2~4米。墙体上段砌空斗砖墙形成压顶,其上覆瓦,避免雨水从上部侵蚀墙体^[4]。(见图3)在建筑内部,武夷民居多采用编条夹泥墙作为分隔墙体,即在柱与梁枋之间填充以竹篾编制而成的薄壁,外抹草泥,有条件者再粉以石灰,使墙体更加美观大方。另外,山地或临河的吊脚楼民居

一般以杉木板直接作为内外墙体,施工便捷,易于拆改维修。(见图4)



图3 合院式民居的三段式墙体

Fig.3 Ternary form wall for courtyard dwellings



图4 山地吊脚楼民居的杉木板墙体

Fig.4 Fir-planked wall for pile dwelling in Mountain Area

二、材料语汇

武夷山地区自古以来山林茂密,交通不便,所以当地居民大多就地取材,巧妙利用地方材料来营造房屋。这些地方材料的运用不但满足了建筑的使用功能,丰富了建筑的表皮肌理,而且也赋予了建筑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人文气息,是当地建筑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 土

在武夷山地区,黄土是最容易得到、最为经济的建筑材料,由生土夯筑的墙体坚固耐久,热惰性好,既可防寒又可隔热,所以在民居中得到普遍使用。具体施工时先将高为1.5米左右的木模板依据墙体厚度两边立好,然后将黄土分层放入夯实,并掺入碎瓦、碎瓷、石砾等骨料以提高墙体强度,夯好一板后再向上移动模板,一板一板地夯筑。夯几层后还要放入一些松枝或竹篾来加强上下层之间的拉结力度,使土墙形成坚实的整体。待墙体全部夯好以后,需用特制的木拍对墙面进行补平拍实,以达到使用要求。^[5]这种夯土

墙表面一般不加粉刷,裸露出骨料及夯板留下的斑驳肌理,粗犷质朴;木模板的板缝交接处也同样留有明显的施工痕迹,颇有现代建筑“粗野主义”的风采。(见图5)



图5 夯土墙

Fig.5 Rammed earth wall

(二)木

武夷山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尤其盛产杉木。杉木树干直、重量轻,结构性能优异又易于加工,且还具有耐腐蚀性好、天然防虫等优点,是极其理想的建筑材料。武夷民居的大木构件均以老杉木为原料,楼板、门窗及隔扇等也多用杉木板,甚至有一些房屋除了屋面覆瓦、墙基垒石以外,其余部分都由杉木制作完成。这些木构件大多不施油漆,完全暴露木纹,充分展示出木材的本性。每逢春节,当地居民用清水对杉木墙壁及地板进行擦洗,令其表面愈发质朴洁净,呈现出一种自然舒适的居家气息。(见图6)



图6 建筑主体全由杉木建造的临街民居

Fig.6 Frontage dwelling with main body of building constructed by fir plank

(三)砖

作为一种常见的人工建材,砖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使用历史。在明清时期的武夷山地区,不少返乡的达官贵人及富商豪绅在建造房屋时普遍采用空斗砖墙代替土墙作为建筑的围护结构,借此炫耀乡里。这些砖墙一般使用青砖,以当地黏土烧制而成,因多了一道浇水冷却工序而使外表呈现青灰色,显得内敛素雅,颇具书卷气息。(见图7)与土墙相比,砖墙的防水防潮性能更好,而且可以通过预制、拼砌与雕刻的方

式打造出精美的装饰图案。整段砖墙多采取斗砖和眠砖组合砌筑的方式。眠砖又大又厚,主要用于墙体底部,常见砌到1米多高,有的则更高些,依整堵墙高而定。眠砖的上部砌空斗砖墙,即用厚为3厘米左右的薄砖围砌形成盒状,盒内中空或者填以碎石泥土,顶部再叠涩出挑形成墙檐或墙头。除了用作墙体之外,砖还广泛用于院内铺地。地砖比斗砖略厚,多呈方形,主要铺于厅堂、走廊等处。讲究一点的还将砖料细致打磨,使其尺寸精确、各面平整,铺设完后再施以桐油浸泡,令整个地面更加整洁美观、坚固耐用。^[6](见图8)



图7 青砖墙体

Fig.7 Grey brick wall



图8 方砖铺地

Fig.8 Square brick on the ground

(四)石

武夷山地区群山连绵,溪壑纵横,石材资源极其丰富,其中花岗岩与卵石在当地民居建造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花岗岩质地坚硬,耐候性好,可以加工成各种形状,但开采不易,故一般只用于建筑的重要部位,如台基、柱础、天井、檐阶、大门等少数几处。部分石作雕有精美的纹饰,在保证经久耐用的同时起到了极好的装饰效果。相对于开山采石的艰辛,下河取石则较为容易,因而武夷居民对河中卵石的运用则更为普遍。武夷山地区潮湿多雨,多数居民通常采用大块卵石干垒成墙基,以避免上部的夯土墙体受到地面潮气的侵

害。由于卵石形态不一,表面光滑,要让干垒的墙基保持稳固其实并不容易。民间工匠凭借多年的操作经验,有选择地将不规则的卵石进行“人”字堆垒,使墙基的卵石下大上小,两端大中间小,从而保证了墙基的坚固,在视觉上也给人牢靠稳定、自然齐整之感。有些山地及临河民居则采用当地块状的红砂岩毛石作为墙基勒脚,使墙体上下产生了质感与色彩的双重对比,极大地丰富了建筑外墙的肌理效果,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时间一久,有的石缝间还长出青草野花,更显得野趣十足,生机盎然。(见图9)除了堆垒墙基外,不规则石料还被普遍用于铺设路面。若路面较窄,一般在路面中间用一列大卵石,两侧填以小卵石。若路面较宽,或在中间用两列大卵石或条石,两侧填以碎石,主从分明,引导性佳;或每隔一定距离用卵石在中央铺出各式图案,美观大方,富有趣味。^[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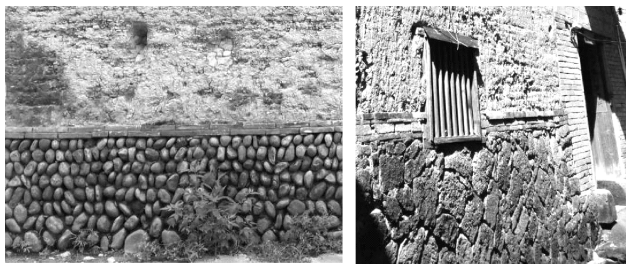


图9 卵石、红砂岩毛石在武夷民居墙基中的运用
Fig.9 Application on pebble and red sandy rock rubble
in wall base of Wuyi dwellings

(五)瓦

武夷民居的屋顶多以悬山双坡为主,屋面覆以当地常见的小青瓦。(见图10)这种瓦片由当地黏土烧制而成,断面呈拱形,弧度较小,规格约200毫米见方,颜色因烧制后的焖窑工序而呈青灰色,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色差。它虽然只有一种形式,但排铺灵活,集底瓦、盖瓦、脊瓦于一身,施工十分方便。排铺时先将底瓦直接摆在椽上,然后按一反一正即“一阴一阳”的规律从屋檐向屋脊方向铺叠,其间不施任何灰泥。待铺至屋脊处时,则将瓦片垂直于坡面横向排列,重叠数层后再用青砖坐灰压牢,两端略为垫灰起翘。檐部一般不设滴水与瓦当,经济实用,质朴大方。除了常规的小青瓦外,也有些大户人家还使用其它样式的特制瓦片,如底瓦采用陶土色的窄口长条瓦,马头墙墀头两侧采用波浪形盖瓦等。(见图11)



图10 小青瓦屋面

Fig.10 Grey tile roof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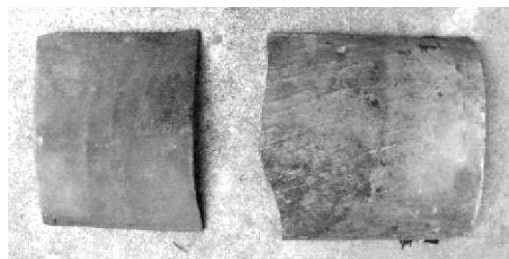


图11 小青瓦与长条底瓦

Fig.11 Grey tile and strip concave tile

三、细部装饰

武夷民居的细部处理,有其固有的传统做法及地方色彩,直接反映了当地居民的审美倾向与居住文化。这些细部处理影响着建筑造型艺术的完整表达,对武夷民居的风格形成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当地最为精湛的建筑装饰工艺。武夷民居别具特色的细部处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门窗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在他所著的《道德经》里就有对门窗的记载:“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8]户即门,牖即窗,可见自古以来门窗便是一栋建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住宅的入口大门是人们进出建筑时视线最为集中的地方,代表了一座房屋的脸面,象征着房屋主人的身份与地位,往往成为人们极力装饰的对象,武夷民居也不例外。在武夷山地区,合院式民居多设有精美华丽的入口门楼或门罩,与简洁的外墙形成了强烈对比。门楼以牌楼式为主,也有单间及八字形的,且多为青砖制成的仿木形式,其上精雕细刻,美轮美奂。砖雕技法以浮雕为主,也有透雕、线刻等,内容常选用花草鸟兽、神话传说、戏曲传说等寓意美好的题材,是精湛建筑工艺同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具有极高的建筑艺

术价值。(见图 12) 民居内部的门窗以隔扇的形式为主,虽然不及入口门楼那么庄重气派,但其利用木材镂空或者拼接而成的隔心窗花同样精彩纷呈。年代较早的隔心图案相对简洁,常见横竖直棂,如方格、斜方格、井口等,轻快明晰,落落大方。年代较晚的则更加复杂华丽,除了方胜、盘长、万字、亚字、回纹等纹样外还结合大量精美木雕构成整体图案,生动活泼,构思巧妙,显示出民间匠人高超的艺术水平和卓越的创造能力。(见图 13)



图 12 武夷山下梅民居入口门楼

Fig.12 Gates at the entrance of Xiamei ancient dwellings in Mount Wu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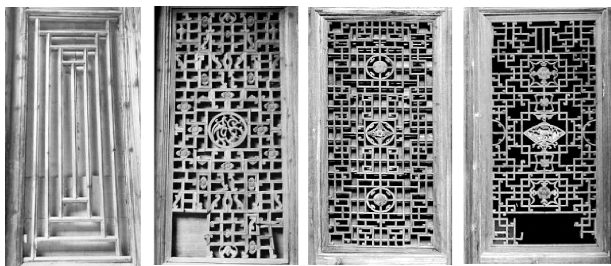


图 13 武夷民居木隔扇窗花

Fig.13 Window grille of wooded partition door in Wuyi dwellings

(二) 檐部

视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对形的注意力往往在于形的边缘。我国古代匠人很早就掌握了这一视觉规律,常常将建筑的檐部作为细部刻画的重点部位。与福建其它地区常见的插拱式挑檐不同,武夷民居的屋檐下方一般采用斜撑构件代替斗拱。这些斜撑构件经过当地工匠的巧妙加工,顿时便有了灵气。有的将撑木外形做成柔美的云状,上刻卷草花卉;有的将撑木外形做成动物形,其中以简化的鳌鱼最为常见;有的大户人家为了增强斜撑的装饰效果,干脆将它扩大成三角状的牛腿,其上更是雕满花草鸟兽、人物故事,堪称木雕精品。除了精致的斜撑外,挑廊吊柱亦是武夷民居檐部的一大特色。吊柱的柱头受法式规范影响较小,造型简炼,花式繁多,有方形、圆形、八角形、葫芦形、花篮形等。有的一排吊柱甚至一柱一样,随机变

换,使建筑的细部造型更加丰富多彩,充满趣味。(见图 14)



图 14 武夷民居檐部下方的挑廊吊柱

Fig.14 Overhanging corridor davit beneath the eave of Wuyi dwellings

(三) 梁枋

在木构传统民居中,木梁枋不仅是建筑内部主要的结构构件,而且亦是建筑室内装饰的集中之处,其装饰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对梁架的整体形态进行加工塑造,最常见的做法便是把原本平直的梁身加工成略显弯曲的“月梁”,以减少规整梁架带来的呆板之感。武夷山地区的月梁一般两端不下弯,只将梁下面的中央部分向上略微凹起,即起到了减少笨拙呆板之作用。二是在梁枋上施以雕刻及彩绘。福建盛产木材,其木雕技术在全国享有盛名,历史悠久。在武夷民居中,多数梁枋只在左右两头做木刻装饰,基本上均以优美的曲线为主,或刻成波浪形,或再加以植物花草纹饰。讲究一点的除了梁枋的两头以外,还在其两个侧面的中央部位精雕细刻,巧妙利用繁简的对比来突出重点,起到了事半功倍的装饰作用。(见图 15)至于财力雄厚的大户人家,则往往对厅堂的主要梁枋雕梁画栋,令整个厅堂豪华大气,富丽堂皇。



图 15 武夷民居梁枋细部

Fig.15 Details of wooden beam in Wuyi dwellings

(四) 柱础

传统民居中的柱子一般都设有石质柱础,一来可将木柱与地面隔开,使其免受潮气的侵蚀;二来可令木柱承受的荷载均匀地传至地面,使柱子更加坚固耐久。在武夷民居中,柱础多由花岗石制成,其式样变化

也极其丰富。年代较早的民居可见典型的覆盆式柱础,简洁敦实。年代较晚的民居则采用复杂的礲墩式柱础,一般上下有枋,中部主体截面主要有方、圆、六角、八角等类,其上石雕精美,尤以厅堂之柱最为突出。有的把整个柱础外形刻成花篮状或南瓜状;有的则以凹凸有致的线脚及纹饰进一步划分纵向层次,显得层次丰富、典雅优美;有的还在柱础的各个面上用浅浮雕刻出寓意美好的吉祥图案,且这些图案往往无一雷同,令人们可以仔细地观赏玩味。此外,笔者还发现武夷山不少民居采用木质柱础,横向木纹放置以防潮气上升,这种直接将木榫发展成木柱础的做法较为少见。(见图 16)



图 16 武夷民居木质柱础

Fig.16 Woody column base of Wuyi dwellings

四、结语

武夷山传统民居是武夷先民于特定地域环境下的匠心之作,其建筑构造不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而且具有极高的建筑美学价值,集中反映了该地区一定时期内建筑的地域性特征。本文主要从构造体系、材料语汇与细部装饰三大方面对武夷山地区传统民居的构造特征进行了一定解读,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武夷民居的构造体系主要由作为结构构件的木构架

和作为围护构件的非承重墙体共同组成,其中木构架的特色为抬梁式与穿斗式的混合使用以及猫梁式斜撑的挑檐构造;围护墙体则以石、夯土和砖自下而上构成的“三段式”墙体为主要特色,具有很强的建构逻辑。二是武夷民居在材料运用上广泛采用土、木、砖、石、瓦等乡土材料,充分体现就地取材、因材致用的构造特色。三是在构造细部方面,武夷民居体现出地方匠人创意丰富、精湛高超的建筑装饰技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门窗、檐部、梁枋、柱础等处的细部处理。武夷传统民居底蕴深厚、魅力独特,希望能够通过本文的抛砖引玉,助力武夷山地区传统地域文化之研究,并为武夷山地区现代建筑的地域性创作积累素材。

参考文献:

- [1] 李俐,马瑞亚,吴文捷,等.中国传统民居[J].中国住宅设施, 2012(4):9-11.
- [2] 孙大章.民居建筑的插梁架浅论[J].小城镇建设,2001(9):26-29.
- [3] 张玉瑜.福建民居木构架稳定支撑体系与区系研究[J].建筑史,2003(1):27-28.
- [4] 关瑞明,吴钦豪.武夷山地区建筑创作中的地域性表达:以武夷山庄与九曲花街为例[J].华中建筑,2015(10):153-156.
- [5] 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05.
- [6] 柯培雄.闽北名镇名村[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108.
- [7] 楼庆西.乡土建筑装饰艺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02.
- [8] 老子.道德经[M].陈忠,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19-20.

(责任编辑:陈 果)

Interpretation 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uyi Traditional Dwellings

LIN Chao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As a precious treasure for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local traditional dwellings are not only valuable heritage bequeathed by local ancients, but also signific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creation of modern regional building. The paper mainly makes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Mount Wuyi Area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system, material vocabulary and detailed decoration.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assists the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Wuyi Mountain Area.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materials for the regional cre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this area.

Key words: Wuyi Mountain; traditional dwellings; building constructi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路径

陈 维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 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通过探析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有效的宣传教育以及少数民族干部作用的发挥等路径来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论述, 推进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大众化, 形成中华民族民族观共识, 使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画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关键词: 习近平; 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 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2-0016-05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并通过理论宣传、政策落实、战略部署等方式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大众化。毛泽东时代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主题, 推进民族团结理论的大众化, 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热情;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民族法制思想、江泽民民族问题理论及胡锦涛时期“中央民族工作十二条”为主要内容, 继续推进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大众化, 使各族人民深入了解党的民族政策, 形成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全国各族人民也处在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

中, 正在从事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来指导, 这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 一旦被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因此, 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 就有了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路径、推进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大众化的必要性。只有实现了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大众化, 才能形成中华民族民族观共识, 各民族人民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共画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一、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是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路径的重要前提

长期以来在民族团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和认识, 首先就是对中国特色民族团结发展道路不自信, 甚至否定或怀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认为在当前民族团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及台独势力的发展, 皆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催生下的民族独立意识、领土

收稿日期: 2019-11-26

基金项目: 2018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基层教研室示范项目(2018jyssf016); 2017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重大项目(2017jyxm0635)。

作者简介: 陈维(1966-)男, 汉族, 副教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意识的产物。这种无视中国历史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历史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及其有害的,如果任其发展不仅对各民族人民思想造成混乱,而且还会对民族团结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进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性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就很难守得住。”^[2]对思想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是能否把牢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支配权、管理权进而掌握领导权的关键,也是保证各民族人民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统一的关键,更是挫败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思想的关键。

在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路径的过程中,要始终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和掌握,让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核心理念的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团结理论武装各族人民头脑,把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筑牢各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实现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6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是将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各民族团结统一、兼容并蓄、相互依存、相互亲近的民族关系体现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伟大实践中。表现在各民族人民的精神层面就是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断增强各民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3],这五个认同关涉各民族人民思想、情感、价值、文化、制度的认同,有利于各族人民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突出表明了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民族团结理论创新的品质,也是进一步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

论述路径的重要前提。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路径的现实基础

由于历史发展、自然地域环境的差异等各种原因导致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国家总体发展水平,这种差距的客观存在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的。邓小平曾强调,“如果民族发展悬殊,民族矛盾就会发展,社会就可能出乱子。”^[4]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就没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就会延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因此,习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一个不能少”。

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路径,实现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大众化,必须着眼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实际,当前必须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机结合起来。把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路径与新时代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时代课题相结合,做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就必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切切实实获得物质利益的满足,进而在精神层面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把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和政策内化为价值观、外化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自觉行为,成为化解民族矛盾、解决现实民族问题的关键。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切实解决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

不足、生存条件落后、生活保障缺乏等实际问题,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民生,让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中得到实实在在的保障,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变化中感受到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温度,打心里拥护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和政策,有力地推进了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大众化进程,提升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实践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证明,各族人民对党的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的理解和接受,无不与这一理论和政策所带来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分不开的。实践也再次证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路径的现实基础。

三、科学有效的宣传教育是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路径的重要环节

科学有效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关乎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有利于化解民族矛盾、解决民族冲突、增进各民族人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互相关爱,也是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路径的重要环节。随着各族人民交往的日益频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交融格局业已形成。因此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仅要面向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而且还要对非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进行教育。这既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要求,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国界线长,其稳定和团结涉及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少数民族地区物产丰富资源多样,其和谐与进步有利于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向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进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理解和接受党的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极其重要。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多、社会文化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有差距,这种差距和差异造成的民族社会心理不一

样,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进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能千篇一律,要分析不同民族的不同社会心理,寻找到与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价值相符的结合点,尽可能使用各少数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能停留在空泛的口号式上,要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人民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既要突出各少数民族人民历史上在抵御外辱、保家卫国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中的历史贡献,更要突出各少数民族地区在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中取得的丰硕成果。用典型的事例、能感受得到的社会生活变化去增强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自豪感、获得感,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进而发自内心地接受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新理念新思想。

中华民族是多元统一的民族,汉族在多元中的优势是显然的,因此,只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而忽略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宣传,就会造成汉族的优越感,大汉族主义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对国家的统一危害极大。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非常强调56个民族要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交融,实际是在着重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与整体的统一。对非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宣传能更好地突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让每个民族人民都能明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使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中所阐述的中华民族“多”与“一”思想深入人心。民族学家费孝通曾经说“现在汉族没有或很少有压迫少数民族的心理,但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的心理在汉族中是存在的,这一点汉族不容易感觉到”^[9]。因此,面向非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进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能有效的消除汉族对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历史、文化、风俗以及宗教等的漠视态度,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民族观,营造社会和谐的氛围,促进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当前迫切需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让非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了解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时代背景、

理论意义和地位,通过“扶贫工作”、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以及吸引大众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等举措,真实体验到民族情感,培养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认同感。

四、少数民族干部作用的发挥是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路径的关键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在民族政策方面有许多独到的精辟论述,如何使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其理论大众化的重点。少数民族干部是党与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情感关系的纽带,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确保落实党的政策不走样、无折扣的执行者,更是发挥党的政策效率的开拓者。因此,发挥好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对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路径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农业、牧业、旅游等产业,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但与此同时社会文化、人的思想呈现多元化,这样的局面不加管理和控制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团结和稳定的。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要求,把“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的情感特别真诚”^⑨作为新时代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突出了少数民族干部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作用,更突出了少数民族干部在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及台独势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干部责任重大,在各自的工作中按照“三个特别”的要求,带领本民族本地区人民发展,保持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在中华民族大背景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施党的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可以确保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深化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加快本区域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符合“三个特别”要求的少数民族干

部本身就是优秀的人才,他们既了解熟悉本民族内部的事务更具有过硬的政治素养,有利于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方法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读党的民族政策,方便少数民族群众理解和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干部不仅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而且在反民族分裂、反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实践已经并将再次证明,发挥好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是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路径的关键。

在新时代要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努力践行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论述的路径,继续推进党的民族团结理论大众化,发挥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使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化解民族矛盾,增加各民族间的了解和信任,凝聚人心共画民族团结同心圆。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13
- [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等分别看望政协委员并参与讨论 [EB/OL].(2014-03-05)[2019-07-12].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305/c64094-24529100.html>.
-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 [5]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一届至第九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文件资料汇编 [G].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1974.
- [6] 中国网新闻中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EB/OL].(2014-09-30)[2019-08-12].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2014-09/30/content_33657111_3.htm.

(责任编辑:冯起国)

Practice the Path of Xi Jinping's Discourse on National Unity in the New Era

CHEN Wei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Department, Wuhu Voc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Wuhu, Anhui 241003)

Abstrac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unity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opaganda education and its role in minority cadr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actice Xi Jinping's exposition on national unity in the new era,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party's of national unity, form the consensu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n this paper hopes to make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draw a concentric circle of national un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work together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of the great Chinese dream.

Key words: Xi Jinping; national unity in the new era; popularization

内涵·逻辑·实践：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三维探析

王季昆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就文化自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面临的众多问题。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生成逻辑,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其历史逻辑,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其理论逻辑,新时代文化建设是其必然要求。坚定文化自信,要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实践向度入手,筑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基。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自信;内涵;逻辑;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21-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就文化自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实践向度,是新时代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一、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文化自信不是一个抽象的一般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科学性的认知。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把握好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

(一)文化自信的内涵

自信本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是描述人在适应社会过程中的一种自然心态。自信不是自傲、自大,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态度。在《当代汉语词典》中,自信解释为“相信自己,信

任自己。”^[1]在英语语境中,自信释义是对自己已具备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没有质疑。^[2]通过中西两种文化对自信释义的对比,二者都是承认人对所持观点和所具备能力的肯定性评价。当自信的对象指向文化,就构成了文化自信。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3]文化自信不是文化与自信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自身文化。

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进步发展的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而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价值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内容,因此,文化自信的核心就是价值观自信。

(二)文化自信的本质特征

文化自信不是依仗传统文化优势,倡导文化复古的盲目自大;也不是凭借国家实力,奉行文化霸权主义;而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用理性心态看待自身文化,要正视自身文化的优势与不足。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收稿日期:2019-11-15

作者简介:王季昆(1994-),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进文化。”^[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出了文化自信的本质特征。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有机整体的自信。这三种文化一脉相承、生生不息,贯穿于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万里长城,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简单并列,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三者的有机合一,为文化自信支撑起雄伟大厦,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二、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扬,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懈追求。因此,形成了极具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

(一)历史逻辑: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延绵至今且从未中断的文化,在世界发展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两汉时期,长安城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唐朝时期,唐三藏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等特产通过古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峰,独特的哲学思想、价值追求、道德操守和人文精神不仅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许多国家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梦想,一直是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我们又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6]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形成了红船精神、抗日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等宝贵的民族精神,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丰厚的精神滋养。

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地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文化自信深厚底蕴和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

(二)理论逻辑: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扬

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理论逻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关于文化的能动性理论、人是文化的核心和主体理论以及世界贸易带来世界文化理论等相关论述,是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逻辑。

1.文化的能动性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后,又强调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能动作用。这就告诉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建设,更不能忽视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中的协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中尤其强调文化建设。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7]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是对文化的能动性理论继承和发展。

2.人是文化的核心和主体理论

人民群众是文化的核心和主体,人类社会的文化无论如何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和价值旨归还是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像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8]文化能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从而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对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解放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习近平在人是文化的核心和主体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文化自信。

3.世界贸易带来世界文化理论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深刻阐述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必然带来世界文化,科学预测出了文化发展方向和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9]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是对马克思世界文化理论在当代最好诠释。

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文化

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现实逻辑: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0]道路自信是保证,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实现途径,能够“定标”。理论自信是基础,是坚定“四个自信”的行动指南,能够“定向”。制度自信是关键,是坚定“四个自信”根本保障,能够“定心”。文化自信是支撑,是坚定“四个自信”的精神力量,能够“定魂”。文化的思想是最深邃的、意蕴是最厚重的,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就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新时代激励我们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世界前列,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提高,中国也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需求也发生转变,新问题也随之开始出现;随着中国逐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思想文化领域面临诸多的挑战。一方面,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碰撞,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点,“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观”等论调粉墨登场,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此起彼伏,给我国文化安全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文化自信,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词。

三、文化自信的实践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11]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深刻阐释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三重向度,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的努力方向。

(一)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不能或缺的。中华文化对所有中华儿女都具有规范、协调和凝聚的作用,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更是我们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压舱石。新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弘扬和继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

1.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要用好这门看家本领。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本方针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区别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守护好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一些误解,做好发掘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厚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滋养,筑牢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

2.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进去”,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人文精神融入每一个中华儿女血液中去,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重要一部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立场和拓宽“走出去”渠道,利用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3.传承中国红色文化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代我们要推动红色文物“亮出来”,保护好红色文物,做好发掘、展示、讲述、弘扬红色文物的工作。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要做到对红色资源情况“心中有数”“井然有序”“推陈出新”。让红色文化成为坚定文化自信最亮丽的底色。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坚守中华立场,立足中国实际,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吸收外来:坚持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

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2]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

完全封闭、与世隔绝,都需要从别人文化中汲取营养。

1.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

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家、民族和文明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世界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顺应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和潮流,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和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积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优秀成果。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积极参与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对话,紧紧依托平台主动设置议题,更好引领舆论,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到并听清楚中国声音,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创造良好氛围和环境。

2.要有辩证取舍的态度

开放包容并不是全盘西化、崇洋媚外,更不是盲目地学,一切照搬和机械搬运。外来文化也是良莠不齐、五花八门的,甚至会存在一些低俗、反动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必须要有分析、有批判、有比较、有鉴别。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进行去伪存真和去粗取精,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和好的东西。中国在艺术形式上也应当“标新立异”,但在“标新立异”时,最重要的是中国和外国要有机的结合。文化要在交流互鉴中才能繁荣发展,对待外来文化,我们要以我为主、科学对待、批判吸收。

3.要有转化再创造的能力

与不同文化进行交流互鉴,最终目的还是为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要的是实现中国化。一是要把优秀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华文化要素,打上中华文化烙印;二是要优秀外来文化与中国实际需要结合起来,解决我们现实问题,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三是要把外来文化与中国人接受习惯结合起来,创造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的表现形式。

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既需要不忘本来、植根铸魂,也需要吸收外来、交流互鉴。

(三)面向未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当今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重要支撑。面对未来,坚定文

化自信,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1.坚持以社会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

当今中国,文化的灵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文化建设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牛鼻子”。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渗透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去,坚持全民参与、共同行动,从每一个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外化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

2.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及充分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生活需要文化,文化发展更需要人民群众。要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创新精神,为人民群众文化创造搭建舞台,让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充分展现。另一方面,加强文艺工作者队伍建设,把文化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为文艺工作者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生态。

3.为文化建设插上腾飞的强劲翅膀

当今社会,科技和市场在文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技和市场就好像是鸟的一双翅膀,是文化飞的更高更远的强劲力量。一是要借助科技的手段,创新文化传播手段和表现形式,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作用,推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和移动优先策略,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版图。二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既要把握好国内文化市场的发展规律,又要关注国外文化市场的发展动态,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培育民族文化品牌,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同时也需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始终坚持社会效益首要地位。

参考文献:

- [1] 当代汉语词典编委会.当代汉语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9:1923.

- [2] 普洛克特.剑桥国际英语词典[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2283.
-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 [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3.
-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5.
-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 [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2.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 [1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 [11]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 [12]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9-05-16(2).

(责任编辑:冯起国)

Connotation, Logic and Practice: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Cultural Confidence

WANG Jikun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on cultural confidence from the overal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has a profound generative logic.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s its historical logic,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its theoretical logic,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is its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e original, absorb foreign countries and face the future in practice,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cultural confidence; connotation; logic; practice

流动夫妻的婚姻是如何走向不稳定的?

刘琳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已有关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研究多关注夫妻一方流动婚姻走向不稳定的原因,较少关注夫妻共同流动后婚姻是如何走向不稳定的。本研究基于对农民工夫妻的质性研究,发现使流动夫妻婚姻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因为夫妻分居阻碍配偶之间情感沟通;二是因为流动夫妻忽视对方情感诉求;三是角色期待落空影响婚姻稳定;四是婆媳矛盾影响婚姻稳定;五是夫妻权力分配失衡影响婚姻稳定。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夫妻;婚姻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26-06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

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从农民工流动基本特征可以看出女性和有配偶的流动占比均有提高。^①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与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的包容性增加,农民工呈现出家庭化迁移趋势。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夫妻一起流动的有90%,配偶和子女一起居住的约有60%。开始携带老人流动的家庭逐渐增多。^②流动占据着农民工重要的生命历程,其家庭和婚姻的稳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婚姻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学界主要在人口流动背景下来探讨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沿海经济的同时吸引农村人口前来打工,产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家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变大,使得部分家庭功能的实施受到阻碍。另一方面,流动可能拓展人们的视野,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父母对子女的掌控,改变人们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形成新的家庭理念,而这又反作用于家庭结构。^③李卫

东等认为人口流动弱化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使农民工的性别角色意识越来越趋于非传统化,降低离婚阻力成本和婚姻收益,进而降低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④

在众多研究婚姻稳定性的文献中,研究对象大部分都是对外出打工的女性或者是留守妇女的婚姻进行研究。例如,关于打工女性的婚姻稳定研究:相对于同一个地区男女缔结的婚姻,地域差异给农村打工女性的跨地区婚姻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其婚姻稳定程度不高。^⑤关于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研究:丈夫流动到外地打工,妻子留守在农村中,这些“留守妇女”中的一些人遭遇了婚姻“红灯”,“打工婚姻”离婚案呈不断上升趋势。^⑥丈夫外出妻子留守使得夫妻分居两地,感情交流机会减少,增加了双方的相互猜疑的可能,感情危机随之产生,影响他们的婚姻稳定。^⑦许传新的观点与上述学者不同,他认为虽然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但婚姻的高稳定性仍然是西部农村妇女婚姻的基本特征。^⑧

从人口流动形式可以看出学界关于婚姻稳定性研究大部分都是对单方流动的农民工婚姻稳定进行研究,单方流动就是指一方流动一方留守。关于单方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的影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单方流动会对农民工婚姻产生消极影响。杨啸认为异地婚姻数量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频率降低,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疏离感增强,不利于家庭婚姻的持久稳定。^⑨石人炳认为农村已婚青年外出流动

收稿日期:2019-10-28

作者简介:刘琳(1997-),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婚姻家庭研究。

使夫妻长时间两地分居以及交际关系的扩大为婚外恋的发生提供了条件,造成婚姻不稳定。^[8]第二种观点认为单方流动不会对农民工婚姻产生消极影响。金一虹认为多数离散家庭会通过一系列维持性行为,顽强维持家庭完整、尽可能实现其功能目标。因此在家庭离散化同时也呈现出弥合效应。^[9]罗小锋认为留守妻子与外出打工丈夫在共同改善家庭生计的过程中,能互相信任、互相关怀、互相理解,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彼此之间联系,增进夫妻感情,增强婚姻回报,加强夫妻之间连接纽带。^[10]龚维斌认为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就业过程中夫妻感情受到不好影响的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夫妻感情由于“相思”与“反思”(想着对方辛苦)得到程度不同的增进。^[11]

总的来说,学界关于婚姻稳定性的研究忽视了三个方面:大量从宏观角度分析而忽视了微观层面;多从女性视角进行探讨,缺乏男性的视角;流动分类模式单一,缺少共同流动婚姻稳定性的系统性研究。本文试图将三个被忽视的方面相结合进行探讨,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研究关于男性与女性在流动后的婚姻稳定情况,探讨共同流动的农民工夫妻其婚姻是如何走向不稳定的。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1.流动模式的分类

关于农民工夫妻流动模式分类有多种,我们将流动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比翼双飞型,即夫妻双双到城市打工。二是劳燕分飞型,即夫妻双方都外出去城市打工,但是两人工作地点不在一块,各自分开生活许久才能见面。三是举家流动型,即夫妻双方一同外出打工,在同个地点生活工作并将老人和孩子带在身边一起生活。

2.婚姻稳定性

关于婚姻稳定性的概念,有一些学者认为婚姻稳定性实际上反映的是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态度或对婚姻持续的信心,如是否产生过离婚的念头。只要配偶一方存有这种离异的意向,那么这种婚姻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走向终结。^[12]本文将婚姻不稳定界定为两种情况:一是婚姻当事人主观上产生离婚的想法,客观上采取行动结束婚姻关系;二是婚姻当

事人主观上有产生过离婚的念头,客观上未采取行动结束婚姻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法,在具体调查过程中采取无结构式访谈法收取资料。根据研究目标和笔者主观分析来选择和确定研究对象,抽样考虑以下几个标准:(1)从农村流动到外地打工的人口;(2)流动模式: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比翼双飞型,即夫妻双双到城市打工。二是劳燕分飞型,即夫妻双方都外出去城市打工,但是两人工作地点不在一块,各自分开生活许久才能见面。三是举家流动型,即夫妻双方一同外出打工,一起生活工作并将老人和孩子带在身边一起生活;(3)性别:男性和女性。

2019年春节期间以龙岩市为调查地点,以生活、居住和工作不在其自身家乡的外来人口为调查对象。通过家人、亲戚等关系认识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并对其进行无结构式访谈,将婚姻当事人“近一年来有无离婚意向”和“是否离婚”作为测量双流动夫妻婚姻稳定与否的主观性判定指标,总共收集到十个案例,基本情况请见下表。

表 1 个案资料

Tab.1 Case-study material

| 个案编号 | 性别 | 年龄 | 简要情况 |
|------|----|----|---|
| 1 | 男 | 50 | 刘先生进城打工 30 多年,和妻子离婚七年,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在读书,女儿出来工作了,离婚后孩子上学由母亲帮忙照顾。 |
| 2 | 男 | 45 | 刘先生进城打工 18 年,夫妻因孩子上学在不同地方打工生活,有两个儿子,一个幼儿园一个高中,过年发生矛盾导致婚姻破裂。 |
| 3 | 男 | 36 | 兰先生夫妻二人在 Q 城做不锈钢生意,有两个孩子,1 个男孩 1 个女孩,都在上小学,婚姻关系稳定。 |
| 4 | 男 | 50 | 刘先生和妻子结婚 28 年,妻子在市区超市上班和刘先生分开居住,平均每个月见一次面,近一年内有离婚想法。 |
| 5 | 女 | 47 | 赖女士结婚 27 年,有两个儿子没读书了,进城打工 14 年并在城市购买房子,婚姻关系稳定。 |
| 6 | 男 | 44 | 何先生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其妻子是一名管理者,结婚 16 年,有 1 个儿子在上小学,夫妻感情很好。 |
| 7 | 女 | 46 | 吴女士在丈夫工作单位里做家属工,丈夫去年因为行业不景气提前退休,两人结婚 23 年,有两个女儿在上大学,婆婆和夫妻一起居住,关系不好。 |
| 8 | 男 | 49 | 刘先生进城打工 25 年,夫妻在同个地方居住,有 1 个儿子不在身边,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婚姻稳定。 |
| 9 | 男 | 46 | 刘先生在城市打工 28 年,妻子是外地人,两人结婚 21 年,有一个女儿在上大学,婚姻稳定。 |
| 10 | 女 | 47 | 廖女士离过两次婚,和第一个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感情不和离婚,和第二个老公结婚两年后离婚。 |

二、流动夫妻婚姻如何走向不稳定

(一) 缺乏情感交流致使夫妻产生隔阂

1. 长期分居拉大流动夫妻的情感裂缝

流动夫妻分居是出于对家庭整体利益的考虑,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是一种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13]访谈资料中,有因为孩子上学分开居住的夫妻,也有为了多挣点钱选择不同地点工作的夫妻,他们不得不克服和配偶分开后产生的孤独感与失落感。虽然现代通讯功能可以实现视频聊天,但是遥远的距离终将在农民工夫妻之间产生一层隔膜,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心理沟通和情感交流,不能过平常夫妻的生活。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提到“一个亲密的团体,日常的合作、会面、生活的配合受地域限制的影响,夫妻正常关系不易在分居的状态下维持。”^[14]

离婚七年的刘先生说:“两个人就是住的太远,不能好好沟通,我真后悔在市里买房子,这样就不会因为她带孩子读书和我分开住,如果一直在我身边上班她就不会跑去外省,她不回来我后面又找了一个。”(案例一)

2019年年初离婚的刘先生说:“从我大儿子上初中开始我们就不在一起住了,她带着孩子在市里住,我一个人在这边上班生活,日子很无聊,因为负担重,我也不敢去赌博消遣,和我老婆沟通也比较少,很久才见一次,过得挺难受。”(案例二)

有学者将劳燕分飞型农民工夫妻组成的家庭称为“失语家庭”。这些“失语家庭”使得家庭的一些重要功能,如物质生活、娱乐、保护、情感等功能淡化或消失,从而影响家庭生活。长期没有性生活造成已婚夫妇之间的情感缺失、性爱缺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夫妻之间感情冷淡、家庭出现裂痕、产生婚外情等现象,成为离婚的一个主要原因。^[15]

一位有离婚想法的刘先生说:“如果两个人长时间分开住就没有必要对她忠诚了,长时间不在一起就没有感情了,没有感情就要离婚了,没必要守着她。”(案例四)

在谈到分居时赖女士说:“分居久了后感情会变得不好,就容易出现婚外情,婚外情出现就会对对方

失去信任,不能好好过日子了。”(案例五)

2. 忽视配偶情感诉求降低婚姻稳定性

夫妻感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发展、变化,既能够使婚姻双方关系稳固、持久,也可以使婚姻关系恶化。^[16]流动夫妻受农村文化的影响,夫妻之间不擅长交流思想、沟通情感,倾向于生活化而非情感化沟通的流动夫妻,关注点多在于生活上的琐事,或者认为工作赚钱比配偶重要,忽视了配偶的情感诉求影响家庭的幸福与稳定。

50岁的刘先生说:“她去外省打工后,家里一切开销都是靠我一个人,又要还房贷,儿子女儿上学,我女儿学画画一个月要好多钱,她之前给全家人买的保险也要供,我一个月都不敢休息一天,拼命干活就想多赚点钱,整个人瘦了好多。打电话给她她也不接,她爸妈打电话让她回来也不回来,我真的太累了就想一定要和她离婚。”(案例一)

刘先生说:“我老婆现在在超市上班,和我没有住在一起了,只有我有空的时候才去找她。有一次我重感冒整个人很难受,想让她请假来我上班的地方照顾我,但是她说不能请假,请假会扣工资就没回来。”(案例四)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流动夫妻受到城市婚姻观念的冲击,对婚姻质量要求提高,更加重视夫妻之间情感交流,传统“从一而终”、“凑合过日子”的意识降低。长期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打拼生存,并想在城市买房定居融入城市,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心理压力逐渐增加,更需要从家庭中得到慰藉。很多流动夫妻婚前没有感情基础,婚后缺少情感化的语言沟通和交流,不愿意理解对方的想法,为家庭琐事争吵甚至严重到出现家暴行为,这些夫妻无法从配偶那里得到心灵慰藉,导致对婚姻失望,从而影响婚姻稳定性。

(二) 角色期待落空弱化婚姻稳定性

社会互动总是和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在婚姻互动中,男性扮演着丈夫角色,女性扮演着妻子角色。如果在婚姻交往行为中,丈夫(妻子)不符合妻子(丈夫)对自身的角色期待,造成角色期待落空弱化婚姻稳定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流动到城市,从家庭走向社会。她们不再依

靠丈夫赚钱养家,而是通过自己辛苦劳动获得经济收入。相比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时期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现代女性变得更加独立、自主,对丈夫的期待随之提高,希望丈夫赚的钱比自己多,能够和自己一起承担家务,如果丈夫不能满足妻子的要求和期望,就会造成角色期待落空影响婚姻稳定。

吴女士说:“我老公自从内退(内部退休)以后一个月工资少太多了,让他干这个活他不愿意,干那个活就摆脸色,我一个人天天累死累活,回来还要给他和他妈妈煮饭吃,洗衣服。他还动不动会骂人,有时候真的感觉过不下去。”(案例七)

离过两次婚的廖女士说起离婚的原因:“第二个老公对我很好,我也很想和他一起生活,但是他负担太重,和我说没钱在城里买房,我又不可能和他回老家住,父母那边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我回老家后就没去找他了,他也让我再找过一个。”(案例十)

城市对于流动夫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念的变化,流动夫妻受到城市新的事物和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思维和情感也渐渐发生着变化。女性受到自由的思想观念影响,将城市婚姻关系作为一个参考体系和参照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婚姻。吴女士内心是希望丈夫能多体贴自己,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廖女士想让丈夫能够像城里人一样赚更多的钱提供更好的生活,能在城市里买房安定下来。但是案例中的丈夫都没有扮演好妻子理想中的丈夫角色,致使妻子对他们的期待落空,这是婚姻造成婚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婆媳矛盾影响婚姻稳定性

婆媳关系是在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它在家庭关系中有其特殊性,既无婚姻关系的亲密性,也无血缘关系的稳定性。因此,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微妙也是最难处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婆媳冲突影响婚姻关系维系的例子数不胜数。科塞将冲突的原因分为物质性关系和非物质性关系,其中物质性冲突是指权利、地位和资源分配不均。非物质性冲突是指价值观和信仰不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举家流动模式中,保留农村习惯的婆婆被流动夫妻接到工作地方一起生活后,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引发家庭矛盾影响了流动夫妻婚姻稳定性。

在笔者访谈中得知吴女士家庭就是举家流动到城市打工生活,她说:“婆婆的思想还是像在农村一样,让她喂鸡像以前喂猪一样,要用一大堆饭和谷子,鸡总共还不到5只,和她说不要那么浪费,她就会说我就习惯这样。再吵下去就会说谁叫我儿子要把我接来住。我一开始是反对我老公接她来,听到她这样讲我更生气,我就会拿这个说我老公,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会吵起来。”(案例七)

家庭内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夫妻的“离”与“合”趋势,两代人之间存在隔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长辈由于思维定势无法适应新生活新节奏,而晚辈不仅要忙于工作挣钱养家,还要承担长辈带来的压力,两代人之间产生矛盾无法有效处理则会引发夫妻矛盾。夫妻长期在这种环境生存下,家庭压力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造成婚姻解体。

(四) 夫妻权利分配不均影响婚姻稳定性

流动到城市后,农民工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在流动夫妻中所占比例增加,与上一辈居住距离增大,女性从媳妇的角色抽离剩下的只有妻子的角色,男方家长失去控制生产和经济的权利丧失对儿媳妇的控制。加上流动女性在城市打工后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改变了需要依赖丈夫供养的状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而也对改变隐含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背后的男主女从的家庭角色模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7]甚至在有的流动家庭中权利向女方倾斜,一是因为丈夫不想失去对方或家庭,往往更容易顺从于对方从而失去权力。二是婚前女方家境比男方好,双方结婚后形成从妻居这一居住方式,女性占有资源大于男性,拥有权利大于男性。

因为工作和老婆分开居住的刘先生和我说:“我是入赘到老婆家,所以家里一切都由我老婆说了算。偏向她父母,我都不敢给我老妈钱,也很少把我老妈接来一起住,就是怕被老婆讲。”(案例四)

2019年年初离婚的刘先生和我说:“我父母年纪大了想让我们一个月给他们200元生活费,但是我老婆就不乐意给我爸妈生活费,和我父母吵起来。平时回老家都住在我老婆爸妈那边,她给钱给他们我也没意见,现在我父母要求给生活费她不肯,我夹在中间很难受,她觉得我没有站在她这边帮她说话,一直和

我闹离婚,我拗不过她,干脆就离婚了。”(案例二)

以上案例表示,无论是在丈夫主导还是妻子主导的家庭中,都意味着相对的一方需要付出更多妥协。^[18]父权和妻权影响夫妻权力关系的塑造,双方的权力对比或分配不均背后体现的是:夫妻角色互动缺乏沟通性与平等性,夫妻之间缺少相互尊重与包容,^[19]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都是由于权力向一方倾斜,权力分配不平衡容易令对方心生不满影响婚姻稳定性。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夫妻的质性研究,探讨了他们的婚姻是如何走向不稳定的。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导致流动夫妻婚姻关系解体不是单一因素引起,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中,虽然我们主要从流动夫妻的情感交流、扮演丈夫或是妻子角色是否符合配偶期待、婆媳关系的影响以及流动夫妻权力分配问题这四个方面论述,但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流动夫妻之间情感交流是否顺畅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分居式流动使农民工夫妻分居两地,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距离、时间等因素使农民工夫妻情感表达受到阻碍;不少婚姻走向解体部分是因为婚前感情基础比较薄弱,婚后又因各种因素影响没有建立感情。婚姻既是经济共同体也是情感共同体,男女组建婚姻既有经济方面的需求,也有情感方面的需求。任何一方面需求的不能满足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婚姻的稳定性。^[20]

第二,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除了会受到来自流动经历的影响外,进城务工带来的家庭模式、思想观念、环境压力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婚姻生活质量。^[21]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后在城市婚恋观的影响下,不再满足于传统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她们走向职场,从家庭中独立出来,不再依靠丈夫经济上的供养,并且期待丈夫能有所改变像城市中的丈夫一样,期待丈夫能赚大钱给她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体贴理解自己。但是受传统思维影响的许多农民工对丈夫的角色建构无法达到配偶的期望,工作压力和家人的高要求增加其精神压力,夫妻关系处理不好最终导致婚姻解体。

第三,家庭模式影响着农民工婚姻生活质量,在举家流动模式中的流动夫妻将老人接来和自己一起生活,老人对新环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无法适应心生怨言,和流动夫妻发生矛盾与冲突影响流动夫妻婚姻关系。已有研究在探讨流动夫妻婚姻为何不稳定的原因时,多强调的是外部因素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忽视了家庭内部因素对流动夫妻婚姻关系的影响,如婆媳不合影响夫妻关系维系。

第四,流动夫妻流动到城市打工后,传统男权思想受到城市平等文化的冲击,一些流动家庭中男性主导地位转向男女共同主导或者是女性主导。无论是在父权家庭还是妻权家庭中,都意味着双方的权力分配不均,相对的一方需要付出更多妥协。家庭权力的失衡轻则易引起付出较多一方的不满,重则危及婚姻的稳定。

本研究试图从上述几个方面来论述双流动夫妻婚姻走向不稳定的原因,但是影响流动夫妻婚姻不稳定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受样本数量和类型的影响,本研究无法将其他影响因素呈现出来。

注释:

- ① 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4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ztjc/qjdt/jdt/201904/t20190429_1662313.html.
- ② 2016年10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

参考文献:

- [1] 杨菊华,何绍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2):36-51.
- [2] 李卫东,罗志华.人口流动背景下如何提升农民工婚姻稳定性[N].中国人口报,2019-01-10(3).
- [3] 仰和芝.农村打工女性跨地区婚姻稳定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7(1):294-295.
- [4] 陈春园.走进农村留守妇女的现实生活心头的“三座山”[N].半月谈,2005-11-10(13).
- [5] 李包庚.农村青年留守妇女发展问题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2(12):31-36.
- [6] 许传新.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1):97-106.

- [7] 杨啸.社会流动对半流动家庭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J].长沙大学学报,2012(4):69.
- [8] 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1):33-36.
- [9] 金一虹.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9(2):98-102.
- [10] 罗小锋,何朝银.家庭责任感与单流动家庭婚姻关系的维系:基于对单流动家庭的质性研究[J].福州大学学报,2018(5):79-84.
- [11] 龚维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家庭关系变迁[J].社会学研究,1999(1):88-91.
- [12] 李喜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学理论,2014(29):44-45.
- [13] 罗忆源.流动农民工家庭中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6(7):179-180.
-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5] 疏仁华.解析当代农民工的“中国式离婚”:对安徽省 966 例农民工的调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39-42.
- [16] 王礼仁.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 [17] 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18] 李建新,郭牧琦.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J].妇女研究论丛,2015(6):17-23.
- [19] 徐安琪.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J].浙江学刊,2004(2):208-213.
- [20] 罗小锋.留守妇女的婚姻为何走向解体:基于对农民工家庭的定性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39-45.
- [21] 薛青.进城务工对农民工婚姻生活影响研究[J].科学经济社会,2013(3):148-157.

(责任编辑:陈 果)

Reasons for the Unstable Marriage of Floating Couple

LIU Lin

(School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zhou University, Fuhou, Fujian 350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marriage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sons for the unstable marriage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and less attention to how the marriage goes unstable after the couples move together.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coup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that cause migrant couples unstable are mainly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 the separation of husband and wife hinders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pouses; Second, the mobile couple ignores the emotional appeal of the other party; Third, the expectation of failure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Four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Fifth, the imbala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floating couple; marriage stability

泉州市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对策研究

刘佳丽, 吕 津, 陈毅华

(闽南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 泉州 362700)

摘 要: 为了促进泉州中老年人更好的融入互联网生活,从泉州地区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情况设计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通过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找出了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主要困扰,最后提出提高中老年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几点建议:一是为老年人接触网络创造舆论条件;二是设立与老年大学相类似的学习机构;三是互联网要在技术上最大限度的为老年人打开方便之门,四是,加强网络安全建设,防范诈骗风险,给中老年人上网营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

关键词: 中老年人;互联网;Logistic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2-0032-05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与知识逐渐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互联网早已悄然的融入了我们生活当中,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正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与乐趣,然而老年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却被隔离在互联网生活之外,而泉州作为我国著名的侨乡,在福建省经济总量排第一,但是泉州养老服务产业却在全省排名倒数,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快,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政府对智慧养老产业的不断重视,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作为智能养老的基础,对于泉州市养老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通过设计调查问卷,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找出影响中老年群体融入互联网的主要因素,为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泉州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现状

(一)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偏低,且年龄偏青年化

通过对泉州中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主要是用来聊天,并且他们每次使用的时间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较短。在互联网的使用群体中,偏年轻的中老年人的占比较高,大多是在五十岁到六十岁范围内。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健康状况较好,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大部分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能够有机会学习互联网的相关内容。而大多的高龄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于互联网的应用也缺乏有效的学习途径,缺乏对互联网的认知度,导致大多数的中老年人较少接触互联网,且接触时间短。

(二)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主要用于社会交往

调查显示,泉州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主要是观看新闻、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和浏览信息等方面的功能。在互联网的各项功能中,中老年人最为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功能是社会交往功能,即能够支持 QQ、微信的语音聊天和视频聊天等。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老年人拥有较多空闲时间和子女进行沟通,另一方面大部分老年

收稿日期:2019-06-08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JAS180751);
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产业创新
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闽教科[2019]38号)。

作者简介:刘佳丽(1990-),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产业
组织与产业政策研究。

人从原有工作岗位下来,导致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和自我满足度不断降低,他们需要找到新的心理寄托。然而,中老年人对互联网的购物功能、支付功能和理财的使用较为谨慎,这是由于老年人对新的事物持谨慎态度,并且现阶段骗局较多,互联网骗局屡禁不止。

(三)中老年人对网络的信任度较高

对于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态度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对于互联网的学习,有较高的认可度,特别是对互联网的便利性和实用性方面。这是由于中老年人随着其身份的变化、年龄的增长,使其处于积极参与社会的渴望与自身条件难以满足的矛盾之中,在访谈当中绝大部分中老年人对是否愿意学习互联网技能持赞同的态度。

二、泉州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设计和数据来源

1.模型选择与研究假设

本文选择使用意愿研究中的以是否愿意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指标作为因变量。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研究重点放在影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应用技能上,所以我们将中老年人是否愿意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作为被解释变量,即被解释变量(y)——选择“是”或选择“否”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作回归分析。模型变量设定见表 1。

表 1 变量设定

Tab. 1 Variable settings

| 变量 | 变量名称 | 含义 | 均值 | 标准差 |
|-----------------|----------|--|-------|-------|
| y | 使用意愿 | 是否愿意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是”=1,“否”=2 | 1.16 | 0.369 |
| 基本信息 | | | | |
| x ₁ | 性别 | “男”=1,“女”=2 | 2.40 | 0.911 |
| x ₂ | 是否独居 | “是”=1,“否”=2 | 1.73 | 0.446 |
| x ₃ | 探望频率 | “一周 1 次或以上”=1,“一个月 1-2 次”=2,“三个月 1-2 次”=3,“半年 1 次或更少”=4,“跳转”=-3 | -1.48 | 2.568 |
| x ₄ | 文化程度 | “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学及大学以上”=5 | 2.91 | 1.365 |
| x ₅ | 居住方式 | “独居”=1,“仅与配偶单独居住”=2,“一家人共同居住”=3,“老年公寓”=4,“其他”=5 | 2.42 | 0.865 |
| 帮助意愿 | | | | |
| x ₆ | 是否愿意帮助老人 | “非常愿意”=1,“不想介入别人的生活”=2,“不愿意”=3 | 1.28 | 0.545 |
| x ₇ | 不帮助原因 | “没有空闲时间”=1,“没有专业知识”=2,“没有精力”=3,“担心上门时的人生安全”=4,“担心老人有突发情况”=5,“其他”=6,“跳转”=-3 | -2.63 | 1.683 |
| x ₈ | 愿意程度 | “十分愿意”=1,“愿意”=2,“一般”=3,“不愿意”=4,“非常不愿意”=5 | 2.05 | 0.918 |
| 使用意愿 | | | | |
| x ₉ | 学习途径 | “向志愿者学习”=1,“和其他老人一起学习”=2,“向邻居好友学习”=3,“向家人学习”=4,“其他”=5 | 3.09 | 1.162 |
| 融入现状 | | | | |
| x ₁₀ | 交流方式 | “面对面”=1,“利用手机/电话”=2,“几乎不交流”=3,“其他”=4 | 1.80 | 0.750 |

假设中老年人*i*选择是的概率为 p_i , 中老年人*i*选择否的概率则为 $1-p_i$, x_j 表示可能影响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意愿选择的各类因素选择的概率, 据此构建如下线性模型:

$$\ln \frac{p_i}{1-p_i} = a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dots + \beta_{10} x_{10} + \varepsilon$$

其中 $x_i(i=1, 2, 3 \dots 10)$ 表示可能影响中老年人学习互联网意愿选择的各类因素, 分别选取的是: 性别、是否独居、探望频率、文化程度、居住方式、是否愿意帮助老人、不帮助原因、愿意程度、学习途径、交流方式这10个因素, 以及随机扰动常数项 ε 。 $\beta_1 - \beta_{10}$ 表示可能影响中老年人学习互联网意愿选择的各类因素的系数。

2. 模型的相关性检验

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对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通过检验发现, 绝大部分的预测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小于 0.4, 属于中低度(弱)相关, 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二) 实证分析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所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参数估计

Tab. 2 Parameter estimation

| | B | S.E. | Wals | Df | Sig. | Exp (B) |
|---------------|---------|-------|--------|----|------|-----------|
| x_1 | -.907 | .377 | 5.778 | 1 | .016 | .404 |
| x_2 | 11.447 | 4.395 | 6.783 | 1 | .009 | 93652.427 |
| x_3 | 1.810 | .674 | 7.219 | 1 | .007 | 6.108 |
| x_4 | .775 | .203 | 14.629 | 1 | .000 | .461 |
| x_5 | .273 | .249 | 1.206 | 1 | .272 | 1.314 |
| x_6 | -1.349 | .699 | 3.721 | 1 | .044 | .260 |
| x_7 | .477 | .195 | 5.965 | 1 | .015 | 1.611 |
| x_8 | .394 | .301 | 1.719 | 1 | .190 | 1.483 |
| x_9 | 1.172 | .266 | 19.354 | 1 | .000 | 3.230 |
| x_{10} | .189 | .294 | .413 | 1 | .521 | 1.208 |
| ε | -17.912 | 7.118 | 6.332 | 1 | .012 | .000 |

1.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采用对数释然比, 对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如果解释变量对 LogitP 的线性解释有显著意义, 则模型的拟和效果较好, 通过测算得出模型的 $P=0.000 < 0.05$, 说明具有显著相关性, 模型拟合效果良

好, 能够很好的对解释变量进行解释。

2. 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对模型 Nagelkerke R 方进行检验, 由于 Nagelkerke R 方 = 0.712 > 0.5, 进行 HL 检验量的概率 $p = 0.953 > 0.5$;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

(三) 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 影响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的因素主要有基本信息、学习途径以及年轻人的帮助意愿。

1. 基本信息对学习意愿的影响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是否独居 x_2 、探望频率 x_3 、文化程度 x_4 、居住方式 x_5 , 他们的系数 B 值分别为 11.447、1.810、0.775、0.273 均大于 0, 说明基本信息变量中的是否独居、探望频率、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对中老年人学习意愿选择具有正向影响性。文化程度越高, 对学习互联网的意愿就越高, 这可能与老人的接受和学习能力有关, 文化程度高的接受和学习能力都比较强, 比较愿意接受新事物, 而文化程度低的, 学习能力比较弱可能在学习新事物的时候容易受到种种挫折, 打击到他们, 从而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 年轻群体探望中老年人的频率越高, 中老年人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的频率就越多; 居住人数越多, 中老年人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的意愿就越强。

2. 学习途径对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影响显著

从表 2 中可以得出, 学习途径得系数 B 为 1.172 > 0, 表明, 老年人更愿意和认识的人一起学习新知识; 当老年人和家人一起学习时, 一方面由于家人对老人比较了解, 能够比较细心的对老人进行讲解, 另一方面, 通过与家人增加交流可以排解老年人的孤独寂寞; 当老年人在和朋友一起学习时, 一方面由于和朋友比较熟悉, 可以增加学习的快乐; 另一方面, 很多老年人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通过和朋友一起学习激发他们的好胜心理, 可以增加他们的学习斗志。

3. 帮助意愿变量对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的影响

帮助意愿的系数 B 值为 0.394 > 0, 说明年轻群体帮助中老年人的愿意程度越高, 中老年人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的频率就越高。中老年人在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过程中, 年轻群体的帮助与耐心讲解能够提高中老年人的学习意愿, 减少在学习互联网应用技能的挫

败感以及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年轻群体在帮助中老年人的同时也增加了与中老年人的接触与互动,从而使中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更感兴趣。

三、泉州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困扰

阻碍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不识字、网络连接、网络诈骗、字体小、画面复杂、操作繁琐、信息泄露等问题,通过对 235 个有效问卷分析发现(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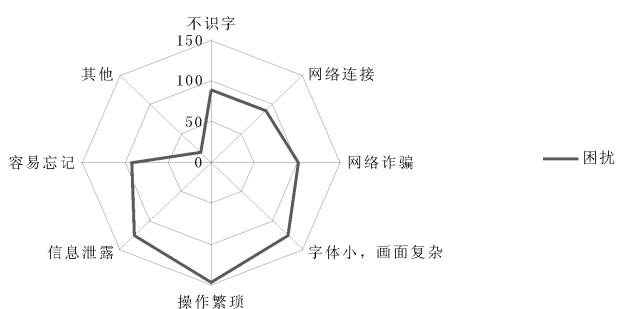


图 1 中老人在互联网下的使用困扰

Fig. 1 Problems of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by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一)操作繁琐和画面复杂

中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扰是操作繁琐和画面复杂的问题,占比 61.7%;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网络界面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在不断变慢,并且记忆力也在不断下降,面对复杂的界面,很多老年人无从下手,所以操作繁琐和画面复杂给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二)文化水平较低

文化程度水平也是阻碍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主要因素,闽南话和普通话的差距比较大,且大部分的泉州地区的中老年,他们文化程度低,很多中老年人不仅不识字,甚至有些人听不懂普通话,而在我国大部分网络软件和图标是普通话,对于很多有声读物也基本都是普通话,这就严重的制约这部分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当中。

(三)网络诈骗和信息泄露现象严重

支付安全问题、信息泄露、网络诈骗也是阻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重要因素,虽然互联网作为新兴事

物,他的产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但是由于网络本身的不可控和难辨真假性,网络造假、网络诈骗层出不穷,调查发现,大部分老年人不具备甄别网络风险的能力,很多老年人对网络传销、非法集资、假冒公检法以及涉及药品、保健品的网络谣言的风险不了解,没有办法抵御这些风险,使得很多老年人的家人不愿意让老人接触互联网,老年人自己对于互联网也心存芥蒂,这严重的阻碍了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

四、促进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建议

(一)为中老年人接触网络创造舆论条件

大部分的人认为互联网是年轻人的工具,他们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持否定和不认可的态度,所以网络媒体要联合传统媒体,对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进行宣传,为老年人上网创造舆论条件,同时,我们也要通过宣传,传播老年人在使用网络媒体的困境以及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重要性,呼吁年轻群体对老年人上网给予理解和耐心帮助。

(二)设立与老年大学相类似的学习机构

受教育程度限制和中老年人对互联网信息缺乏辨别能力是限制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重要因素,可以设立和老年大学相似的老年学习机构,并加大宣传力度来帮助中老年人。在这个机构里可以针对不同文化程度的老人进行分类教授,首先,对于低龄且具有高文化层次会上网,但是熟悉程度不够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引导和交流帮助他们突破困境,其次,对不会上网的中老年人,进行志愿者一对一服务,在掌握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设立小型座谈会,通过对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互联网生活。

(三)建立适合老年人使用和交流的互联网产品

通过前面分析,我们知道现有互联网技术对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网站,这些网站需要与老年人的需求相对接,让老年人有一个可以相互交流的平台,同时在网站设计时,还需要考虑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包括老年人的接受能力、记忆力和视觉方面的

能力,因此在网站设置上要求设备的字体要大、颜色要鲜明,同时语句要通俗易懂,方便老年人理解,可以使用象征性较强的图像替代文字,在操作上避免操作繁杂,总之,在设计上一定要围绕老年人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出发,设计出适合广大老年人使用的互联网产品,让老年朋友们尽早的融入互联网生活当中。

(四)加强网络安全建设,防范诈骗风险

第一,政府部门应加强网络治理和监督,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网络举报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对网络平台进行查询,并且老年群众可以对有疑问的平台进行咨询和举报,政府网络监管平台应该及时对不合法的网络平台进行处理,为老年人安全上网提供保障。

第二,互联网企业应开发防诈骗老年人互联网产品,定期更新老年人防诈骗手册。

第三,通过社会组织、社区、老年大学等机构,定期给老年人宣传最新的诈骗手段,组织老年人进行上网安全学习,并且可以通过拍微电影、小视频等方式让老年人更好的理解诈骗的过程,使他们在遇到类似诈骗案例的时候可以进行及时避免。

五、结语

互联网让我们生活变得快捷和方便,然而我们身

边却有那么一个群体,在大部分人享受互联网生活的同时,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只有为数不多的中老年人了解或者接触过互联网。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时代程度问卷和了解中老年人生活情况问卷,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得出了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中老年人接触网络创造舆论条件、设立与老年大学相类似的学习机构、为中老年人上网提供技术支持、加强网络安全建设、防范诈骗风险等建议,帮助老年人更好的融入互联网生活。

参考文献:

- [1] 陈坤. 老年人遇见新媒体: 积极老龄化视野下的媒介生活 [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7: 16-21.
- [2] 李玉侠. 关于老年人融入“互联网+”时代的思考 [J]. 时代经贸, 2016(15): 78-79.
- [3] 吴新慧. 老年人互联网应用及其影响研究: 基于 CSS(2013) 数据的分析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4(4): 63-72.
- [4] 盖龙涛, 刘懿莹, 黄子珺. 三网融合进程中的老年人与新媒体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 37(13): 3348-3353.

(责任编辑: 白 晔)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ntegrating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into Internet in Quanzhou

LIU Jiali, LV Jin, CHEN Yi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in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uanzhou, Fujian 362700)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etter integration of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in Quanzhou into Internet life, a questionnaire was made about the integration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Quanzhou. And on this basis, through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corporating Internet life, and found out the main trouble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tegrating into Internet life,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into the Internet life. First is to create a public opinion condition for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to contact the network; Second is to set up a learning institution similar to the old-age university; Third is to open the door to the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to the maximum extent technically. Fourt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security, guard against fraud risks and create a safe online environment for the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Key words: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Internet; logistic model

论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适用

张阿妹

(福建警察学院 刑罚执行系,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我国刑事裁判文书存在罪数形态的说理不足、书写模板化等问题,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充分说理是文书厘清功能和全面评价原则的要求。考察台湾地区刑事裁判文书罪数说理情况,罪数理论说理与司法实务是互相支撑、共同发展的。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涉及罪数形态时应把不同罪名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把定罪量刑的过程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为推进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与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罪数理论;全面评价;厘清;刑事裁判文书

中图分类号: D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2-0037-06

“我国罪数理论借鉴于德国与日本,德、日刑法对罪数问题皆有明文规定,其学理研究往往依循立法。”^[1]德日的罪数论规定在刑法条文里,罪数体系有法律依据,而我国的罪数理论并无刑法规定,罪数判断的适用遭到体系建构的障碍,罪数论的规范适用在司法实践层面的展开依靠着法官的智慧与法律适用能力。罪数理论是一个在解释论范畴里研究的问题,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了我国司法实践活动的开展。罪数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触犯数个罪名时,法院是如何确定罪名的,刑罚是怎么作出来的。

一、问题的提出

罪数论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成为难题,一是因为“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罗马法时代到今天,它依然是学理上无奈的痛,亦成为实务上深怕触碰的伤痕,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2];二是“因为关于罪数问题的学说或者实务,大皆直接遽下判断,鲜少说明其法

理所在。”^[3]在我国刑法未明文规定罪数问题且刑事裁判文书多数未对罪数问题进行说理的情况下,罪数理论在裁判文书中的适用就会变得混乱和棘手。有些刑事裁判文书虽有法理的释明,但只是寥寥数语,说理极其简单,甚至变成简单嵌套内容的文书。有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过程中运用了刑法理论知识,出现了“竞合”和“牵连”,但只是简单的论述,如陈百泉、郁树良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被告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系为了骗取国家税款,但法律明确规定,此行为应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此罪的法定刑重于偷税罪;被告人的行为即使与该两罪发生牵连关系或竞合关系,亦应按择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4]罪数理论适用于刑事裁判文书中应有规范性的缺乏导致刑事裁判文书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不仅影响到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功能的展开还导致刑事裁判文书陷入模板化的泥沼中。

罪数论的释法说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刑事裁判文书法律规范适用的罪数需要被阐释清楚,却由于罪数论的体系发展问题遇到了困难。首先,由于我国刑法受苏联刑法影响深远,罪数问题的立法例有别于德日等国家,刑法条文中并未具体规定罪数形态,我国的罪数理论体系尚未构建且构建过程存有太多障碍与困难,这是罪数理论适用于刑事

收稿日期:2019-05-14

基金项目:福建警察学院青年课题(QN1601)。

作者简介:张阿妹(1988-),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裁判文书时理论上的第一重障碍,这导致在刑事裁判文书出现说理与否的尴尬,也会出现适用的混乱。其次,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如何说理是另一重障碍。从我国刑事裁判文书的发展过程看,刑事裁判文书一直跳不出往文书里堆砌证据与审理过程的窠臼。再加上罪数理论之争由来已久,既复杂又混乱,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得到解决的,刑事裁判文书中的罪数说理问题的解决就难上加难。本文相关问题的研究是放在我国传统罪数理论基础上的,探讨的是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适用的原因及如何适用的问题。

二、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适用的原因剖析

罪数是指行为人犯的罪的个数,罪数论是指确定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个数及如何适用刑罚的理论概括。罪数的判断是法官量刑的基础,罪数理论的不规范适用将会影响到法定刑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刑事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我国刑法中虽没有关于罪数形态的具体规定,但在刑法的一些条文中可以找到有关罪数形态的规定,如刑法第89条第1款、刑法中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文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等规定。罪数理论认为罪数形态包括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牵连犯、吸收犯、连续犯等形态,其中最难区分的当属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区分,罪数论的厘清功能是在存在数规范的情况下,检讨究竟如何从该数规范中,对于评价对象的行为做完整之评价。^[9]因此,刑事裁判文书中必须对罪数的规范与评价过程作出说明。

(一)刑事裁判文书厘清功能实现的要求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改革的深入,刑事裁判文书对于大众而言的厘清功能越显重要,裁判文书的公开,就是在发挥裁判文书对外的沟通与厘清功能。犯罪人及其家属、每一位公众都是司法公正的感受者,要实现感受得到有温度的司法正义,光有文书的公开还不够,还需要法官履行好释法说理的职责。如果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是过于简单的、模糊的,不仅无法实现刑事裁判文书的功能,还会带来另一层误解。许多公众还停留在杀人偿命的同态复仇观念上,对于刑法条文及蕴含的法理一无所知,对于说理简单

的刑事判决的结果更是带有偏见。如此,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刑事裁判文书承载的厘清功能里还包含着法治教育的要求,法治教育要求让社会大众直接了解什么样的行为会得到刑罚的苛责,罪与非罪的界限通过案例可以感受得一清二楚。如,河南大学生“掏鸟案”,在新闻媒体报道之初,引起了网民的热议,许多网民并不清楚为什么抓了十几鸟获得如此重的刑罚,认为这又是司法不公的结果。当河南大学生“掏鸟案”的刑事判决书被放上网时,网民们才了解被告人闫某猎捕的12只燕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告人闫某还加入“河南猎鹰兴趣交流群”,在网上兜售凤头鹰的时候还特意标明“阿穆尔隼”等信息。也就是说,掏鸟的大学生并非只是偶然的无意的捕鸟行为,被告人主观上是有故意的。^[9]尽管这个案件还是存在其他争议,但最初社会大众对于司法不公的误解因为判决书的上传而得到澄清。这个案例说明,在复杂的、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上,刑事裁判文书适时的法理阐明有助于社会大众加深对法律的了解,这也是刑法一般预防的实现方式之一。刑事裁判文书承担着释明的责任,罪数的说明是刑法苛以刑责的判断前提,把罪数说理加入刑事裁判文书中是文书厘清功能的必然要求。

(二)全面评价原则的遵循

全面评价原则系指对于刑法规定的各种罪行必须毫无遗漏地加以评价,以促规范与事实之间相互对应。全面评价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相依相靠的两个原则,是罪刑均衡在罪数形态下的具体适用原则。全面评价原则要求刑事裁判文书体现出全面评价的过程,事实层面与规范层面对应的体现不应只存在于法官内心中。全面评价原则的体现,有如卿太苏一案^①,法官在犯罪事实的逻辑评价过程中首先体现了全面评价原则,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这是犯罪成立的初步判断;然后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框架下,行为人的一行为只能得到一个评价,超出的评价则是被禁止的,行为人只能得到一罪的刑法评价,因刑法第399条对于罪数形态的规定是特殊的,根据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对这种行为系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结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判决书最后给予被告人卿太苏徇私枉法罪的

一罪评价。全面评价原则要求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时应注意定罪与量刑两个方面的全面评价,评价过程的逻辑顺序让刑事裁判文书的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法院裁判评价的过程,感知司法过程的严谨与威严所在。

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裁判文书罪数说理的考察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判决书具有可读性,刑事判决书语言表达生动、贴近现实生活。台湾地区向来把竞合的问题视为罪数论问题,认为罪数论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行为人触犯数罪时,法院是否要罗列所有罪名,宣告一个罪名还是多个罪名,最后又该如何定出应执行的刑罚”。^[6]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309条规定,“有罪之判决书,应于主文内载明所犯之罪。对于想象竞合犯,不论轻重,都应该把所触犯罪名罗列出来”,“借由这种论罪方式,也可以让人从主文中就清楚知悉行为人所成立的各项罪名。”^[7]

早期台湾地区刑事判决书关于数罪的要件与范围表达较为笼统,例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42年度台非字第11号判例”指出:“被告人等因图脱逃,继续两夜将监舍地基挖掘,系属一行为之继续活动。”^[8]在判决书中,法官仅简单把被告人的行为评价为一罪,法官把行为人两夜挖掘监舍地基的行为认定为一行为,并未对被告人是否属于接续犯作出判断和说理,便直接得出结论,作出结论的过程未曾得知,刑事判决书的厘清功能发挥不足。囿于当时刑事实务对于接续犯的要件与范围的认定不明朗,在早期的刑事判决书中关于罪数的说理较为笼统与罪数理论发展有关,特别是实务中罪数理论的发展。通过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解释争议、阐释实务和学说观点,实务界关于罪数理论的发展和说理就是在一个个鲜活的判例说理中发展的。特别是2005年台湾地区刑法的修正,原刑法第56条连续犯的规定被删除后,接续犯成为实务中罪数论重要的探讨对象,接续犯的认定在刑事判决书中的说理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与集合犯的区分,关系到定罪和数罪并罚。台湾地区刑法的修正对罪数理论在刑事判决书中的说理提出了要求,判

决书的说理不仅承担了罪数厘清的责任,还需根据罪数理论相关定义结合案情说理,有时还会对法条的立法原意作出法官的理解,罪数理论逐渐在刑事判决书中得到厘清和区分。

2006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年度台上字第307号判决”对于接续犯的说理如下:“意图营利使‘同一女子’与他人为性交易,或图利容留性交、猥亵犯行,系以经营‘应召站’之目的为之,在主观上乃基于单一之犯意,以多数举动接续进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时间、空间上有密切关系,依一般社会健全观念,难以强行分开,在刑法评价上,以视为数个举动之接续实行,合为包括之一行为予以评价,是色情经营者先后多次使‘同一女子’与他人为性交易等行为,具时间、空间上之密切关系,且系各基于单一犯意接续为之,应各仅论接续犯一罪。”^[9]该刑事判决书在接续犯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案例,认为意图让同一个女子与他人性交易的行为是因为单一的犯意接续而为的,认定为接续犯,应以一罪论处,成立共同意图营利而容留未满十八岁之人为性交易罪。

台湾地区的刑事判决书关于罪数的说理经历笼统、不明确到说理详细,通过观察可以看出,这与罪数理论的发展有关,如连续犯的规定被删除后,法官通过刑事判决书的说理厘清接续犯的概念。台湾地区的刑事判决书关于罪数论的说明更加详细,关于罪数的认定更加清晰,行为人通过刑事判决书主文可以得知法官定罪的具体评价过程。由于台湾地区刑法实务深受罪数论的影响,对于刑事判决来说罪数论是定罪科刑的理论基础。然而罪数说理存在着类似案件说理不同的问题,罪数论的发展与刑法实务的自我探索犹如一股麻绳上的丝线缠绕一起,一起向前延伸。

四、罪数理论如何体现于刑事裁判文书

201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该指导意见对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工作提出了要求,基于提高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的目的,裁判文书的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是裁判文书的两大重点。可以说,裁判文书说理的合理演绎是未

来裁判文书写作的发展趋势。

(一)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基础的建立

罪数理论适用于刑事裁判文书的前提是营造良好的司法氛围,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适用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刑事裁判文书中简单证据、说理不足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1. 营造良好的刑事裁判文书改革氛围

法官承担的各种指标考核带来的压力和司法责任制的实施带来的责任,诸多的限制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不足上。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要求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合理说理,但关于罪数理论如何体现在刑事判决书的说理中并未具体规定,这意味着,罪数形态的说理依赖于法官的合理发挥。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下,许多法官不敢“大展拳脚”,影响了刑事裁判文书罪数形态说理的发展,罪数理论与实践形成两张皮。罪数理论适用于刑事裁判文书需要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需要在更大的空间里进行,只有这样良好的氛围,罪数理论才能与具体案例结合,才能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因此,在刑事裁判文书改革中应把罪数形态说理的主动权交由法官,保障法官能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做到阐明事理。

2. 提高我国司法人员的法律适用能力

拘束司法氛围下的司法人员,法律适用能力令人担忧,在办案过程中越来越依赖司法解释,以致不敢有自己的判断或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信心。他们法律适用能力的不足表现在刑事裁判文书的书写中,出现如刑事裁判文书的书写模板化、说理的简单化与案件材料的简单堆砌,刑事裁判文书中突兀、直接的定罪量刑。我国罪数理论极具复杂性与争议性,现有的罪数理论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体现势必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与法律适用能力。制度构建得再美好,如适用的人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度的推行就有可能产生异化,增加我国司法改革的难度与不必要的成本。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与建立也对司法人员的裁判文书书写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司法人员在制度设计与推行中是重要因素,这些司法适用人员应具有灵活的法律适用能力,努力挣脱制度障碍与枷锁,真正从人的角度去进行制度建构。

(二)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要求的梳理

采罪数论或竞合论,争论不休,张明楷教授指出,“罪数论与竞合论所讨论的具体现象相同、目的相同,只是研究方法略有不同(但不矛盾),部分用语与归类有所不同,因而导致对部分问题(现象)的处理不同。”^[9]无论罪数论或竞合论如何争论,罪数的判断是定罪量刑的基础,更是刑事裁判文书厘清功能实现的基础,罪数的判断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得以具体体现。刑事裁判文书中的说理应把握下列基本要求。

1. 合理释明罪数形态

当行为人触犯数个罪名时,刑事裁判文书是否要把所有罪名罗列进来,罪名的宣告是如何作出的,最终的刑罚又是如何确定的,这个过程与理由是刑事裁判文书的重点内容,理应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分析。但多数的刑事裁判文书系直接给出结论,行为人涉及的其他罪名未加以评价,法律评价过程模糊,如果再碰到类似案件判决结果差异过大的情况,社会大众根本无法知悉差异评价的原因,刑法一般预防作用的实现更是平添困难。刑法理论的发展与司法实务的发展是一体的,如果刑事裁判文书无法合理释明罪数形态,只会导致罪数理论与司法实务进一步割裂,罪数理论未知实务的具体评价过程,罪数理论发展混乱无法为司法实务服务,实务亦是迷茫。罪数形态的合适释明限度应当是结合具体案情,对行为人所触犯的所有罪名进行评价,亦包括罪名的宣告。

2. 罪数形态释明符合逻辑性

罪数形态如何释明要以具有逻辑性为边界,评价时应遵循刑法理论的逻辑性。刑事裁判文书在释明罪数形态过程中应遵循两层逻辑,遵循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一罪或数罪的判断逻辑,此为第一层逻辑;在罪数判断的基础上,遵循罪数并罚与否的判断逻辑,此为第二层逻辑。第一层逻辑就行为成立一罪或数罪进行评价。一罪或是数罪的判断标准存在多种学说^[3],通说认为将犯罪构成标准作为一罪或数罪的区分标准,犯罪事实侵害一个法益,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即为一罪。“罪数的判断必须先依赖于—罪—的判断,而—罪—的判断实质上是犯罪成立的判断。”^[10]

因此,罪数判断采取犯罪构成标准说与我国犯罪成立的判断标准是一致的。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罪数

形态在刑法分则中的规定是混乱的,这些特殊的刑法分则规定并不一定按照罪数理论的判断标准定罪,在进行一罪或数罪的判断时需注意这些特殊规定。采用犯罪构成标准要求对犯罪的法益保护有所认识。犯罪构成标准解决了罪数的问题,罪数处断的问题交由第二层逻辑解决。第二层逻辑的任务是对数罪实行并罚与否进行说理,这正是罪数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该理论的实务意义。“司法实践中,正是因为缺乏罪数形态的说理,直接得出的结论要么把它忽略了,要么由于认定错误,该并罚的没有并罚,不该并罚的实行了并罚。”^[1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闽刑终 337 号^④于上诉人辩诉理由不采纳的说理为:“经查,无论我国刑法规定或者立法原意还是司法实践,对于独立的数起故意伤害的罪数形态,都是吸收并处,即以其中最为严重后果基准,综合考虑全案情节的原则量刑。”根据我国刑法第 69 条^⑤,刑法关于数罪并罚采取的是混合原则,当行为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与有期徒刑、拘役并罚的,采吸收原则;当数罪判处均为有期徒刑、拘役,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假设,行为人的两个故意伤害罪中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这种情况下采吸收原则,只执行一个无期徒刑;假设行为人的两个故意伤害罪中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受总和刑期和数罪中法定最高刑期的双重限制。但,此份判决书并未对行为人涉及的两个故意伤害罪进行分别评价,便直接得出结论:“独立的数起故意伤害的罪数形态是采吸收并处的结论。”此案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二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尽管二审判处的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刑罚符合人民法院的量刑规则,但法官说理却与刑法第 69 条数罪并罚的原则相左,且罪数形态说理不足。因此,此份刑事裁判文书不仅无法发挥裁判文书的厘清功能,反而还为数罪并罚理论增添迷雾。在罪数形态说理的第二层逻辑上,如果并罚与否不进行说理,被告人、上诉人、辩护律师乃至法律学习者、社会大众都无从得知该案量刑的过程,刑事裁判文书像是不可登顶的高塔。罪数说理第二层逻辑的展开首先应该是在数罪分别评价的基础上,对并罚与否进行说理与确定,“量刑的过程体现为法定刑—基准刑—调整刑—宣告刑。”^[12]

罪数理论说理逻辑的严密性与说理的透彻性是刑事裁判文书的两大特性,不仅记载着案件的裁判过程,也是对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另一种有力推进。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与刑法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绝不是形式上的改革。刑事裁判文书是为罪数理论的体系构建提供司法实践经验与样本,罪数理论的发展又为刑事裁判提供理论依据。刑事裁判文书的厘清功能体现在每一份刑事裁判文书中,厘清功能的实现也是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基础。

注释:

- ① 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4)海南刑终字第 184 号。
- ②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 2017 年度台上字第 307 号判决。
- ③ 罪数区分的学说包括法益说、构成要件说、行为说等。
- ④ 主要案情:2012 年 5 月 24 日被告人在饶某 2 家门口,向被害人饶某 3 讨要其哥哥的工钱时,双方打架,被告人持刀刺中饶某 3 的背部、腹部和大腿等,经鉴定饶某 3 的伤情为重伤乙级;2015 年 8 月 30 日,被告人在漳州金山湘菜馆门口,与被害人熊某 2 言语不和发生打架,从车上取了一把工具刀返回与熊某 2 打架,刺中被害人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的损伤程度鉴定为轻微伤。
-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69 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参考文献:

- [1] 庄劲.机能的思考方法下的罪数论[J].法学研究,2017(3):143.
- [2] 柯耀程.刑法竞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
- [3] 甘添贵.罪数理论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 [4] 王幼璋.刑事判案评述:渎职罪[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68.
- [5] 大学生闫啸天“掏鸟窝”案一审判决书(2014)辉刑初字第 409 号刑事判决书[EB/OL].(2015-12-05)[2019-05-05].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ws/201512/39562.html.
- [6] 张阿妹.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D].泉州:华侨大学,2015:14.
- [7] 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55-456.

- [8] 靳宗立.集合犯概念于台湾地区实务之运用[J].人民检察, 2016(16):71-73.
- [9] 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59.
- [10] 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J].法学研究,2009(4):130-131.
- [11] 刘宪权.刑法名师讲演录(总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93.
- [12] 吴情树.量刑结论如何说理论证[N].人民法院报,2018-10-10(3).

(责任编辑:张文静)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rime Number Theory to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Writing

ZHANG Amei

(Penalty Execution Department,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form of crime number in the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of our country, such as insufficient reasoning and model writ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number of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in Taiwan, the theory of crime number and judicial practice support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In the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different charges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when the crime number forms are involved, and the process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individual cases.

Key words: crime number theor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larify;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民法典编纂下关于人工生殖亲子关系的法律重塑

李 皎

(福建师范大学 法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0)

摘 要:人工生殖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殖辅助技术,现已被各个国家广泛运用。随着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逐年攀升,人工辅助生殖市场呈现出日渐扩容的趋势。传统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已无法解决人工生殖技术下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在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和民法典编纂的大背景下,应当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父母子女关系”下单列一节,对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认定的基本原则等做出规定,至于其他具体问题可在条件成熟之时颁布特别法加以规制,以体现其亲属法的本质,充分保护人工生殖子女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民法典;人工生殖;亲子关系;法律重塑

中图分类号:D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43-06

一、我国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认定的立法分析

(一)我国人工生殖技术的立法现状

我国首个捐赠胚胎试管婴儿于1988年在北京成功诞生,之后在冷冻技术完备的基础上建立人工精子库,我国的人工生殖技术不断完善和成熟。虽然较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且研究相对不够成熟,但其发展态势却相当迅猛。纵观我国立法,目前对于人工生殖技术的运用以及相关问题的规定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和一些部门规章。

1.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首次颁布了涉及人工生殖技术下子女的法律地位认定问题的司法解释——《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该解释中明确规定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双方经协商同意通过人工授精手术生育子女,则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参照适用《婚姻法》,该子女视为受术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该规定是目前唯一一条对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认定做出规制的司法解释,其在一定程度上为司法实务提供了裁判依据,但其指导范围有限,其仅仅对人工授精情况做出了规制,并没有提及人工生殖技术的其他几种情形。

2. 部门规章

随着人工生殖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卫生部于2001年2月和5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对人工生殖技术进行约束和规制的部门规章,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等。随后在卫计委的组织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原来卫生部出台的一系列办法进行了修改,这次的修改更注重对精子库的规范管理。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国家卫计委于2006年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培训基地认可标准及管理规定》,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管理的指导意见》。但是这些技术性规范只是对人工生殖技术层面的制约,其并不能有效的规制人工生殖技术所带来的复杂问题。

收稿日期:2019-5-18

作者简介:李皎(1992-),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法研究。

（二）我国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认定的立法不足

1. 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效力层级低

我国《立法法》规定下位阶法必须服从上位阶法，所有的法律必须服从最高位阶的法。《行政诉讼法》中明确司法机关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行政规章的效力仅限于“参考”。纵观我国关于人工生殖技术的相关立法，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还是卫生部出台的一系列关于人工生殖的技术性规范，其效力层级都比较低。且在面对司法案件时无法成为判决或裁定的最直接依据，其参照规章做出的判决亦不能有效的说服当事人，无法使此类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2. 法律体系不健全

从法律体系上来看，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不仅要有行政法方面的规章制度，还要从其他部门法加以规制。人工生殖技术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其不仅仅涉及到亲子关系认定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则，还涉及到人工生殖技术下子女的继承权份额纠纷等相关问题，以及当社会危害性较大严重侵犯当事人一方的合法权益时，能否通过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以实现对其犯罪分子的惩处。因此，我国对于此问题的立法仅局限于民法规制和行政法规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无法对辅助生殖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整。

3. 确认亲子关系的基础性制度缺失

自进入20世纪以来，“子女本位”立法原则已成为父母子女关系立法的世界性大趋势。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有采用。^[1]纵观我国的亲子关系相关立法，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没有从父母的权力中分离出来，在立法中仍坚持父母权力本位原则，缺乏“子女本位”的基础性思想与相关制度。^[2]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关于亲子关系的否认没有直接可用的法律援引，直到《婚姻法解释(三)》中才始有规定。因此基于人工生殖所带来的更多亲子关系的困扰，我们应当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二、在民法典中对人工生殖亲子关系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将人工生殖亲子关系纳入民法典加以规制的必要性

1. 辅助生殖技术的飞速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辅助生殖技术目前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其正以不可抵挡的态势进入人们的生活。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中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逐渐攀升到近年的12%—15%左右。^[3]辅助生殖作为治疗不孕不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成为很多夫妻完成生育梦想的首要选择。且据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大约有20%的不孕不育夫妇必须借助该技术才能实现生育。我国的辅助生殖市场近年来发展迅猛，一方面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国民知识水平不断提高，思想观念也逐步转变，社会和舆论对不孕不育的偏见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技术的成熟，目前我国辅助医疗技术成功率已达到60%。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展都需要制度设计来引导，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其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资源，更好的服务人类和社会。人工生殖技术也不例外。我们应当为其顺利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使新兴的科学技术得到更好的发挥和运用。

2. 可填补立法空白，提升立法层次，有效进行规制

人工辅助生殖相关立法的缺失和已有规章制度的效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等模式下的亲权纠纷日益增多，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众所周知，我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在进行，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接下来将会对各分编予以调整。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可在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中单列一节，对各类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的具体认定规则作出明确规定。以此来填补相关立法的缺失，提高立法的效力，维护各方当事人以及子女的合法权益。

（二）将人工生殖亲子关系纳入民法典加以规制的可行性

1. 域外相关立法实践

人工生殖技术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对各国的传统亲子关系认定规则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各个国家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积极的构建与该技术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则框架。有的国家颁布特别法加以规定,如英国 1990 年出台的人工生殖和胚胎法案,其中对人工生殖技术下子女的父亲与母亲的定义以及相关问题的做了规定;有的国家是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如《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采取人工授精方式怀孕或采取人工授精方式怀孕后再缔结婚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子女的,不管婚姻效力如何,该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4]从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构建起人工生殖下亲子关系认定的法律规范体系,为相关案件的处理和裁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使得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有法可依。域外立法成功经验为我国人工生殖亲子关系写入民法典增加了可行性。

2. 我国《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工作正在进行

2017 年民法总则表决通过,标志着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已经完成。2018 年 8 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已经初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在此基础上将不断征求各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对民法典各分编进行编纂和完善,预计于 2020 年 3 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法典。在这一大的立法背景下,为本文立法建议的提出增加了可行性。其中,在中国民法典分则的立法建议稿中,有学者提出涉及人工生殖问题的未来立法方向的建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提出:“人工生殖技术下出生的子女是协商一致采取该技术进行生育的双方父母的亲生子女。”^[5]同时,也有其他学者提出:“应在‘家庭关系’一章中增设有关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父母的认定规则,并明确相关法律关系……在 21 世纪这样一个生命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若我国民法典对如此重要问题依然不置一词或完全无视,那将后患无穷。”^[6]因此,在民

法典编纂这一大的立法背景下,相关学者的谏言献策也为本文立法建议的提出增加了可行性。

三、完善我国人工生殖亲子关系的立法构想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的确认,从本质上来说,其是属于亲子法的范畴。关于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认定立法模式的选择,从国外相关立法实践来看,有的国家是以特别法进行规定,有的国家是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笔者认为,亲子关系的确立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础,其对于婚姻法律关系的调整和遗产继承方面都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此其应属于基本民事制度的调整范围,理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制。^[7]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前文已述。同时对于在民法典中应以怎样的形式来规定,有学者提出,可将人工生殖亲子关系纳入收养制度中来,首先对我国现行立法中亲子关系的阶层做进一步具体的分类,然后将此技术下出生的孩子根据其不同情况一部分归为拟制血亲,一部分归为自然血亲。^[8]笔者认为,无须将人工生殖技术下出生的子女规制在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分类下,可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父母子女关系”下单独列一节,以对人工生殖子女亲子关系认定的基本原则以及几种主要的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认定规则做出规定,至于人工生殖其他具体问题比如对胚胎的研究范围、人工生殖技术的受术对象、“父母”的定义等可在条件成熟之时颁布特别法加以规制。这样既体现了人工生殖技术下亲子关系认定之亲属法的本质,使法律规范体系更加完整,又无须对现有的亲子关系阶层做出变动。

（二）基本原则

1. 保密认定原则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立法上都规定了人工生殖的保密认定原则。即精子、卵子的捐赠者和受精者、受卵者夫妻的个人信息都不应当被对方获取,进行人工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也应当对此保密。对于捐赠者而言,其通常不愿意承担养育子女的法律责任,而对于受术者而言,其采取此种方式生育子女实属无奈,并不想与精子、卵子捐赠者产生法律上的联系,仅仅只

是为了完成夫妻双方的生育梦想。保密原则可减少双方之间的冲突。

2. 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了每一个缔约国应当保证儿童享有被监护人保护和照顾的权力,应考虑子女的最佳利益。^[9]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也应当贯彻该公约保护儿童利益的精神。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老人权益的原则,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无论从保护其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保障其茁壮成长的物质需要角度出发,我们都应当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因此,在处理人工生殖技术所带来的相关纠纷时,应当考虑子女的最佳利益,确定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

3. 书面合同原则

人工生殖技术作为一种以科学手段来帮助妇女完成生育的现代技术,其将婚姻、性、生育分离开来,使传统亲子关系的认定发生了改变,因此带来的复杂问题也涉及到各个方面。为防止受术夫妻一方事后反悔,拒绝承认人工生殖子女的亲生子女地位从而损害子女的合法权益,医疗机构在进行人工生殖手术时应该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在手术前应对书面协议进行严格的审查。但是形式上的合法不等于内容上的合法,书面协议的内容也应当不违反国家关于人工生殖相关立法的规定,做到形式合法和内容合法,在其出现纠纷时,才可依据该书面协议作出裁判。

4. 禁止商业化原则

人工生殖技术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初衷即是为广大不孕不育患者实现其生育梦想,完成为人父母的愿望。若允许该项技术的商业化,使精子、卵子得以像普通的“物”一样交易,将会违背人工生殖技术发展的初衷,并且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并且从民法上的“物”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精子、卵子并不符合传统民法上关于“物”的定义。因此,在人工生殖技术中应当确立禁止商业化原则。

(三) 具体认定规则

1. 同质人工授精(AIH)亲子关系的认定

对同质人工授精亲子关系认定的讨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AIH 亲子关系

认定。若丈夫和妻子达成共识后采取同质人工授精生育,此时人工授精子女同自然出生的子女仅是出生方式的差异,应当认为该种情况下出生的子女视为婚生子,与自然出生的子女所享受的权利义务一样;若在人工授精手术中妻子未经过丈夫的同意,而通过欺骗或其他不当的方法获取精子,应如何认定。从事实上来看,人工授精子女与丈夫之间具有不可磨灭的血缘关系,从法律上来看,夫妻二人的婚姻处于合法存续的状态。在丈夫的知情权与人工生殖子女的合法权益之间,需要进行适当的权衡与取舍。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以及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应将人工生殖子女认定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较为适宜。第二种情况是夫妻婚姻关系终止后 AIH 亲子关系的认定。若妻子没有征得前夫的许可而隐瞒情况擅自使用前夫的精子进行受术,因精子不同于普通的消耗物,它使用的结果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因此丈夫的书面授权尤为重要。婚姻关系终止后,精子不再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妻子也不能随意支配。没有丈夫的书面授权书,则不能强求不知情的前夫或亡夫抚养。此种情况下出生的子女不能当然地认定为婚生子女,只能由妻子独自承担抚养责任。这体现了前文中阐述的书面合同原则。

2. 异质人工授精(AID)亲子关系的认定

异质人工授精技术中因精子是第三人所捐赠,因此亲子关系认定更为复杂。但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一个基本原则,即排除捐精者、捐卵者的亲子关系请求权,明确其仅仅是捐赠者的法律地位。我国最高院颁布的《复函》也体现了捐赠者无权请求亲子关系的精神。在此前提下分两种情况讨论,首先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进行异质人工授精手术。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为受术者进行异质人工授精手术的前提是有夫妻双方一致同意的协议书。夫妻双方签订一致同意进行人工生殖手术的协议书后即不得因孩子出生后有缺陷而反悔,否认与人工受精子女的亲子关系。^[10]基于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和诚信原则,此种情况下出生的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其次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未经丈夫同意的异质人工授精手术。此种情况下侵犯了丈夫的配偶权和生育权,

某些学者甚至将这种行为视为“无性交通奸”。^[1]因此应当赋予丈夫一定期限内的否认权。若在否认期限内,丈夫提起否认之诉要求解除亲子关系,则自法院做出判决之日起亲子关系解除,该子女仅是妻子一个人的婚生子女。若否认期限内丈夫没有提起否认之诉,则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原则和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丈夫与该子女自动形成父母子女关系,视为夫妻双方婚生子女。

3.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亲子关系的认定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依据精子和卵子的来源不同,可分为四类,妻卵同质体外授精、妻卵异质体外授精、夫精捐卵妻孕、供精捐卵妻孕。其中妻卵同质体外授精和妻卵异质体外授精同人工体内授精情形大同小异,只是授精以及胚胎形成的地点不同而已,因此判定此两类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时,只需参照适用人工体内授精相关规定即可。对于夫精捐卵IVF—ET技术下的亲子关系认定,前文已述应确立排除捐精者、捐卵者的亲子关系请求权的基本原则,因此也应认定为婚生子女。而对于捐精捐卵IVF—ET技术下的亲子关系认定,由于夫妻双方都无法提供合格的生殖细胞,均需由供精者和供卵者提供细胞,在此种情况下,人工生殖子女同夫妻双方均无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即便孩子出生,在其成长过程中也有可能由于没有浓厚的血缘亲情而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会对其身心产生不利的影响,若孩子出生后残疾或其他缺陷,受术夫妻也极有可能会后悔,从而产生更多的纠纷。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禁止此种情形的人工生殖技术,夫妻双方可以通过收养等其他途径来满足其为人父母的愿望。若其已经出生,则应结合夫妻双方愿意共同孕育子女的初衷和母亲十月怀胎的辛苦,以及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将其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4. 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

代孕问题目前在各个国家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其带来的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之间存在着冲突。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已承认非商业性代孕的合法性。我国现行立法对代孕行为仍持

禁止态度。但代孕行为的合法与否与代孕下出生的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无论立法是否承认代孕的合法性都应当对此情形下出生的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做出规制。对代孕技术下亲子关系的认定,目前国际社会上主要有分娩说、契约说、基因说与儿童利益最大说等主流学说。在已经有条件地承认代孕合法性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采取依据契约说与儿童利益说,通过司法程序来打破传统民法亲子关系的认定规则。^[2]笔者也赞同这种方式,即应以儿童利益最大说为主,契约说为辅。在对代孕技术下子女的亲子关系做出认定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子女的利益,以最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标准去衡量判断,具体可以参照父母离婚时子女的监护权归属的各项因素。代孕行为从一开始出现的初衷即是为了实现不孕者生育子女,为人父母的梦想。因此对于代孕契约,我们也应理性客观的看待。代孕契约体现的是不孕不育夫妻委托他人替自己生育子女,生育完成后自己抚养子女的真实意愿。因此,在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的基础上,应结合双方当事人术前的真实意愿,对亲子关系做出认定。

参考文献:

- [1] 夏吟兰. 婚姻家庭继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 [2] 蒋月. 20世纪婚姻家庭法:从传统到现代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3] 蒋莉. 基因编辑和人类生殖:社会伦理及法律规制[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4):125-134.
- [4] 徐涤宇. 婚姻家庭法的入典再造:理念与细节[J].中国法律评论,2019(1):109-119.
- [5] 孙宪忠. 中国民法典分则立法建议稿[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编纂项目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中心,2017.
- [6] 罗师. 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几点建议[J].时代主人,2018(7):32-33.
- [7] 刘征峰. 家庭法中的类型法定原则基于规范与生活事实的分离和整合视角[J].中外法学,2018(2):472-492.
- [8] 陈嘉白. 准自然血亲的提出及其法律意义[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32-139.

- [9] 安玲玉.体外受精胚胎的法律属性[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0-304.
- [10] 周平,胡纪平.异质人工生殖中亲子关系界定之法律准则探讨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 125-129.
- [11] 张燕玲.人工生殖法律问题研究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 [12] 杨芳.人工生殖模式下亲子法的反思与重建:从英国修订《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谈起[J].河北法学,2009(10): 117-122.

(责任编辑:陈 果)

Under the Civil Code Compilation Regarding the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 Legal Remodeling

LI Jiao

(School of Law,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0)

Abstract: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as a new type of reproductive assistance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countr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infertility rate of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the market of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has been expanding in recent years. The traditional rul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ave been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the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social ethical proble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wo-child polic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ction should be listed separately in the Civil Code,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under artificial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should be stipulated. As for other specific issues, special laws can be enacted when conditions are ripe,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nature of the law of relatives and ful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hildren of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Key words: the civil code;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reshape of the law

文学翻译中原语文化预设与受众定式思维考量

林佳佳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语言与文化、思维相互依存,译介文学作品中的原语文化,常囿于译语受众的定式思维,易产生误读误解现象。鉴于原语文化预设和受众定式思维或趋同或趋异,在文学翻译中,以受众为中心,结合具体语境,可采取合适的音译、直译等翻译策略,利用原语文化预设,积极促进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或是意译、注释等翻译策略,克服受众定式思维的消极抑制作用。

关键词:文化;预设;定式思维;文学翻译;受众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49-05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蕴含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传达作者的情感态度,是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缩影,反映现实生活和文化背景。而文学翻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促进各国文学思想、语言艺术、道德习俗等文化交流与传播。原语文化预设和受众定式思维是文学翻译过程常见的要点难点。原语与文化关系密切,某些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隐含于原语中,流露于字里行间,原语读者无需解释便知晓其含义及道理。但是由于译语受众对其直译内容存在与自己本地文化相应的定式思维,缺乏原语预设的文化知识,容易产生阅读障碍甚至误解,“翻译时既要注意文化差异,又要尽量传递文化信息”^[1]。考虑受众定式思维对文学作品中原语文化预设的翻译帮助极大,从而更能确保翻译的信度与效度,得到译语受众认可,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本文将分析文学作品里的文化预设和定式思维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探析文化预设和定式思维在文学翻译中对语言生成和理

解过程所起的作用,寻求合适的翻译策略。

一、原语文化预设与受众定式思维

(一)原语文化预设

预设指在句中真实性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推论或命题,主要作为该句子适当使用的某种前提条件^[2]。即说话者在说话前预先设定的内容。主要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包括存在预设、事实预设、反事实预设、词汇预设、结构预设和语音预设等,语用预设包括事实预设、信念预设、状态预设、行为预设、文化预设等^[3]。文化预设指一定社会中被人们所共识但以潜在假设形式存在的信条和理念。这种潜在形式为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群体所接受与共享^[4]。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文化预设,类属于语用预设,是利用人们的原语知识并将之作为生成和理解文本的前提。预设的文化知识体现在原语中,没有附加解释,而是作为预先假定的人们共识的内容。

文学作品中文字传达的信息除了表面的语言意思,还包括一些非语言内容,如叙述语境和背景文化等。当原语中相关文化因素为作者与其意向读者交流

收稿日期:2019-06-12

作者简介:林佳佳(1994-),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时双方所共有的,便可适当进行省略,在不影响读者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与接受情况下,节省笔墨、突出重点等。

(二)受众定式思维

定式思维是一个人依据其生活习惯或以往的生活经验养成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其优点是能够利用以往的知识 and 经验迅速解决新问题;缺点是会将一个人的思维束缚在固定的思维模式下,继而墨守成规,遇到新问题时无法创新^[6]。定式思维是社会团体共同的想法和看法,体现在翻译和阅读过程中也是有利有弊。译者和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多年以来的经验轻松地译出或解读同类的文章,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译者和读者在翻译和阅读的过程中很可能理所当然的将西方文化按中方文化的方式去理解,从而失去了原文的特色,造成翻译或理解错误。所以尤其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扬长避短,努力克服定式思维给受众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文学译本中二者的关系和作用

文学翻译时“不管怎样译者必须具备作者预先假定读者拥有的知识”^[6]。且“译者须知,不仅是原语预设信息的缺失,译语文化预设的存在也可能‘主动地’影响翻译”^[7]。这种作者预先假定读者拥有的知识,文学作品中表现为文字预设的信息,当然也包括原语文化预设。而存在于译语文化中的预设,可以理解为译语受众自己的背景文化,根据这种自身背景文化对某些特定表达的理解,通常比较稳定,即定式思维。换句话说,原语内容对于译语受众,或缺失或变更原语文化预设信息,其中预设信息变更的原因与译语受众的定式思维相关。

某些内容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所共知的,因此不必要详叙,预设便是节省了这一阐述的时间^[7],也让行文避免冗长繁琐,更为简练流畅。原语文化预设亦是如此,能够使文章表达更加生动形象、简洁明晰,突出重要内容,更富文化底蕴。预设信息与读者背景文化相贴近,有时也起到拉近读者与作者间距离的效果。而受众定式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读者的思考,引导或阻碍读者理解作者原语文化预设内容与想要表达的内在涵义等。原语与译语文化趋同时,受众定式思

维起积极帮助理解作用,两者文化趋异时则产生消极抑制影响。

原语文化预设之于文学不可或缺,却也是翻译领域一个棘手的问题,某些信息转换到另一种民族文化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预设信息缺失或因受众定式思维而变更的窘境。倘若目标受众无法领略到原语文化预设信息,不知所云,翻译时理应寻找合适的渠道,克服受众定式思维的消极抑制作用,解释和传达文学作品原意,提高译本的信度与效度。

二、文学翻译实例及相应策略

文学翻译中出现的文化预设,含有作者和读者共有的知识、信念、思想态度、价值观、道德习俗等,这些与译语受众的定式思维不尽相符,所以在什么情况下选用哪种翻译策略是文学翻译需要考虑的要点。翻译策略主要包括音译、直译、意译和注释,其中注释可以分别搭配音译、直译和意译等方式进行翻译。根据受众的具体情况(包括重视其情感、认识、信念、好恶、价值取向等)决定说些什么话以及应该怎么说^[8]。原语文化预设与受众定式思维趋同时,可采取音译或直译的方式,若两者趋异时,则最好采取意译或注释等方式翻译。

(一)原语文化预设与受众定式思维趋同

1. 音译

音译指用发音近似的原语翻译外来语,而这种用于译音的文字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语音和书写形式。一些词汇背后预设着丰富的背景文化,极具原语国家、文化及语言特色,或在某种方面有代表性,又或者是其预设文化信息对受众来说已经清楚明白时,那么翻译时若想要保留原文的这些特色,就需要用到音译的方法。比如“饺子”译为“jiaozi”,“功夫”译为“kungfu”,“豆腐”译为“toufu”,“拼音”译为“pinyin”,“chocolate”译为“巧克力”,“coffee”译为“咖啡”,“jazz”译为“爵士”,“humor”译为“幽默”等,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富含地方特色的词语已经被国际受众接受,其中的背景文化也逐渐为受众熟知,属于原语文化预设与受众定式思维一致的情况,因此音译这类

词汇即可。

例 1. 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庄子:大宗师》)

译文: The relationship of yin and yang to a man is no less important than that of parents to a child. (Mair 译)

在这个例子中“阴阳”是中国文化与外国相比较为特别的一词。《荀子·礼记》中说:“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其中“阴阳”代表天地,是阴阳五行学说里的核心概念,包含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的哲学思想。这个词本属于译语受众缺失原语预设文化的一种情况,但由于全球化的扩大、文化交流的加深,在一些场合下如果确定受众知道这个词,则可以采用音译,否则从受众中心出发,还是要译出预设信息。

2. 直译

直译是按照字面的顺序或意思进行翻译,既保留原文内容也保留原文形式,在文学翻译中能够较大地保留原语语言文化的本来特色。在文中原语文化预设符合译语受众定式思维时,可采取直译方法。比如“调虎离山”译为“to lure the tiger away from the mountain”(Wee&Lan 译),虽然国外受众在同样的语境下可能不是这样表述,但是直译的内容道理浅显,受众的定式思维不会影响对译文的逻辑推理和内容理解,所以对于这个短语直译是可行的。以下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例 2.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

译文: Possessed of courage but devoid of morality, small man will be a brigand. (于丹 译)

例 3. 像这样的小人你能让他去谋国家大事吗?(《论语心得》)

译文: Can you let this kind of petty individual plan great matters of state? (于丹 译)

“小人”一词在于丹翻译的英文版《论语心得》中被直译为“small man”“petty individual”,后文中还出现了类似的表达,如“petty person”“the petty”等。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家中“小人”一词预设着喜欢做搬弄是非、挑拨离间、隔岸观火或是落井下石的人,与“君子”和“贵人”相反。而小人的概念外国也有,“petty individual”“petty person”和“the pet-

ty”除了卑鄙的人的含义之外,也有普通人之意,“small man”还有矮个子的意思,所以首次出现“small man”的时候,为了避免歧义,译者在其后补充了“small-minded”和“second-rate people”等词解释说明,在作品其他处则基本都是直译。一方面是因为首次出现“小人”一词时译者有稍作解释;另一方面受众由这个词的直译内容产生的定式思维,对理解文中词语预设的内在涵义和文化的负面影响比较小,该词在英文中有相似表达,因此该作品后文中对这一个词的直译对于受众来说很好理解。

(二)原语文化预设与受众定式思维趋异

1. 意译

意译指翻译原文的大意,与直译不同。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差别比较大的时候,直译某个词或句子可能会因受众的定式思维而传达不了文化预设信息甚至产生语义变化,这时意译便能够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在不改变文章意思和不产生误解的前提下,用译语受众所熟悉的表达方式重新组织语言。比如“confidence man”应译为“骗子”而不是“信得过的人”,“eleventh hour”译为“最后时刻”,“smell a rat”译为“怀疑”而不是“嗅到了老鼠”等,这些属于英汉语言翻译中的假朋友,直译容易因为受众的定式思维产生歧义,最好意译。

例 4. My maternal grandfather, it is true, was cut off in the flower of his youth at the age of sixty-seven, but my other three grandparents all lived to be over eighty. (Bertrand Russell, How to Grow Old)

译文: 我外祖父虽然是风华正茂之年就去世了,当时他只有六十七岁,但是我的祖父、祖母和外祖母却都活到八十以上。(庄绎传 译)

在这个例子中,根据上下文可知“my other three grandparents”指的是在祖父母、外祖父母中除了外祖父之外的其他三个人,但是由于称谓语的文化不同,英文“grandparents”既可以表示祖父母也可以表示外祖父母,只要在前面加上数字或放在某些语境下,就能知道具体是表示什么意思。而中文比较重视伦理关系、辈分等,所以称呼语分的比较细,“祖父母和外祖母”相对于英文来说无法用一个简短的词来表示,如

果直译成“三个祖父母”或“三个外祖父母”不仅违反受众定式思维,而且在逻辑上也行不通,这时意译的效果更好,清晰明了地表示出了文中的人物关系。

2. 注释

注释可以有音译加注释,直译加注释,以及意译加注释等方法。

例 5. 君子……(《论语》)

译文: junzi… (于丹译)

Note: The word junzi, which appears more often than any other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describes Confucius's ideal person, who anyone of us, rich or poor,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小人和君子是《论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前面提到了“小人”一词直译的英文表达与受众定式思维趋同,在一些语境下可以直译,也容易理解,而“君子”则不适合只是直译。不少人把“君子”译为“gentleman”,但是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君子”的文化预设是人格高尚或地位崇高或学识渊博,而“gentleman”指的是绅士,有礼貌、举止得体、待人友善,两者的涵义差别比较大,若这样译受众会错误地把自己对于“gentleman”这个词的理解当作“君子”,也就没办法深入了解这个词了。再者,辜鸿铭将这个词译作“a wise man”也不够准确,可译为“a man of superior virtue”“a man of high rank”“a man of wisdom”,这样才能较完整地表达出“君子”的意思。或者就像译例一样,将这个预设文化内容丰富的词语音译,并添加注释予以说明,既能保留原语的语言特色,又能更加准确地传达该词含有的文化。

例 6. Everything except the wings around my face is red: the colour of blood, which defines us. (Atwood, *The Handmaid's Tail*)

译文:除了包裹着脸的双翼头巾外,我全身上下都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那是区别我们的标志。(陈小慰译)

注释:故事中的使女被要求过修女般清心寡欲的生活,担当的任务却是为上层人物繁衍子嗣。她们的服装标记不是普通修女肃穆、素净的黑色或白色,而是象征性与生育的红色,在此极具讽刺意味。

句中“the colour of blood”指的是“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但是居住不同区域、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对颜色的认识存在些许差异。英文中红色常与“血”“火”联系在一起,表示残酷、激进;而中文中对红色的印象大都表示喜庆吉利。此时,中文受众可能会受其定式思维的影响,误解作者想传达的意思,难以获取原语文化预设内容。因而英文直译为中文时,译者添加了注释,指出红色代表的涵义,并非褒义,而是性与生育,点明了使女的任务和身份特征。

三、结语

文学作品中常使用文化预设,能够使文章表达生动形象、简洁明晰,不仅突出重点,更富文化底蕴,同时拉近读者与作者的间距离。而文学翻译过程的一个难点是文化预设信息的转换,可能发生信息缺失或因受众定式思维而变更。倘若目标受众无法领略到原语文化预设信息,不知所云,翻译时理应寻找合适的渠道,克服受众定式思维的消极抑制作用,解释和传达文学作品原意,提高译本的信度与效度。翻译策略主要有音译、直译、意译和注释,包括注释分别搭配音译、直译和意译等方式。笔者认为,通过考虑受众,结合具体语境,可采取以下的方法:当原语文化预设与受众定式思维趋同时,可采取音译或直译的方式;若两者趋异时,可采取意译或注释等方法;当然若预设信息没用或某些词语没有实际意义,也可删减不译。

参考文献:

- [1] 陈小慰. 新编实用翻译教程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168.
- [2] HUANG Y. Pragmatics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65.
- [3] YULE G. Pragmatics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7.
- [4] NIDA E, WILLIAM R.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M]. New York: Maryknoll of N. Y. Orbis Book, 1981: 14.
- [5] 王薇. 定式思维下英汉翻译的不同及翻译窍门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7 (35): 220-222.
- [6] DURIEUX C. La recherche documentaire en traduction technique: conditions nécessaires et suffisantes [J]. Meta, 1990, 35

- (4): 669–675.
- [7] FAWCETT P. Presupposition and Translation [C]// Hickey, Leo, eds.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Topics in Translation*.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122, 120.
- [8] 陈小慰. 翻译与修辞新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102.

(责任编辑:白琳)

On Presupposition of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and Stereotype of Target Audienc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 Jiaj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Language, culture and mindset are interdependent.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 in source language (SL) of literary works is often constrained by stereotypes of its target audiences,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generate misunderstanding. Since the SL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and audiences' stereotypes will be convergent or divergent, prop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mbined with audience-centered theory and specific contexts, could be applied to literary translation, like transliter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so as to take advantages of the SL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fre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could be adopted to overcom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audiences' stereotypes.

Key words: culture; presupposition; stereotype; literary translation; target audience

“非遗”将乐南词传承现状考察

唐进宝

(三明学院 教育与音乐学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将乐南词(闽北南词)是福建地方音乐文化的重要遗存,同时也是江浙音乐文化南迁的佐证,是研究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材料。其艺术形态独特,备受欢迎,却在主观与客观环境的影响下,没有展现其应有的身姿。置于非遗生态环境下,对将乐南词生存及传承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与分析,重新审视南词非遗保护之关照与生态环境,以期回归它的“传统”,透析传承发展现状,旨在为更好地探讨音乐类非遗项目的生态环境重构与传承发展探寻路径。

关键词:非遗;将乐南词;生存;传承现状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54-09

中国的地方音乐文化根植于民间(主要是农村),成熟于城市,同自己的生态环境是一种互动关系,生态环境培育、影响、制约着地方音乐文化,地方音乐文化也适应、影响、表现生态环境。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文化浪潮,使其生存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衰败渐微,令人发思。生存环境的凋零致使其生态环境也随之消亡。将乐南词也不例外。然而,在非遗生态环境下其核心宗旨在于要“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文化遗产与人们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1]笔者曾多次赴将乐地区调研,以将乐文化馆等单位为传承与发展南词而进行了不懈地努力,然而,通过访谈,笔者深感痛心,责问其生存的初始生态环境何在?实质上“非遗”的核心宗旨已与今天的“生态环境”是矛盾而相悖的。因此,探讨“非遗”将乐南词如何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就是修复将乐南词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问

题,进一步说,涉及回归生态环境后在其互相依存的基础上“非遗”将乐南词如何传承与发展的的问题。溯本追究,应从剖析其“非遗”生态环境语境入手,考察其生存现状,梳理其传承脉络,探寻其消逝的原因,提出举措,为传承发展树立标识,避免误入非“非遗”的境地,为重构南词的生态环境与传承发展而探析路径。

一、“非遗”将乐南词及其生态环境

(一)“非遗”将乐南词

伴随着“非遗保护”吹响的号角,地方音乐文化遵循各自的艺术发展规律而找到了传承发展的自我。作为三明市第二批入选非遗、2011年省人民政府列入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将乐南词,在2008年11月被国家文化部誉为“南词表演之乡”和“音乐之乡”,成为名副其实的“非遗保护”之关照对象,其关照实属地方音乐的“文化自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源头和共同财富,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因而其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还具有共同性,其基本特征有:“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2]由此可知,在“非遗”生态环境下,地方音乐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要靠音乐文化本身和传承本身的文化自觉,使“原生

收稿日期:2019-10-15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暨三明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目(JAS170458/A201706);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7C073)。

作者简介:唐进宝(1982-),男,汉,讲师,主要从事二胡演奏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态”的地方音乐文化以“现代化”的方式传承创新。

地方音乐文化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平衡性体现为保护与传承的长久性,这是制约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之根本所在。其维系着音乐文化生态系统的生命力,而辩证地看待和理解二者涵义才能真正承传、振兴,因为承传和振兴才是最终的“非遗保护”之“成品”,承与传、振与兴正是非遗音乐文化回归传统、构建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文化空间”,故而,“传承”需要载体,而音乐类非遗的传承除了依靠非遗项目认定的“传承人”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依靠专业音乐院校的师生群体,因为他们对于音乐文化所具有的敏感度、认知度以及所掌握的音乐技能,是其他人群不可比拟的,所以说他们应当成为传承音乐遗产的最有效载体。^[3]从传统音乐文化属性的社会性、民俗性、稳定性、变异性作为研究视角,将乐南词需将民间传承与高校传承、活态现场与剧院现场、政策保护与落到实处、口传心授与书面教学、理论与艺术实践、梯队衔接与培养演员、当下传承与历史反思等相统一,做到“移步不变形”,让其成为闽北地区音乐文化的特色与品牌。

(二)将乐南词的生态环境

所谓的“生态环境”实则为“原生语境”,“即是在文化的原始环境中的呈现。它是大众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亦为一个社区、一方地域或一类社群的一种社会象征符号。”^[4]“在某种文化环境或语境中,某种事物和形象,某种情景或情节,某种观念或思想,成为表达另一种意义的手段。”^[5]这种社会象征符号和手段构成了地方音乐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或曰‘文化场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的本原意义指一个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6]音乐类非遗都与其定期开展的文化、宗教、民俗活动即它们的“文化空间”紧密关联。而“文化空间”则是依托“非遗保护”的活态传承进行而延续。笔者在将乐县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发现,包括将乐南词在内的民间音乐基本保持了传统的功用以及传播传承方式。其功用主要还是娱乐性,即自娱自乐;随着当下音乐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将乐地区的民间音

乐则主要以新的功用以及传播传承方式再生。然而,其再生是基于将乐南词“文化空间”的活态传承,必然要回归“传统”语境。

“传统”一词的使用,往往与学科而已。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虽然意味着许多事物,但是其最基本的意义是指时代相关的东西,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是人们在过去创造、践行或信仰的某种事物。^[7]也就是,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的文化力量,是人类创造的、赋予象征意义的所有产品的复合整体。将乐南词经民间艺人刘怀中老师证实确源于浙江婺剧,其音韵特征的基因中展现了很强大的稳定性与其象征意义,自南词流传至将乐起,最早由民间艺人构成的南词表演班社便与当地的观众形成一种良性生存的生态环境,即是一种表演者与观众的互动模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流制度和行为规范,生存于将乐特定的民俗情景下的互动语境。“表演是表演者和观众互动的过程,传统的内容必然成为双方共享的文化空间。”^[8]正是一种互动语境,将乐南词得以保持其流传之初的形态特征的同性和连续性,回归的使命延承了南词来源于浙江婺剧的传统,黄翔鹏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南词正是遵循着这种传统在将乐积累并流动着,应和着梅兰芳先生“移步不换形”的真谛,南词的民间艺人靠口传的方式进行着南词的传统流动。

二、将乐南词的生存及传承现状考察

(一)生存现状

俗谓“八韵”之将乐南词,是区别于赣、闽西北(主要是南平)等地的南词唱法。长期以来,将乐南词的研究始终是空白。虽在六十年代初,伴着民间艺术保护抢救之风,南词被重新挖掘,但没有人来研究,留下的两个油印本和一套手抄本的简谱和唱词资料也已失传。那对于这种“原生态”的音乐样式被从民间挖掘整理,对于它的在民间和当下的艺术形态研究少之又少,在将乐县民间一直处于零散的传承与发展状态,较为发散与缺乏专业,更没有走进剧场演出的机会,对于将乐南词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

只显于纸面与政策,没有落到实处,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间的流逝,濒临灭亡,值得深思。除将乐县文化馆的南词演出队及其民间业余乐队等群体,很少有人关注,只是在将乐县的民间零星残存。原福建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曲家章绍同先生于1978年3月给刘怀中老师的信中提到:“说实在,地区或是省里,目前懂得南词音乐的人寥寥无几,这次我本想希望你能写几个曲子,以供赴音乐会只用,可惜你当时行色匆匆,县宣传部同志以实情相告,只要‘望山兴叹’了。”^①

作为闽北南词杰出代表的将乐南词,其词曲优美,风格独特,不论是传统曲牌、现代曲调,还是庙会南词、婚庆南词,无不流淌着旋律古朴优雅的韵致,备受群众所喜爱,却在主观与客观环境的影响下,没有展现其应有的身姿,只见《漳州南词的传承与发展初探》^②《将乐南词戏的形成和演变》^③等文章的粗浅研究,对于将乐南词的传承与发展的纵横研究为空白。置于“非遗”生态环境下,在保护南词文化方面已采取

了积极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目前活动群体长期分散于民间,使得传承、整理、创编、展示等工作效果不够显著,随着岁月的流逝,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民间艺人逐渐减少,使得这些独特的音乐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巨大危机。

(二)挖掘现存的唱本曲谱及伴奏乐器

笔者秉承长时间、跟踪式的实地考察,通过采风、录音、录像、记录工作,运用音乐形态学和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从纵向与横向深度剖析,探究传承与创新的“生态链”,对于这种老少皆宜、风格独特、体系完整、曲牌优美的艺术,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域下,对将乐南词现存的唱本曲谱及伴奏乐器作一番探索,分别从民间老艺人所传南词唱本(表1)、传统南词唱腔作品(表2)、刘怀中老师创作作品(表3)、抽样多支南词乐队的伴奏乐器(表4)等方面进行爬梳,以还原其历史上的真面貌,挖掘其传承载体,努力做到“活态”“原汁原味”的传承与发展。

表1 将乐南词民间老艺人传南词唱本一览表

Tab.1 List of songs of Jiangle Nanci folk old artists biography of Nanci

| 老艺人姓名 | 何许人 | 时间 | 唱本名称 | 唱本形式 | 由来 |
|-------------|-----------|-------|--|-------------|-----------------------|
| 陈文轩、袁巧兰、张文仪 | 将乐县 | 不详 | 《小调》《南词》 | 油印本,只有简谱和唱词 | 钟灵先生据三位老艺人之口授记录整理 |
| 由将乐民间戏曲社老艺人 | 将乐县 | 1963年 | 《南词天官》 | 油印本 | 由将乐民间戏曲社印的第一本 |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南词老唱本《安安送宋》、北调老唱本《九子陞官》 | 手抄本 | 不详 |
| 杨远芬 | 将乐县 | 不详 | 《南词天官》、《出腊见母》、《张公义九子陞官》、《苏文表借衣》、《丢包教子》、《孔子游春》、《断桥相会》 | 手抄本 | 不详 |
| 杨顺发 | 将乐县万安镇 | 不详 | 《僧尼相会》 | 遗留的南词唱本 | 不详 |
| 杨顺发 | 将乐县万安镇 | 不详 | 《断桥相会》 | 手抄本 | 杨顺发传给儿子杨志中的南词唱本 |
| 廖书棋 | 将乐县南口乡蛟湖村 | 不详 | 《九子陞官》 | 手抄本 | 廖书棋传给南口乡蛟湖杨根林再传给其子杨冬生 |
| 杨冬生 | 将乐县南口乡蛟湖村 | 不详 | 《闹五更》、《孔子游春》 | 手抄本 | 杨冬生搜集的南词老唱本 |
| 杨冬生 | 将乐县南口乡蛟湖村 | 不详 | 《渔樵耕读》、《将乐八韵南词》一本 | 手抄本和老唱本 | 杨冬生搜集的南词老唱本 |

表2 刘怀中老师根据老艺人所传编纂(选编)的传统南词唱腔作品一览表

Tab.2 Teacher Liu Huaizhong compiles (selects) traditional Nanci aria works based on the old artist.

| 作品名称 | 主要唱段及唱腔 | 作品题材及形式 |
|--------|--|--------------|
| 《天官赐福》 | 《雪宵华悦满仙台》(平板)、《大将南征胆气豪》(平板)、《连理枝头花正开》(平板)、《金殿当头紫阁崇》(平板)、《閤闾千门宝献开》(平板)、《九重春色醉仙桃》(弦索)、《福禄寿三星照》(紧板)、《众仙俱在云端上》、《八洞神仙浪滔滔》 | 将乐南词启蒙唱本(印本) |
| 《孔子游春》 | 《良辰美景好风光》(平板)、《胜日寻芳泗水滨》(平板)、《对面相逢上大人》(平板)、《姓陆名芳字水娃》(平板)、《西望长安不见家》(平板)、《清明时节闹盈盈》 | 将乐南词小戏(印本) |
| 《断桥相会》 | 《一派荒郊旷野中》、《法海东来结草蓬》、《缘何屡屡起波涛》、《上有青天把眼瞧》(平板)、《胆碎魂销在明朝》(平板)、《飘渺祥光驾在空中》(紧板) | 南词说唱(印本) |
| 《合钵收妖》 | 《俺思昨夜梦南柯》(平板)、《休听僧家皈三宝》(平板)、《从今莫把红尘恋》(清江韵) | 南词说唱(印本) |
| 《昭君和番》 | 《琵琶弹落孤鸿雁》、《哀哀哭出汉朝城》(哭腔)、《伤惨哭出了雁门关》(昆腔行板)、《望分关珠泪下》、《昭君五怨》(混合弦)、《别类泪涟涟》(平板)、《劝娘娘》(丑弦)、《心耿耿狠奸邪》、《鞦韆子调》 | 南词说唱(印本) |
| 《芦林相会》 | 《母病求医》(丑调哩罗腔)、《我是姜氏门内男子汉》(带板哩罗腔)、《休提起闲是闲非》(正调哩罗腔) | 南词说唱(印本) |
| 《卖草垫》 | 《青山绿水笑盈盈》 | 南词说唱(印本) |
| 《僧尼下山》 | 《马挂金鞍将挂袍》(丑调哩罗腔) | 南词说唱(印本) |
| 《杜保劝农》 | 外调的俳歌 | 南词说唱(印本) |

表3 刘怀中创作、习作的南词说唱主要作品一览表

Tab.3 List of the main works of Nanci rap created and studied by Liu Huaizhong

| 创作时间 | 作品名称 | 主要唱段及词、腔 | 作品题材及形式 | 由来 |
|----------------|-------------|---|-------------------|--|
| 1964年12月 | 《赵书记治水》 | 平板、北调的正板与数板互转 | 南词说唱(印本) | 刘怀中老师根据南平作者黄大铤写的一个赞颂将乐县委书记赵顶良的小册子里摘出一些内容改编创作,并于1964年参加省农村文艺汇演后 |
| 1965年 | 《赵书记治水》 | 平板、北调的正板与数板互转 | 南词说唱(印本) | 作品于1965年被选参加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唱:徐素娥、杨远芬) |
| 1973年初 | 《百花盛开春满园》 | 京剧《龙江颂》词 | 南词移植(印本) | 刘怀中老师移植京剧《龙江颂》唱段选的习作 |
| 1973年3月 | 《勇姑娘》、《迎新人》 | 不详 | 南词清唱(印本)、将乐花灯(印本) | 刘怀中老师习作 |
| 1973年3月 | 《李志宏回村》 | 北调的叠板 | 南词说唱(印本) | 刘怀中老师习作 |
| 1973年12月(文革时期) | 《扎根记》 | 《扎根山区干革命》、《红军岭山村巨变》、《路线正确粮满仓》、《红军岭上风光好》 | 南词小戏(印本) | 刘怀中老师经赵俭(1973年省下放干部)润色的习作,四支曲子是文革时期作品,故未同时录入唱词。 |
| 1975年9月(文革时期) | 《龙江颂》 | 《抢险不能再拖延》、《端起龙江化春雨》 | 南词移植(印本) | 刘怀中老师移植京剧《龙江颂》片段的习作,两首曲子根据其“窑场斗争”创作。 |
| 1965年7月15日 | 不详 | 不详 | 印本 | 创作作品代表南平专区参加省曲艺会演(杨远芬、刘怀中、徐素娥、杨容等) |
| 1976年3月 | 《李志宏回村》 | 不详 | 南词说唱(印本) | 创作作品参加福建省一九七六年曲艺调演(黄美菁、高兴芳、程苏萍、韩贤珍等) |
| 1978年以后 | 《哑背风》、《卖花线》 | 不详 | 南词小戏唱本(印本) | 作为传统小戏参加三明地区文艺汇演 |
| 2005年1月9日 | 《抢险救援勇士郑忠华》 | 《多年少见这般大雨》、《风驰电掣电离弦》、《军民鱼水情比海深》(紧板)、《一波未平一波起》、《千山低头哭无泪》、《一曲赞歌唱英雄》 | 南词说唱(印本) | 创作作品 |
| 不详 | 《路》 | | 将乐花灯 | |
| 不详 | 《孔明拜斗》 | 京剧原词 | | 根据京剧原词创作 |
| 不详 | 《元旦》(如梦令) | 毛泽东词 | 山歌风 | 根据毛泽东词创作 |
| 文革时期 | 《千杆战旗涌彩云》 | 未录唱词 | 歌舞曲(待商榷) | 此《千杆战旗涌彩云》与下曲《欢庆胜利》是文革时期作品,故未同时录入唱词。 |
| 文革时期 | 《欢庆胜利》 | 未录唱词 | 歌舞曲(待商榷) | 此《欢庆胜利》与上曲《千杆战旗涌彩云》是文革时期作品,故未同时录入唱词。 |
| 不详 | 《猜谜》 | 不详 | 将乐花灯 | 不详 |
| 不详 | 《采春茶》 | 改编南词《杜保劝农》俳歌 | 南词的外调俳歌 | 根据南词《杜保劝农》俳歌改编创作 |

从表1、表2、表3看出,现存比较完整南词唱腔的系列唱本,只见《天官赐福》,由于历史上种种的主客观因素,老艺人“口传心授”的曲谱大多失传,在张文仪关门弟子、将乐南词传承人刘怀中老师的近五十多年(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始,从学习将乐食闹音乐

开始)的传承发展中,挖掘了众多老艺人的南词唱本曲谱,并延续着将乐南词的音韵特征,研习、创作与改编了新南词作品,为挽救将乐南词音乐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较表5与表4,发现表4中南词代表性伴奏乐

表4 笔者根据赴将乐县多次调研(抽样)的南词伴奏乐器

Tab.4 The author based on Nanci accompaniment instruments that have been repeatedly surveyed (sampled) in Jiangle County

| 调研地点 | 乐队名称 | 乐队人数 | 乐队成员年龄 | 调研时间 | 乐队使用的乐器及数量 |
|---------------|--------------------|------|--------|----------|---|
| 将乐东门文化广场 | 县文化馆、县南词研究会乐队 | 16 | 60-85 | 2013年1月 | 京胡1、二胡5、三弦1、堂鼓1、竹笛2、唢呐2、小锣1(由唢呐兼)、小钹1、碰铃1、木鱼1 |
| 将乐县古铺镇 | 古铺镇南词器乐演奏队 | 12 | 60-85 | 2014年8月 | 京胡1、二胡4、月琴1、三弦1、堂鼓1、鼓板1、小锣1、碰铃1、木鱼1 |
| 将乐县万安镇 | 万安镇南词器乐演奏队 | 11 | 60-85 | 2014年8月 | 京胡1、二胡4、竹笛1、唢呐2、小锣1(由唢呐兼)、小钹1、碰铃1、木鱼1 |
| 将乐擂茶文化广场 | 将乐县文化馆乐队 | 11 | 60-85 | 2018年2月 | 京胡1、二胡4、竹笛1、唢呐2、小锣1(由唢呐兼)、小钹1、碰铃1、木鱼1 |
| 将乐县三华桥头社区戏曲广场 | 县老年大学南词班、人口文化南词艺术团 | 14 | 60-85 | 2016年11月 | 京胡1、二胡4、三弦1、堂鼓1、竹笛1、唢呐2、小锣1(由唢呐兼)、小钹1、碰铃1、木鱼1 |

表5 笔者根据刘怀中老师提供的历史上将乐南词演出(两次)的伴奏乐器

Tab.5 The accompaniment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formance of Jiangle Nanci (twice) provided by teacher Liu Huaizhong

| 演出地点 | 乐队名称 | 乐队人数 | 乐队成员年龄 | 演出时间 | 乐队使用的乐器及数量 |
|--------|----------|------|--------|----------|------------------------------|
| 福州人民剧场 | 将乐文化馆演奏队 | 10 | 20-35 | 1964年12月 | 葫芦胡2、二胡3、琵琶1、扬琴1、三弦1、鲍鼓1、尺板1 |
| 福州 | 将乐文化馆演奏队 | 10 | 20-35 | 1976年3月 | 葫芦胡2、二胡3、琵琶1、扬琴1、三弦1、鲍鼓1、尺板1 |

器葫芦胡已消逝,进一步翻阅历史资料,南词流传至将乐地区的“原生”伴奏乐器,像扬琴、琵琶、三弦、苏笛、京胡、二胡、板胡、云霄、笙、镜锣、铜鼓、渔鼓等,发展至今多数已不见踪影,而且现在乐队成员年龄均存在于60-85岁之间,乐队伴奏老龄化严重,且分散于民间,老艺人们都是在除工作以外的时间自发聚在一起以“自娱”的方式进行,大多是演奏水平低、音准差、音质劣、不系统,仅留有“民间味”的声响,反观将乐南词发展早期,比较两次赴福州的演出,伴奏乐队平均年龄才20~35岁,普遍年轻化,伴奏乐器的使用虽已不全,但还能看到葫芦胡的身姿,将乐南词伴奏乐器的现状令人堪忧。

(三)传承人与传承方式

传承必然涉及传承人与传承方式。传承人是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发展“活态”的根脉所在。“尽管人的文化创造力无限,由无数个体生命的生死传承及所留存的文化证明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存在,但是,个人

的生命只有一次,传统音乐的个中精华若没有薪火传承就只能随着人体的消亡而消亡。”^[11]“保护民间传人是全部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优秀传人代表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他们所身怀的‘绝技’正是我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在,传统就在;传人不在了,就意味着传统也消失了。”^[12]故人与人的传承尤为重要。笔者已通过将乐县文化馆、各乡镇等代表性南词传承人得知,南词从清朝中期传入将乐以后的传承方式一直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所谓“口传心授”就是通过口耳来传其形,以内心领悟来体味其神韵,在传“形”的过程中,对其音乐进行深入的体验和理解。^[13]随着南词在将乐扎根,城乡涌现出了一批有名南词艺人。所谓有名,一是能唱南词戏和小调,会使用多种民间乐器,并熟练到能自弹自唱。二是会创作和排演南词唱本(唱本略)。三是会演唱许多南词小调。笔者通过资料把南词传人有名的老艺人进行了一个大体的梳理。(见表6)

表 6 将乐南词传人有名的老艺人

Tab.6 The famous old artist who passed the Jiangle Nanci

| 南词艺人 | 同一辈老艺人 | 弟子人数 | 代表性弟子 | 教唱地点 |
|-------------|--|---------|-----------------------------|----------------------------------|
| 施梓里、陈运来 | 邱宗周、蔡根焘、施才才等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 肖老君(1879 生) | 施祖礼、廖慕书等 | 近 100 人 | 杨远芬(1923 生) | 城关、水南、湖管、井垅、张公等地 |
| 陈文轩(1900 生) | 王学诗、吴文明、施万言、施万隆、林荣根、邱端宿、郭连顺、熊火荣等 | 180 多人 | 不详 | 城关、大布、山门、元当、蛟湖、孙坊、湖管、占厝、积善、梅花井等地 |
| 张文仪(1903 生) | 不详 | 不详 | 刘怀中、徐素娥、王朝仁、刘秀清、许锦昌、杨蓉、陈秀兰等 | 城关南词班 |
| 杨远芬(1923 生) | 肖老君的入室弟子(小名“土土”) | 40 多人 | 不详 | 张公、水南等地 |
| 陈维绪 | 王渭宾、肖根奎、杨冬生、廖五金、何绍信、余根培、廖开达、彭时开、何绍连、江施贤、邱九金、廖伍仔、赖奴才等 | 880 多人 | 不详 | 城区夕阳红艺术队、县退休教师协会、南门少年南词班 |
| 严祥偕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南口村 |
| 冯兴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陈厝村 |
| 陈灶根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古铺镇大布村 |
| 卢坤祥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古铺镇山门村 |
| 谢金南、邢荣恩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大源乡增源村 |
| 黄玉畴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万安镇 |
| 黄明亮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高唐镇 |
| 谢胜水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黄滩镇 |
| 廖流光、廖根寿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光明乡 |

除上表中南词传承人外,还涌现了出大批南词爱好者,经常参加演唱的有陈贤凤、曹月清、占有娇、冯招姬、吴木娣、刘林芳、余小青、饶长仙、杨淑娟、王肃立、冯彩容、陈美金等 40 多人(估数),另有少儿南词班学员李丹萍、李心怡、廖诗雨等 17 人(估数)。南词乐队成员主要有黄良贵、张理钦、余世英、黄克忠、黄木荣、崔福民、熊老三、饶必信、卢原、廖开长、汤有水、杨辉、邹道程、肖高化等 20 人。

为此,笔者通过多次走访刘怀中、陈圣杰等代表性传承人,并结合上表和大量的文献、图片等资料,将将乐南词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关系之关键脉络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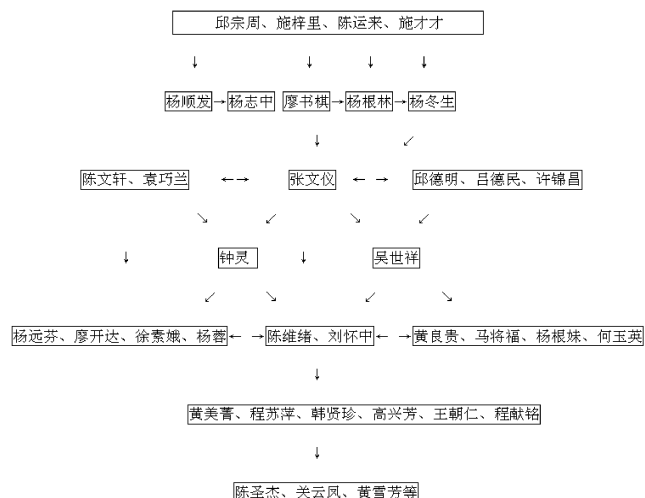


图 1 将乐南词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关系脉络图

Fig.1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s of Jiangle Nanci

从图 1 可以看出,从将乐南词传承老艺人张文仪老先生(由食闹音乐老艺人刘学诗力荐刘怀中拜师老艺人张文仪,为关门弟子)的口述与回忆中悉知,将乐南词传承已经历了七代。邱宗周、施梓里、陈运来、蔡根焘、施才才等老艺人是最早一批老艺人,教授了张文仪、王学诗、陈文轩、袁巧兰、杨顺发、廖书棋等学生,其中,“父承子传”也是将乐南词的一部分,杨顺发传给了其子杨志中,杨根林传给了其子杨冬生,而作为最早的将乐南词传承人陈维绪和刘怀中老师处于核心传承人的地位,据刘怀中老师介绍,将乐南词主要以原始的师传徒形式延续,基本靠口传心授,一直遵循“口传心授”的传承,实质上,音乐是通过“一人一人”的直接演唱、演奏来实现的一种过程,这种演唱、演奏是即时现场的,传者和承者都直接地参与音乐活动的唱、奏,传者以唱、奏来传授音乐,承者也通过唱、奏来习得音乐。^[4]在这种模式下,刘怀中老师不断的向民间老艺人取经、创作、传播与研习,掌握了大量正统的传统南词唱腔,传承、创新与发展成了其毕生的责任。“1978 年 3 月初,接著名作曲家章绍同先生一封信后,我突然感到责任重大。精通南词食闹音乐的老师父一个一个地走了,不知不觉中,传薪担子竟落在了我的肩上。绍同先生的提醒与建议使我萌生了为将乐南词食闹音乐写一点东西的念头。”“到了五十年代,虽然会唱南词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南词的人,仅张文

仪、陈文轩两位老先生。可惜文轩老又过早谢世。值得庆幸的是,张老先生总算收了我这么一个关门弟子。不无遗憾的是,十年浩劫,使我这关门弟子只能算半个,因为张老先生传给我全部他所掌握的南词唱腔,却来不及把他手中那些珍贵的文字资料交到我手。”^[15]从其后记中可以看出,刘怀中老师也是在持续的探究传承与创新的“生态链”,著有《将乐南词与食闹音乐》一书,印证了“人在则艺在;人亡则艺亡”^[16]之根本,涌现出一批有近10年的从艺经历的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黄雪芳、陈圣杰等,形成了将乐南词“人与人”的传承链。笔者通过分析其传承特征得出,将乐南词极为符合黄翔鹏先生所提出“四种类型划分”^[17]中的

“民俗型”与“乐种——雅集型”的结合。正是这种传统音乐生存的传承生态特征,使南词艺术得以传承与发展。

(四) 发展与保护举措

坚持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统一,挖掘其不受关注、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探寻传承创新的有效途径,在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学校、业余与专业之间打通一条传承与发展的途径与长效机制,渗透至三明市各级各类的学校系统。笔者经过长时间、跟踪式的田野调研,坚持实地考察与访谈,通过录音录像、记录工作,将南词根植中小学及高校课堂的传承代表曲目、代表学校及获奖情况等作了一个表格(见表7),以鉴其传承普及之力度。

表7 将乐地区的中小学及高校传承情况

Tab.7 Inheritan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Jiangle

| 学校 | 学校类别 | 伴奏形式 | 传承代表曲目 | 主要代表的获奖情况 |
|---------|------|------|--------------------|--|
| 艺术幼儿园 | 幼儿园 | 音频伴奏 | 《龙船号子》 | 传承南词艺术进校园展演活动入选节目 |
| 水南中心幼儿园 | 幼儿园 | 音频伴奏 | 《将乐美,将乐乐》 | 传承南词艺术进校园展演活动入选节目 |
| 实验幼儿园 | 幼儿园 | 音频伴奏 | 《牧歌》 | 传承南词艺术进校园展演活动入选节目 |
| 万安学校 | 小学 | 音频伴奏 | 《路》 | 传承南词艺术进校园展演活动入选节目 |
| 黄潭学校 | 小学 | 音频伴奏 | 《小鱼儿》 | 传承南词艺术进校园展演活动入选节目 |
| 水南小学 | 小学 | 音频伴奏 | 《天官赐福(喜星)》 | 传承南词艺术进校园展演活动入选节目 |
| 城关小学 | 小学 | 音频伴奏 | 《贺新春》、 《山无粮水无税》 | 传承南词艺术进校园展演活动入选节目 |
| 实验小学 | 小学 | 音频伴奏 | 《李寄斩蛇》、 《王婆数鸡》 | 2014年7月《李寄斩蛇》获福建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二等奖 8月获全国第六届少儿曲艺大赛三等奖 |
| 将乐四中 | 中学 | 乐队伴奏 | 《程门立雪》 | 传承南词艺术进校园展演活动入选节目 |
| 职业中专 | 中学 | 乐队伴奏 | 《抢险英雄郑中华》 | 2017年12月入选第二届福建省曲艺“丹桂奖”复赛 |
| 将乐一中 | 中学 | 乐队伴奏 | 《程门立雪》 | 2017年12月获第二届福建省曲艺“丹桂奖”南曲业余组节目三等奖和新人奖、文学奖、优秀组织奖 |
| 三明学院 | 大学 | 乐队伴奏 | 《香樟颂》 | 2015年11月获福建省“丹桂奖”电视曲艺大赛新人奖一等奖、创作奖一等奖、传承曲艺人气奖 2016年1月选送参加有福之春·2016福建省艺术院校新春音乐会的演出 2016年6月起赴永安、泰宁、宁化、建宁等其他县市演出 |

从表格中所列的主要传承学校,均以南词为音乐类非遗传承项目而根植课堂教学,并积极融入学校的美育课程,推进以传承南词艺术的校本课程,以展演比赛活动为传承载体,依托音频和小乐队伴奏唱习南词传统或新创作的作品,基本形成了幼儿园、中小学及大学等各个年龄段的传承梯队,呈现出以青少年为传承主体、辐射周围地区的良好局面,解决了长久以来南词艺术只在老年人传承的“边缘化”现状,传承脉

搏有力的跳动着。据悉,2017年12月27日,将乐四中将以乐南词为传承项目,认定为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18]届时教育部将继续支持传承学校的创建工作,给予一定经费支持,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和推广传承的典型经验。基于多次的调研与深入考察,并依据将乐县发展南词艺术的一个五年计划的视频资料(内部资料),将保护发展南词的举措整理如下表(表8):

表8 将乐县发展南词艺术的举措(五年计划:2008-2012)

Tab.8 Measures to Develop Nanci Art in Jiangle County (five-year plan:2008-2012)

| 时间 | 保护形式 | 计划任务 | 具体工作 | 经费预算及其依据说明 | 保障措施、管理督导 |
|------------|------|------------------|-------------|---|---|
| 2008年 | 静态保护 | 建立名录 | 整理、分类和归档 | | (一)1.建立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把保护南词作为其中重要一项工作,并纳入文化建设工作责任制; |
| 2009年 | 静态保护 | 编入将乐民俗丛书 | 成立编写小组 | 1.明年投入5万元; 2.依据说明:县财政列入保护计划给予资金3万元,县文化部门扶持1万元,民间筹集1万元; | 2.以乡镇为依托,建立乡镇南词表演队伍; |
| 2010年 | 动态保护 | 在将乐民间文化园内设置南词演艺区 | 健全一年一度的展演活动 | 3.地方配套资金。 | 3.与旅游文化结合,纳入镇发展文化产业规划。 |
| 2011-2012年 | 动态保护 | 进入旅游区进行展演 | 开发利用 | | (二)1.由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负责实施; 2.由县文体局负责管理、督导。 |

通过表格所列内容可见,将乐县各级各部门在传承与发展南词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从保护和发展“非遗”将乐南词的具体工作、计划任务、保护形式、保障措施、经费支持及管理督导等方面作了详尽地细化举措,对保护区域特色音乐文化生态,彰显了将乐南词的当代传承创新与文化自觉的指向性,呈现出闽西北地方音乐文化树立标识与品牌的良好势头,使“原生态”的地方音乐文化以“现代化”的方式传承与创新,做到“移步不变形”,构建“活态”、“原汁原味”的生存生态的文化空间,将乐南词已成为将乐县文艺舞台和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三、结语

将乐南词作为闽西北地区优秀地方音乐文化的代表,其承载了江浙戏曲文化南迁的音乐传播。置于非遗保护的当下,从真“非遗”之关照谈起,旨在重新审视其“非遗保护”,而不只是打着“保护”的旗号而“移步变形”,真正使“口传心授”的将乐南词“活态传

承”,将濒临消亡的南词音乐文化回归传统,重构其生态环境,通过在将乐当地的大量调研和考察,从将乐南词生存现状的历史脉络中挖掘其曲谱、伴奏乐器、传承人及传承方式等,为其真“非遗保护”探寻路径,以强烈的当代传承发展与地方音乐文化自觉的指向性,重构南词“活态现场”的生存生态文化空间,从根本上解决长久以来包括将乐南词在内的音乐类非遗项目只在老年人传承的“边缘化”现状,延伸承传的脉搏,将“非遗保护”真正“保护”起来,做到实实在在的传承与发展。

注释:

① 摘自:1978年3月2日章绍同写给刘怀中老师的信函内容。

参考文献:

- [1] 福建省文化厅: 闽南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 [EB/OL].(2007-06-07) [2019-09-10].<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MTWH200702036.htm>.
- [2]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2006:60-68.
- [3] 甘绍成,杨明辉.将音乐类非遗项目引入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的思考:兼谈川音在非进课堂方面的尝试[J].音乐探索,2015(3):86-87.
- [4] 吴凡.碎片与重构:民族—国家体系中的红瑶岁时礼仪阐释[J].中国音乐学,2009(1):40.
- [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0-194.
- [6]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81-88.
- [7] 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5-17.
- [8] 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19.
- [9] 徐钰.漳州南词的传承与发展初探[J].大众文艺,2010(10):177-178.
- [10] 伍荣生.将乐南词戏的形成和演变[J].中国戏剧,2012(10):78-80.
- [11] 蓝雪菲.关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探讨[J].音乐研究,2009(2):6-7.
- [12] 乔建中.传人、文化生态及其他:关于“遗产保护”的断想[J].音乐研究,2006(2):14-15.
- [13] 刘富琳.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特征[J].音乐研究,1999(2):71-72.
- [14] 刘富琳.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特征[J].音乐研究,1999(2):72-73.
- [15] 刘怀中.将乐南词与食闹音乐[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196.
- [16] 周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J].中国音乐学,2008(3):6.
- [17] 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J].中国音乐学,1989(4):13-14.
- [18]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关于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认定结果的公示[EB/OL].(2017-12-27) [2019-10-17].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5/201712/t20171227_323114.html.

(责任编辑:张文静)

An Investiga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Jangle Nanci

TANG Jinbao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Music,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 Jangle Nanci is an important music culture in Fujian, as well as a proof of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Jiangzhe opera culture. Its artistic form is unique and popular.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it does not show its proper body posture. In intangi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Jangle Nanci survival and inheritance present situation has been carried, review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turn to its "traditional", review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Nanci.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better music intangible project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construction and explore development path.

Key words: Intangible; Jangle Nanci; living; inheritance status

融合与构建：妈祖海外传播的多维文化力因素

林晶^{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2488; 2.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摘要:妈祖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且藉由“妈祖文化圈”的巨大辐射力而远播海外。在此过程中,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无数座天后宫成为妈祖信仰“实体化”的主要表现。而藉由构建于此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妈祖对海外地域文化的发展与转变过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以多元、多维度的文化力因素体现。在政治上,协助构建和稳定海海洋东亚体系;在经济上则为贸易双方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互信互助空间;在文化上,积极输出中华文化的普适性,追寻中西文化的内在统一。可以说,妈祖文化不仅在促进构建以妈祖文化为核心的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民族感情联系与价值认同机制的建立,且在获得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妈祖;海上丝绸之路;思想交流;文化力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63-07

妈祖文化是福建沿海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尊崇、信奉妈祖的过程中所产生、发展、继承的精神财富的总称,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妈祖文化自诞生之初便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一直与我国海上贸易运输联系密切。宋代以降,妈祖信仰便在海上贸易、漕粮运输、海外交通、国家海事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被誉为海上女神。同时,海洋文化的特性也使得妈祖文化远播海外。目前,妈祖信仰已远博海内外33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从地方性民间信仰向世界性华人信仰的巨大转变。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妈祖文化不仅成为了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标志,也是我国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文化名片。

一、妈祖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纽带

妈祖信仰有着突出的特点。首先,妈祖具有民族

性。在妈祖短暂的一生中,不断闪现出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宝贵品格,并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凝聚于妈祖精神中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真善美”为核心,是中华民族热爱劳动、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等优秀品格的集中展示。同时,妈祖又具有世界性。目前全世界已有妈祖寺庙逾五千座,信众超过两亿人,且大多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这不仅说明妈祖是海外华人社群活动的文化核心,也是华侨与所在国人民间情感联络的重要渠道,是我国海外文化往来的重要媒介。而作为中华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妈祖信仰在海外各地广泛建立的文化体系,正是维系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文化纽带。

妈祖的传播路线分为东、南两路。东路为跨太平洋航线,又称“妈祖越洋东传”线,即以菲律宾为中介,从亚洲向南北美洲传播。南路则为西太平洋航线,其中又细分为往东北方向的朝鲜半岛、日本航线以及往南的南亚航线两部分。最初,妈祖信仰在东南亚沿海的华人聚居区传播,而后从沿海深入内河港埠乃至内陆城市,被概括为“从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到五大洲四大洋的海域,基本覆盖了广义上的汉字文化圈”^[1]。

收稿日期:2019-01-06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FJ2018JDZ044)。

作者简介:林晶(1981-),女,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妈祖文化研究。

在琉球,妈祖被尊称为“舟菩萨”,琉球地区的妈祖信仰主要是由明初闽地善操舟者36姓带去,他们以船为伴、向海而生,远涉重洋,稍有不慎便有触礁舟覆的危险,因此他们对于海神天妃极为崇敬。到琉球后,他们在当地建有琉球天妃宫、上天妃宫、天妃宫等三座天后宫。可惜的是,前两座天后宫均毁于二战战火,而姑米山天后宫则遗存至今,是琉球当地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妈祖信仰早在15世纪便已得到琉球官方的认同与尊崇,官府不仅对天妃宫的建造给予支持,还通过祭奉天妃的方式以“上祝万岁之宝位,下济三界之群生”^[2]。1457年,尚泰久王还将此铭刻于钟,并悬于上、下天妃宫,铭曰:华钟铸就,挂着珠林,撞破昏梦,正诚心,君臣道合,蛮夷不侵,彰鳧氏德,起追蠡吟,万古皇泽,流妙法音。

而这种自上而下对妈祖的重视使得妈祖信仰在琉球迅速发展。如在琉球,百姓亦在妈祖诞辰九月二十三日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甚至每月二十三日均进行祭拜。而妈祖还是琉球渔民扶乩的对象。十六世纪中叶,册封船内和上天妃宫内均备有扶乩的道具,并且记述有天妃的乩示。同时,妈祖对冲绳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亦起着促进作用。如久米村“七岁以上初学者,则设塾于上天妃宫以教之”^[3]。时至今日,妈祖的巨大影响力依旧存在着。不仅久米村,连那霸、首里人们家中神龛的摆设,几乎都是一样的。由于这种摆设是一般福建人家庭神桌的形式,所以在琉球留下许多渗透中国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传说及实物的证据。

上述足以证明,妈祖信仰在琉球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也深刻影响着当地的习俗与文化。

在日本,妈祖文化首先东传至长崎,并由之进入日本诸列岛。仅明清两季,当地旅日华人便在日兴建天后宫100多座,足见妈祖文化在日本华人文化中的重要地位。2006年,日本横滨妈祖庙的开庙宣布妈祖在日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目前在日本境内已有各类妈祖像30余例,其中鹿儿岛10例、长崎8例、茨城4例、冲绳2例、大分、福冈、宫城、青森各1例。古时日本船只返航,均需祭拜妈祖:“来长崎的唐船号船菩萨者,第一位妈祖,又号老妈……归航之时将菩萨载于船上,于途中市井始终鸣金鼓,吹喇叭。菩萨既至其

船,港中类船皆鸣金鼓三三共九遍”^[4]。另外,日本一些地名,如天妃神社、天妃权现、天妃山等均与妈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日本早期文献《和汉船用集》、《增补诸宗佛像图汇》等均将妈祖与日本船玉神相等同,这一方面反映出早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妈祖已“走出庙堂”,融入日本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之中。一方面也说明妈祖在日本神明体系中有着较高的神格地位。

朝鲜地区作为最早接受妈祖信仰的地区,对妈祖信仰的国家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的朝鲜使者李崇仁便赞美妈祖“神妃享祀应需报,海若潜形不敢窥”^[5]。这说明当时“起航先拜妈祖,有船必有妈祖祈像”的习俗已在朝鲜半岛广泛流传。

南洋地区是妈祖文化海外发展的重要区域。“南洋各地,此神之祠庙所在有之,闽人最多,琼人次之,然闽人多书为‘天上圣母’,琼人及其他均书‘天后圣母’,亦有书为‘天后元君’者”^[6]。从妈祖在南洋多种的称呼便可一窥其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在越南,发轫于北宋年间的汉人移民进程在一千多年的岁月中从未断绝,来自福建晋江的李淳安及其子李公蕴甚至还建立了著名的安南李朝。到1989年,越南国内的华人华侨总数有近百万人之多。会安位于越南总部柴江的入海口,是越南最早的华埠,也是越南建立天后宫最早和最多的地区。越南会馆众多,位于会安陈富街(Than Phu Street)的中华会馆从清乾隆六年(1741年)便开始供奉妈祖,同年所立碑文有云:内崇天后圣母,春秋朔望,或祷或庆,诚称异国同堂,会计经营,必公正,相与同心协力。至于疾病相扶,患难相助,福因善果,不胜枚举^[7]。

此碑对会馆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解释。位于河城行帆的粤东会馆也祭拜妈祖。妈祖所代表的中华普世价值成为以华人会馆、善堂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救助机构的行动纲领,侧印出华侨对妈祖文化的虔诚崇信。

胡志明市的穗城会馆是越南最著名的天后宫。每到农历三月二十三的妈祖诞辰日,会馆还会公演数台传统大戏,时刻提醒越南华人认识和传承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穗城会馆还依照妈祖的行善理念,在当地广建学校和医院。1910年会馆兴建了越秀学院,而后又为了满足当地底层华人子弟教育的需要,于1958

年又兴建了复兴学校。1967年,由穗城会馆出资修建的广肇医院投入使用,其产育院是当时最先进的妇幼医院之一。会馆的善举也得到了当地媒体的高度赞扬。

此外,胡志明市的琼州会馆、五帮共同会馆、温陵会馆,永隆市天后宫、沙沥天后宫,茶荣省小芹县天后宫等均供奉妈祖。这足以说明妈祖祭祀活动很早便在越南成为常态。

泰国和越南一样,亦受妈祖文化的浸养颇深。当地潮人、闽人、琼人大多虔诚崇信妈祖,尤其是海南人,“那些来自海南岛的人,主要是小贩和渔民,他们组成了也许是最贫穷但却是最活跃的阶层”^[8]。正基于此,泰国天后宫虽未及越南天后宫之壮丽雄伟,但在数量上却远胜越南,妈祖信仰也成为泰国名副其实的华人大众信仰。如位于泰国南部洛坤府莱姆村的天后宫,虽坐落在偏僻的海滨小渔村,但却因此当地渔民华人的聚居地而香火旺盛,时至今日,当地华人后裔和马来人后裔均信奉妈祖。此外,泰国素叻它尼府班多路的天后圣母庙便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当地侨领吴乃钲率领众华侨集资修建而成,此庙成为当地的联侨活动中心。藉由天后宫在泰国的建立,中国庙宇在雕刻、绘画、诗文、书法、楹联、古物等方面所展现的中国文化因素得以与泰国当地文化深度融合,成为中泰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与媒介。

新加坡的民众则以天后宫为依托,赋予了妈祖信仰更全面的内涵。近代南洋海商对财富的不断追求及国际海运贸易的发展,使得妈祖原本的海神宗义逐渐淡化,转而被引申为财神及商业保护神。早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天福宫便已设坛祭祀妈祖。

印度尼西亚也建有诸多妈祖庙,并属于妈祖信仰的海外二次传播。每年印尼山口洋天后宫均会举行妈祖祭祀活动,给印尼华人提供一处焚香膜拜、寻求心理慰藉、满足故乡情怀的场所。可以说,妈祖文化是印尼华人社群体系构建与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来西亚亦有着丰富的妈祖传统。妈祖花船海上巡游、妈祖灵神巡行槟城、妈祖祭祀庆典、妈祖花车巡游等一系列活动展现出当地百姓对妈祖的笃信。

菲律宾也因华人的大量前往而深受妈祖文化浸

润。南吕宋描东牙示省达亚社的天上圣母宫是菲律宾最早的天后宫。20世纪60年代,全菲岛华侨奉祀的小规模的天上圣母庙或妈祖庙有一百多家。同时,菲律宾各地亦开始兴建各类仿妈祖庙建筑。如1975年在描东牙示市建造的中国式庙宇,供奉着达亚寺小寺院妈祖神像;1988年,宿务华侨华人在当地郊区贝维里尔山麓亦建有妈祖庙,供奉先天圣道院的妈祖像。

妈祖在欧洲各国也有广泛的影响力。如早在17世纪末,大量中国劳工便远渡重洋,前往法国谋生,妈祖成为他们对故乡的寄托。1982年,法国海南同乡会在巴黎成立,而后每年都会在妈祖诞辰日举行会员大会及各类庆典及祭祀活动。巴黎“真一堂”妈祖会还设有天后史料文物研究中心,专门对欧洲所存妈祖史料进行整理。而1985年,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所为筹办“福建女神天妃史料及其在海外华人社团的传播”展览,专程来函至湄洲祖庙和泉州天后宫索要照片及相关史料,是妈祖文化在法传播的重要历史依据^[9]。

妈祖在北美洲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美国,华盛顿、旧金山等地均建有妈祖庙。这与十九世纪赴美华人数量的大幅增加有密切联系。1850年,华侨亚青在三藩市普斯特与梅逊街角建造了第一座天后宫,1868年,该庙宇已在当地社群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目前此庙中依旧保存有一口造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钟,这是美国妈祖文化源起于我国东南沿海移民的珍贵历史物证;1850年华人矿工在沙加缅度西北150英里处的威化委兴建云林庙一座,专祀妈祖。1986年,旧金山中国城朝圣宫在都板街建立;1993年,大华府地区也开始兴建天后宫,数量不断增加。

妈祖在澳大利亚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目前全澳华裔人口已达121万,占全澳总人口的5%,妈祖文化的包容、和谐、吉祥迅速被当地跨社区、跨背景的华人所接受^[10]。2017年,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妈祖认同在澳洲的实现。此外,悉尼天后宫于1991年在Canley Vale开张,这是澳洲第一座供奉妈祖的华人庙宇。2012年建成的墨尔本天后宫拥有一座南半球最高的12米天后像;科廷的琼府会馆妈祖庙亦于2017年开建。

可见,妈祖信仰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

神,世界各地一座座的天后宫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化的展示。天后宫作为妈祖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不仅影响着当地建筑、祭祀、传统等方面的发展,也为远离故地的华人华侨们搭建起温馨的精神家园,得以团聚一堂,共述乡愁,“年时佳节,常向同侨劝捐,以维经费,基里祇、甘馮士各埠同侨,来往登坡者,咸寓居其间”^[11]。同时,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妈祖文化体系成为凝聚人心、团结华人的重要媒介。这种同乡间互尊互亲的精神成为海外华人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槟城琼州会馆中所悬“莫不尊亲”匾额便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二、妈祖文化圈在海外地域认同中的文化力因素分析

“文化圈”是一个外来概念,目前被国内学界广泛使用。1905年文化学者弗里茨·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首次提出文化圈的概念,即:在具有相同和相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内,文化必逐渐向四周传播开来^[12]。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新世纪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性,包含海洋经济强国建设、海洋文化强国建设两部分。而妈祖作为我国东南民间信仰的代表,对促进中华文化的海外认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共识”大有裨益。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建设全世界多民族参与的世界妈祖文化圈体系,成为妈祖文化力体现的最直观表现。

妈祖文化的对外传播模式多元且极具特点。

首先,妈祖文化以其驱灾保民的文化特性向外传播。从古及今,妈祖以其海纳包容、定海救民的特性,成为我国对外往来的重要文化因素。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径占城、爪哇、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最远到达东非等国家,为寻求更多商机,组建海上外交联盟,随船僧人胜慧感受天妃的恩惠,在临终前命弟子将天妃神迹刻于《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中,以示尊崇。而《天妃之神灵应记》中也有“云帆之高涨,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保佑之德”的记载^[13]。

可以说,以抵消海上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而形成的妈祖形象,不仅为中华文化的外播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也强化了妈祖文化自身的功能属性。

其次,妈祖文化以其普世性在海外扎根。妈祖的普世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以“神”的符号学意义对妈祖进行审视,妈祖具有与其他神良好的“兼容性”。张燮曾记载在妈祖文化随海上贸易移民前往南中国海传播的过程中,常出现妈祖与其他神明共祀、妈祖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共存的描述^[14]。另一方面,妈祖以“海洋女神”的形象,加速中国传统文化与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本土文化的共融互通。这种柔性传播方式,以文字、声音、图片、卡通、动画、视频、电影等多样形式表现出来,民间组织以活性化、个性化的柔性传播为主导,结合本土文化特色,发展出传递和反馈的双向沟通途径。此类方式虽显效较慢,但却具有极强的普世性,尤其是以活态民俗祭祀、影视歌舞作品等民间文化的展示,拉近了妈祖与广大海外受众的距离。

再次,妈祖文化以其强大文化影响力走出国界。妈祖信仰诞生于“文献名邦”莆田,当地自古文化发达、科甲鼎盛,同时又因沿海地区常有倭寇之患,使得尊教懂礼的莆田人不得不迁徙至世界各地,并将妈祖文化传播到各处。尤其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对华侵略和掠夺程度的不断加深,妈祖信众被输出国外,在广袤的美洲和非洲地区建立起多座妈祖祭祀建筑。一来感谢妈祖于异乡之庇护,祈求美好灿烂之未来,二来作为联系宗族同乡的活动场所,符合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学说中关于信仰与生存关系的论述表现。这种在逆境中依旧追求和谐与平等的方式,与当前我国所提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新安全观高度吻合。

妈祖因其巨大的影响力,而形成了典型的文化“溢出效应”,在多个其他领域均起到了垂范作用。在政治领域,妈祖成为统治者进行德育教化统治的工具。妈祖的政治地位也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的“夫人”称号一跃成为清代的“天后”和“天上圣母”,难能可贵的是,妈祖文化一直与反侵略、反战争、追求和平密切相关,如朱一贵起义之时,便在厦门朝宗宫进香拜谒妈祖后前往台湾。又如“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石碣的存在,是对万历三十二年(1640年)沈有

容击退荷兰侵略者,维护祖国统一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叙,有力说明了妈祖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朝拜体系的长期稳定繁荣以及维护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在二战时期,台湾还流传着一个传说,即美国对台空袭时,传说有一白袍妇女显现空中,将投下的炸弹推往野外,避免市区免受空袭。这充分展示了妈祖文化的反战情节。

在航海领域,海洋运输作为全球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妈祖便与中外海上交通有着密切联系。不论是出使高丽,还是郑和七下西洋,亦或是持续近 500 年的对外册封活动,都是以妈祖为精神支柱而圆满完成的。可以说,妈祖是东亚航海史、外交史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当然,外交使节们为感念神恩而作的大量文章,虽不免有歌功颂德之嫌,但对澄清一些历史争议颇有效用。

妈祖还兼有鲜明的母亲文化。母亲文化是人类不分人种、不分肤色、不分阶层的共性文化。正如元人黄渊所述:“他所谓神者,以死生祸福惊动人,唯妃生人、福人,未尝以死与祸恐人,故人人事妃,爱敬如生母”^[15]。很多妈祖传说也表现出其可亲、可爱、可靠、可信的母亲特质,如:妇人饲子者,将往田园或採捕,以其儿置庙中,祝曰:“姑好看儿”,去。竟日儿不啼,不饥,不出闕。暮,各负以归^[16]。

在科技技术领域,妈祖亦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古人常为祈求航海平安,而在妈祖庙中供奉船模,这为我国古代航海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和文献资料,如在山东长岛妈祖庙中有着超过 350 只古船模,以福船、沙船两种类型,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英雄邓世昌供奉的“威远号”军舰模型亦陈列其中。此外,一些特殊的科技文物也被各地妈祖庙部分保存下来。如莆田涵江天后宫所存的明代星图,被广泛用于研究我国定向航海技术。在海上丝绸之路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时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十分重视科技力量,是各时期最新科技成就的集合,尤其是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埃及人、希腊人等,为人类海洋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如早在 13 世纪,郭守敬就曾奉旨南下“测绘四海”,所算的一年时间与今日科学之测定相

差无几,比欧洲整整早了 300 余年。及至元代,我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已位居世界前列,不仅已有航海地球仪保驾护航,其海船的航速性和耐波性均领先世界,元代交钞成为世界第一种国际性纸币,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海上贸易也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广播世界各地的重要路径;同时籍由此通道,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诸多科学著作与科技成就也不断地传入中国,“东风西渐”和“西风东渐”平等、协调地进行着。而这一持续百年、绵延不绝的东西互鉴,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提供了有力的科技保障,也是唐宋元的航海科技实力的持续体现。这种科技实力,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妈祖传播的影响。

三、发挥妈祖文化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力

长久以来,妈祖文化便在远播海外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建立起多元的妈祖认同。这一认同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共识的典型体现,也是当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通路开闢不可或缺的人文条件。这种认同感不仅来源于妈祖信仰本身的强大宗教感染力,还源于其内在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

妈祖文化认同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妈祖文化作为官方认可的宗教文化体系,成为维持“海洋东亚”体系与国家主权独立性的粘合剂和润滑剂。在妈祖的帮助下,海洋东亚的“华夷”秩序在有明一代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来华朝贡的国家数目多、使团规模大、次数频繁,中华文化以一种“低阶文化”向“高阶文化”转换着。同时,得益于郑和下西洋的广泛影响力,几乎所有位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邦国均被纳入这种秩序之中,形成了一张庞大的海洋秩序网络。

天妃信仰通过提升出使或来往官员在面对海洋危险时的信心,从而保障了朝贡体系的顺利进行。妈祖文化认同还体现在经济领域。以妈祖内涵为核心的多元经济互动主要体现在莆田地区对外经贸发展以及海外经贸互助两方面。莆田是妈祖的故乡,而湄洲岛则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湄洲岛地理位置优越,海陆交通便捷,岛上有妈祖祖庙及妈祖升天古迹,是妈祖

精魂的聚集地,自古以来就是闽台民间交往的桥头堡。便利的交通、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再加上浓重的妈祖文化气息,使得湄洲岛成为中外闻名的旅游度假胜地,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参观,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妈祖旅游体系。这也为妈祖广泛传播提供了经济基础,是妈祖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经济保障。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得妈祖文化在东南沿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成为一张地域性的名片。

而在国际贸易领域,妈祖这一共同“场域”的出现,势必会对贸易双方的交流沟通产生充分的影响。如2009年,在第二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期间,当地还举行了直沽妈祖文化城暨直沽妈祖庙奠基仪式、天津妈祖文化经贸园项目启动仪式。这种妈祖与经贸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不仅拉近了两地的距离,为双方探讨经贸事宜提供了合适的平台,也为经贸环境的创新和构建提供了条件。

妈祖文化认同还体现在中西文化的同一性上。一直以来,由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中西海洋文化存在着诸多看似荒诞实则合理现象。如同为海神,妈祖与波塞冬却在形成方式、传播方式、外在形象、秉性行为、价值观及民众评价上几乎相反,常被归因于“妈祖与波塞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价值观的不同”^[17]。而实际上,此种异同均是中西文化在面对浩瀚大海时所作出的应对方式,不论是有求必应、有难必救的妈祖,还是激进冒险、令人恐惧的波塞冬,都是对此种应激模式的因应。然而,其本质依旧是对海洋的肯定。

妈祖文化认同还是中华文化普适性的直接体现。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资料参照可知,所有侨居海外的华人社群均将天后宫作为其同乡会或商会的所在地,这不仅是当地社群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各国华人的精神殿堂。这也是宗教信仰与移民在身份认同、地方认同两者间密切联系的体现。同时,妈祖文化也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达到互相沟通和理解,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与走进民众心里”的目标^[18]。

发挥妈祖文化认同所带来的文化力,构建政治互

信、经济畅通、文化多元的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千年妈祖顺应时代潮流的又一体现。

四、余论

妈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思想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源自海洋的宗教信仰随着人口的流动而传入五湖四海,从“星星之火”逐渐有“可以燎原”之势。天后宫作为其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充分承载了妈祖文化的外延部分;而由此而形成的海外地域认同,则充分展现了妈祖的草根性、普适性和多元性。当然,这些“妈祖元素”的表达,对延续至今的中外交通产生了多元化的影响。如能确保海洋东亚体系的全面建立、促进经贸往来的平续发展、体现中华文化的普适性等。当然,在目前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建设时期,妈祖作为我国璀璨文化的“金名片”,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继续为世界海洋文明的永济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 [1] 孙晓光,张赫名.妈祖:中国海洋文化的象征[J].中国宗教,2013(2):47.
- [2] 谢必震,陈硕炫.琉球天妃信仰状况及其嬗变[J].莆田学院学报,2005(3):81.
- [3]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M].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160.
- [4] 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M].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250.
- [5] 李崇仁.陶隐集[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445.
- [6] 韩槐准.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J].南洋学报,1941(2):460.
- [7] 李泰山.越南漫笔[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21.
- [8] 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27.
- [9] 张国栋,柯力.妈祖文化与当代社会[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225.
- [10] 刘建彪.对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再移民现象的探讨[J].八桂侨刊,2000(1):55.
- [11] 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M].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出版社,1982:1173.
- [12]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87.

- [13] 蒋维镡.妈祖文化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65. 院学报,2010(3):9.
- [14] 张燮.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78. [18] 林明太.妈祖文化研究论丛(2)[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53.
- [15] 蒋维镡,郑丽航.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623.
- [16] 罗春荣.妈祖文化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24. (责任编辑:白 晔)
- [17] 陈洁.文化视角下妈祖与波塞冬之异同性比较[J].莆田学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on: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Factors of Mazu's Overseas Communication

LIN Jing^{1,2}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Fujian 351100)

Abstract: Mazu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not only has great influence in our country, but also spreads abroad through the great radiation of "Mazu cultural circle". In this process, numerous Tianhou Palaces distributed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come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the "materialization" of Mazu belief. Based on this, Mazu has exerted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overseas culture, which is embodied by multicultural and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power factors. Politically, it helps to build and stabilize the marine East Asian system; economically, it provides valuable space for mutual trust and assistance for both sides of trade; culturally, it actively exports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eeks the internal un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can be said that Mazu culture has an irreplaceable positive influence not only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emotional ties and value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Marine Silk Road with Mazu culture as its core, but also in gaining th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Marine Silk Road.

Key words: Mazu; the Marine Silk Road; communication of ideas; cultural power

浅析民国时期《闽北日报》广告语言特色

吴丹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 作为民国时期福建闽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份报纸,《闽北日报》的广告在整份报纸版面中达到了四分之一。每个时代的广告语言都具有其自身的烙印,甚至有些还带有地方特色,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地方报刊进行研究。对于民国时期的《闽北日报》而言,其广告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具有显著的实用性,而且语言修辞多样、版面设计丰富,不仅能为今日的广告创作提供重要的思路,同时也可以折射出闽北地区的社会文化及广大人民的心理。

关键词: 民国时期;《闽北日报》;广告语言;特色

中图分类号: G2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2-0070-04

“广告”一词源于拉丁语“Advertere”,意思是“注意”“诱导”,旨在引起大众对某件事物的注意。在我国古代,只有幌子、告白、仿单、招贴等称呼,约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广告”这一术语才开始出现在我国的报刊上。^[1]近代以来,我国的“广告”主要以报刊为载体,随着西方“广告”的引入,我国的商品广告语言与样式风格日趋多样化,而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

“广告语言是特定的语言符号在广告信息传播时的具体运用及其产物”^[2],报纸依托其特有的广告符号语言,并通过书面语的表达以及图文美感的设计等方式来塑造商品,不仅提高了内容的说服力,而且激发了读者的购买欲望。每个时代的广告语言都具有其自身的烙印,甚至有些还带有地方特色,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地方报刊进行研究。民国时期的《闽北日报》创刊于1936年11月,是闽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报纸,其内容紧扣闽北人民关心的社会事件,受众面广,日销售量最高达到了1万份之多,而它也因此跻身到了当时福建大报之列。因此,本文拟以该报广告为例,浅

析其广告语言特色。

一、文字详尽——强调广告实用性与功能性

无论是哪一种广告,几乎都与语言文字有不解之缘,广告的表现因素主要有声音、画面与文字。在报刊中广告主要是图和文,其50%-70%的效果均来自于文字。^[3]在《闽北日报》这一民国时期的报纸中,大部分广告依然以传统广告为主(即纯文字广告),也就是说,在每一则广告中,尽可能容纳最多的文字。在有限的空间里,详细说明某商品的功能、用法、做法等内容,并配以醒目的加粗大字标题。在此类广告中,特大字体上通常包含推销的商品名称、老字号店名、制造商、地点或商品的某一特殊功效、优点等相关信息。以洋饼罐头店的广告^[4]为例:

敬告各界士女:本号开设南平中山路清泰坊三三〇号,特聘专门技师,自行制造各种饼干,面包,果酱,并推销国产:水酒,罐头,糖果,兼售各色上等炼乳,牛肉露,豉油,及其他滋补品等:先值展销会期间,特将各色物品,廉价零售批发,如何光临,极表欢迎。

虽纯文字广告不如图文并茂的广告精彩,但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实用性强,开门见山地传达出了推销商

收稿日期:2019-10-17

基金项目:武夷学院校级科研项目(XL201719S)。

作者简介:吴丹(1985-),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

品的详细信息,能够为顾客的消费提供直接指导。在遣词造句上,尽可能的传达广告信息,如“敬告各界士女”,目标群体非常明确;用“特聘”“专门技师”来区别于其他同类商铺,展现出了该洋饼店的特色;同时,用“廉价销售”这一价格优势来吸引消费者;最后,单独列出商店的名称,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二、表达多样——语言风格相互交织符合时代要求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广告语不同于日常使用的语言。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首次出现了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适在其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明确提到了白话文的重要性。而广告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势必也会受到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如虎标万金油广告语^[4]:

虎标万金油: 每月销数一千五百万包, 牌子, 越老, 越红! 购时要认明, 红铁盒子上的[虎标]。^[4]

在这则广告语中,运用接近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了表达。白话文是一种日常用语,这样口语化的措辞,类似于商铺前的叫卖。通俗易懂的广告语能够将商品信息精准的传达给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好的选择商品。

又如一则武夷岩茶广告语^[5](图1所示),为方便查看,简体字表达为:“吾闽为产茶之区,尤以崇安武夷山为出产岩茶之策源地,如天游玉女诸峰飞帘九曲止水,标载史册遐迩著称于此,山清水秀之名岩培植茶丛,其叶质香味实出自天然,故真正岩茶有特殊消化之效力,诚家常要素、卫生妙品也。”



图1 武夷岩茶

Fig.1 Wuyi Rock Tea

在这则本土广告中,采用了文言文的形式,且通篇没有断句,导致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人难以读懂其中的内容。但文言文之美在其内涵,需要细细品味,通过文言文的表达,能够让读者看到山清水秀,并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茶香。同时,文言文的运用也从侧面体现出该产品的读者多为文人雅士,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

再如一则报刊招聘启事^[6]:“本报兹拟在建瓯本市及闽北各县,增聘兼职访员多人,凡自问有志于新闻事业善于交际探访消息者,外阜请试稿三天,本市先函,本报编辑部接洽,合则函约。特此启事。”

除以上两种语言风格外,运用最多的其实是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结合体,即“文白夹杂”。随着白话文运动的不断深入,很多文学作品均在广告上体现出了这种文白夹杂。它不仅保留了文言文中的典雅醇厚,而且具备白话文流畅轻松的特点。当下,大多数广告依然以这种文白夹杂的广告语言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在保留了文言文框架的同时,利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来介绍产品。

三、修辞夸张——顺应紧张局势

从广告语言的修辞方面来看,在那个政局动乱的战争年代,药物广告的版面在报刊中占据的比重最多。如“本省规模最大的新药机关”“能治小儿百病,能使小儿肥壮”“儿科圣药”“花一角钱,可救一命!”等,而在这些不同的药物广告词中,均使用到了“最大”“治百病”“圣”等夸张的修辞手法,虽然在文字语言的表达上合情合理,符合当下动荡社会对药资需求的消费心理,但总给人一种夸大其词的感觉。广告的核心内容是信息传播与消费指导,因此要求广告语言表达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读者的信赖。上述那些夸张甚至夸大的手法虽然能够在当时广告法还没有得到完善的情况下存在,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其真实性需要推敲,因而被后人所摒弃。

同时在民国时期的《闽北日报》上,存在诸多“大减价”的广告,如“民生池八周年纪念大放价”等,这种以减价的方式来吸引读者购买的用意显而易见。广告商不仅会大字刊登减价商店的相关消息,而且会告知

减价的具体时间,如民生池大放价的时间就长达一个月。由于报刊传播具有滞后性,信息传达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备注上标记清楚降价的起止日期。

四、形式丰富——版面展现广告设计艺术水平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设计的报纸版面大致类似,广告的占有量大,如《闽北日报》总共四版,但封面的头版基本都是广告,其数量超过了20条,而且还不包括夹缝中的广告以及可能在第三、四版中存在的广告。因此,如何在如此众多的广告中吸引到读者的注意,成为了当时广告经营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为此,广告经营者开始在广告的设计上提出更高要求,他们不仅追求纯文字的实用性,甚至开始分析读者的心理,将广告艺术性与实用性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通过图文解说的广告,有利于对商品信息的识别。作为一种地方报刊,民国时期的《闽北日报》虽然印刷技术落后,而且配备的广告制作人比较少,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其广告的创意和画面,而且在美术字体方面也进行了细致地处理,达到工整完美。作为最具时代特色的新兴广告形式,这些图文并茂的广告以其丰富的广告内容及形式,呈现给了读者丰富多彩的商品信息。广告画家多为传统国画画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们通过广告将传统的仕女与时尚女性生动的描绘了出来。^[7]

在这些广告画中,精明的商家还会借助各种社会元素作为相关广告策划来描绘时尚女性,如营造相关社会环境、描绘新面貌和新生活的场景等。这种新生活的描绘在广告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单纯用文字描绘更加有意境,成为当下追逐时尚的读者相继追崇效仿的对象。例如,将虎标牌润喉八卦丹配上旗袍美人歌唱家作为主体,背景为西洋管乐队的伴奏者,内容丰富多彩,并把产品放置到最显眼的场景中,整体画面非常具有立体感,而且可看性很强,能够促使读者慢慢的琢磨图文内容(见图2)^[8]。



图2 虎标八卦丹

Fig.2 Tiger eight trigrams pill

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图文广告使用了当下流行的拥有电报码的电报(见图3)^[9],并在下面配有文字说明。让读者乍一看以为是一封电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并且设置了悬念,接着通过一连串陌生的电报码,将电报内容告诉读者。与纯文字的广告相比,这种广告方式更具吸引力。



图3 电报码的电报

Fig.3 Telegram of telegraph code

创意的美术字体,是对字体进行了美术加工、美化与装饰。这样的字体极具艺术特色,不仅每个字美观醒目,而且整篇的文字整齐统一,具有美观协调的艺术效果。在现代生活中,这种类型的字体更多的运用于卖场、户外招牌、展板、海报等场所,主要用来刺激引导消费和活跃卖场气氛。如图4一则武夷山茶叶的广告上^[10],运用了美术字体中的变体,通过大小字号来构图排版,版面设计并非像传统的文字广告一样填满,而是做到留白,这样的广告设计能够在诸多广告语中脱颖而出。



图4 武夷山茶叶

Fig.4 Wuyishan tea

在图5“扫痰丸”广告中^[11],同样利用大篇幅的文字详尽呈现出了此药的功效,但其不同之处在于运用了不同的字体、不同字号、加粗以及加背景黑等方式,并且采用了上下分层的形式,即上层用大号字体在中央位置写出病症“痰作怪”,上左右三联如同门上对联,对称排布,将病症呈现出来,接着在下层用黑体掏空的方式推出其主打药品——“扫痰丸”,并展示出此药的功效。相比纯文字广告,这种广告方式的版面设计性更强。



图5 扫痰丸

Fig.5 Sweeping sputum pill

五、结语

无论哪种广告,广告语言作为一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在广告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则好的广告语能够使产品与读者产生共鸣,充分激发读者的购买欲望,进而达到宣传的目的。通过对民国时期《闽北日报》报刊上广告语言特色的解析,不仅能为今日的广告创作提供重要的思路,同时也可以折射出闽北地区的社会文化及广大人民的心理。

参考文献:

- [1] 张冠华.广告写作[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2,4.
- [2] 夏吉英.论广告语言的有效说服[D].苏州:苏州大学,2006:6.
- [3] 洋饼广告店广告[N].闽北日报,1938-08-21(1).
- [4] 虎标万金油广告[N].闽北日报,1938-08-03(1).
- [5] 武夷岩茶广告[N].闽北日报,1938-08-01(1).
- [6] 报刊招聘启事[N].闽北日报,1940-05-09(1).
- [7] 赵琛.民国报纸广告[J].中国广告,2005(4):65-69.
- [8] 虎标八卦丹广告[N].闽北日报,1938-08-21(3).
- [9] 电报码的电报[N].闽北日报,1941-01-08(1).
- [10] 武夷山茶叶广告[N].闽北日报,1938-08-21(3).
- [11] 扫痰丸广告[N].闽北日报,1938-08-02(1).

(责任编辑:陈 果)

On the Advertising Language of Minbei Dail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 Dan

(School of Humanity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newspaper in the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dvertisement of the "Minbei Daily" reached a quarter in the entire newspaper page. The advertising language of each era has its own brands, and even some local characteristics,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local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or the "Minbei Dail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s advertising language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bility in expression, and its diverse language rhetoric and rich layout design can not only provide important ideas for today's advertising creation, but also reflect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nbei daily; advertising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文旅业视阈下乡村科普资源空间格局及开发

王光辉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基于网络大数据处理方法,通过采集、清洗和筛选等步骤,将获取到的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划分为自然环境类科普资源和社会人文类科普资源两大主类,进而依据文旅业和科普教育的属性特征分为地文科普资源、水文科普资源、生物科普资源、产业科普资源、田园林间科普资源和区域人文科普资源六个亚类。通过 GIS 空间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对乡村科普资源的总体和分类进行集聚分析与分布研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发展的思路。

关键词:文旅业;乡村科普资源;空间格局;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74-05

传统科普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区和镇区空间,呈现距离衰减的规律,即距离中心城镇越远,传统科普资源的分布越稀少。然而,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科普也是科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文旅业视阈下,扩宽传统科普资源的范畴,将传统村落、水利景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休闲农业等文旅资源类型纳入到科普资源体系中,乡村科普资源的缺乏性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此外,新型科普资源本身多已经具备相应的市场基础和设施服务基础,通过局部的科普升级和功能置换,可以对民众发挥不同类型的科普功能。

近年来,文旅业视阈下的科普资源研究主要包含科普旅游资源的分类评价和开发,其开发后的受众针对各类游客^[2,3]。而关于科普旅游资源的分类研究主要从区域整体的角度开展,如葛永芳等^[4]将江苏科普旅游资源分成工业厂矿企业类、科技场馆类、民俗文化类等六大类;唐顺英^[5]则从自然和人文类型出发,将山东科普资源划分为地文景观、水文景观、现代科技园区等六类。其次,对于科普旅游资源开发以专项研究

成果较多,从生态科普资源^[6]、古树名木科普资源^[7]、地质地文科普资源到历史文化遗存科普资源的开发等^[8,9]。综合以往对于文旅业视阈下科普资源的探讨,鲜有以乡村空间为对象并且同时针对村民与游客双重受众的科普资源研究。鉴于此,将基于网络大数据构建乡村科普资源类型,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测定乡村科普资源的格局特征,以期为乡村科普资源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爬虫技术对高德地图、百度地图 API 获取 POI 数据。以福建省 9 个市为采集区域,搜索关键词设置为“古村”“古民居”“古镇”“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休闲农场”“观光农场”“观光工厂”“休闲农庄”“森林人家”“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地质公园”“生态农庄”“休闲林场”“生态林场”“科普基地”“湿地公园”“水利景区”“农家乐”“渔家乐”21 种。将获得科普资源 POI 点进行筛选,删除诸如“中餐厅”“酒吧”“饭店”等标签的无关数据后输入 ARCGIS 软件进行叠加分析,进一步剔除位于城区及镇区的 POI 点位以获得位于乡村区域的科普资源 POI 点分布。利用 ARCGIS10.2 的空间统计工具平均最近邻法以及空间分析工具核密度法对乡村区域科普资源的总体与分类进行格局

收稿日期:2019-09-16

作者简介:王光辉(1982-),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管理研究。

分析判定。

二、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空间格局现状

(一)福建乡村科普资源类型

结合福建省具体情况,并综合文旅业与乡村科普教育的特点,将采集到的 21 种 POI 数据类型整合为 2 主类 6 亚类的乡村科普资源如表 1。

表 1 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主要类型

Tab.1 Main types of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 主类 | 亚类 | 特点 | 关键词 | 筛选后 POI 点数量 |
|-----------|----|---|--|-------------|
| 地文科普资源 | | 通过现场解说各类地质信息、地质成因以及地层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从而了解到人类对相关地质地貌的利用、改造和影响。 | 地质公园、景区(山岳型)、景区(地质型) | 54 |
| | 自然 | 科普相关水资源的分布、形成、演化等方面的知识,及其如何开展水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水利工程的实施,地下水环境和地质环境的治理等。 | 景区(海滨型)、水利景区、湿地公园 | 105 |
| 生物科普资源 | | 以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农林、动植物型景区等空间为科教场地,通过科普生物群落与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熏陶生态文化,以提升生态意识与素质。 | 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景区、生态林场、生态农庄、景区(动植物型) | 298 |
| | 环境 |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科普乡村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新技术与新方法,向村民和游客传播产业升级以及产业融合的知识。 | 观光工厂、观光农场、观光农业、农业科普基地、休闲林场、休闲农场、休闲农业、休闲农庄、休闲山庄、景区(人造型) | 1036 |
| 社会文化类科普资源 | | 在农家乐、渔家乐、森林人家经济项目的带动下,开展城市与乡村田园生活、林间生活文化观念的的交流与学习,推动城乡居民的互动和交融。 | 农家乐、渔家乐、森林人家 | 496 |
| | 区域 | 通过参观相关的区域复合型景观体会不同地区的人地关系特点,进而理解传统与现代的乡村社会治理方式。 | 古村、古名居、古镇、景区(历史遗址型)、景区(民族民俗型)、景区(建筑物型) | 98 |

(二)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空间格局分析

1.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集聚分析

(1)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总体集聚分析 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空间 POI 点的平均观测距离为 2297.14 m,预期平均距离为 4619.98 m,根据其两者比值即最近邻指数为 0.50 以及 Z 得分-44.25 得出 99%置信度下显著集聚的空间类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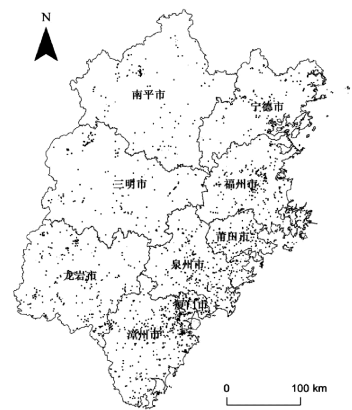


图 1 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总体空间分布

Fig.1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2)乡村科普资源类型集聚分析 社会文化类科普资源和自然环境类科普资源的平均观测距离为 5398.03 m、2544.03 m,预期平均距离分别为 9337.94 m、5247.82 m,两类的资源点的平均观测距离与预期平均距离的比值分别为 0.58 和 0.48,小于 1 且 Z 得分低于-2.58,置信度为 99%,两类的资源点分布属于显著集聚类型如表 2。社会文化类科普资源 POI 点集聚程度接近总体集聚程度,其分布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类型的区域相匹配。

表 2 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主类集聚性分析

Tab.2 Analysis on the main clustering of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 类目 | 平均观测距离(m) | 预期平均距离(m) | 最近邻指数 | Z 得分 | P 值 | 空间分布状态 |
|-----------|-----------|-----------|-------|--------|------|--------|
| 总体 | 2297.14 | 4619.98 | 0.50 | -44.25 | 0.00 | 显著集聚 |
| 自然环境类科普资源 | 5398.03 | 9337.94 | 0.58 | -17.79 | 0.00 | 显著集聚 |
| 社会文化类科普资源 | 2544.03 | 5247.82 | 0.48 | -39.79 | 0.00 | 显著集聚 |

产业科普资源、田园林间科普资源、生物科普资源、区域人文科普资源、水文科普资源和地文科普资源的最近邻指数低于1，均通过95%的显著性检验，六类的乡村科普资源均属于显著集聚分布类型如表3。此外，根据以上科普资源类的Z值得分-29.76、-20.05、-11.60、-5.47、-2.60、-1.84说明六类科普资源的空间集聚程度依次降低。福建省乡村民营经济活力较强，在具备条件的乡村创办如休闲农庄、休闲山庄、休闲林场、农家乐、渔家乐、森林人家等项目，因此产业科普资源与田园林间科普资源集聚程度较高。生物科普资源包含生态农庄、生态林场、自然保护区和动植物型景区等单元，其集聚程度依托居民生态产业化意识以及所毗邻城镇的社会发展程度。区域人文科普资源、地文科普资源与水文科普资源的分布具有其社会、文化及自然的差异性景观的沿山临水空间特征。

表3 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亚类集聚性分析

Tab.3 Analysis of Sub-categories of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 类目 | 平均观测距离(m) | 预期平均距离(m) | 最近邻指数 | Z得分 | P值 | 空间分布状态 |
|----------|-----------|-----------|-------|--------|------|--------|
| 总体 | 2297.14 | 4619.98 | 0.50 | -44.25 | 0.00 | 显著集聚 |
| 地文科普资源 | 22390.49 | 25768.53 | 0.87 | -1.84 | 0.07 | 显著集聚 |
| 水文科普资源 | 16925.48 | 19518.14 | 0.87 | -2.60 | 0.01 | 显著集聚 |
| 生物科普资源 | 7524.96 | 11599.96 | 0.64 | -11.60 | 0.00 | 显著集聚 |
| 产业科普资源 | 3338.02 | 6459.70 | 0.52 | -29.76 | 0.00 | 显著集聚 |
| 田园林间科普资源 | 4949.59 | 9348.82 | 0.53 | -20.05 | 0.00 | 显著集聚 |
| 区域人文科普资源 | 13560.92 | 19071.54 | 0.71 | -5.47 | 0.00 | 显著集聚 |

2.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分布分析

(1)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总体分布分析 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总体分布特点为沿海中东部往南部密集而其余地区稀疏。其中、福州、莆田、泉州、漳州以及厦门城区周边的乡村科普资源最为密集，这部分区域属于福建省四大平原(福州平原、兴化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地势平坦，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较高。此外，福建省其余地区受制于复杂的地形条件因此资源点分布较为分散(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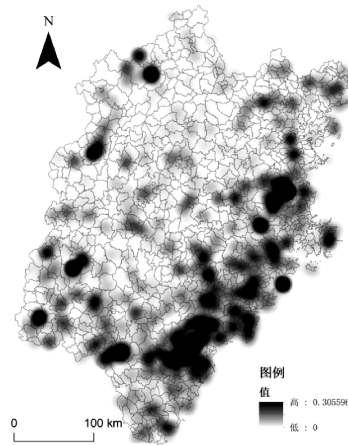


图2 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总体核密度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kernel density of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2)福建省乡村科普资源类型分布分析。自然环境类科普资源与社会文化类科普资源相比，自然环境类科普资源分布较为广泛而社会科普资源分布较为集中。福建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成自然环境类科普资源分布较为分散，社会文化类科普资源主要受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聚集在这三类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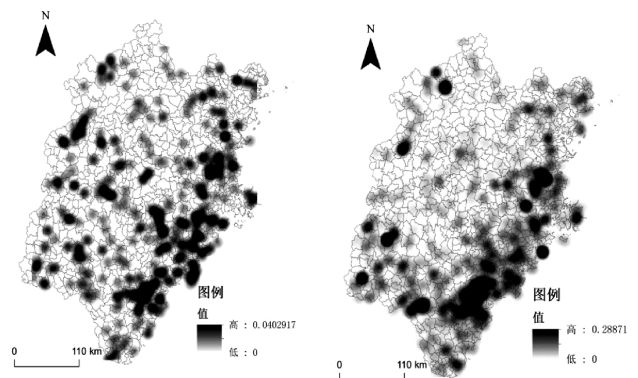


图3 自然环境类科普资源与社会文化类科普资源核密度分析

Fig.3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nd social humanitie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地文科普资源主要聚集在西部，其地区拥有福建两大山脉即武夷山脉和戴云山山脉，因此地文科普资源主要延两大山脉分布。水文科普资源分布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地区，福建省内陆水系密布，而东部又面临台湾海峡，因此水文资源较为丰富。生物科普资源全省分布较广泛，福建省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动植物种类繁多，且全省近几年全民生态意识大幅度提

升,因此各类生态农场、林场、动植物型景区等资源点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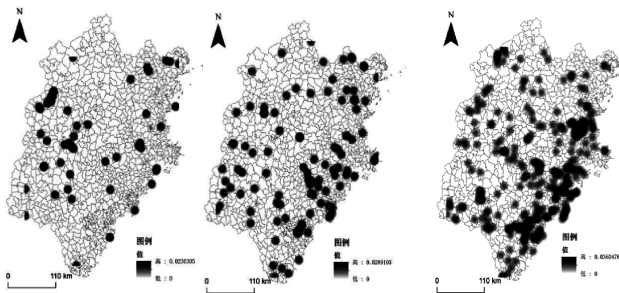


图4 地文科普资源、水文科普资源与生物科普资源核密度分析
Fig.4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geo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hydrolog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nd bi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产业科普资源大聚集在东部至东南部,此地区是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产业意识较高,民营经济发达,因此各类产业相关的资源较为聚集。田园林间科普资源分布东部,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人们对田园林间的向往,因而此类资源主要围绕在以福州厦门泉州周边乡村为主的区域。区域人文科普资源除中部以北和中部以南区域分布较少外,其余地区较为广泛。区域人文科普资源的分布涉及到福建省的开拓历史,当年中原先祖从福建西部入闽,经过闽南进而到达闽东,沿线的开发建设从而留下了丰富的区域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宝贵的社会人文科普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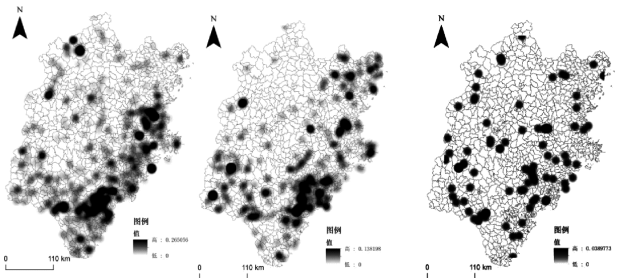


图5 产业科普、田园林间科普与区域人文科普资源核密度分析
Fig.5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rural fores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nd regional humanitie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三、基于网络地图数据的福建乡村科普资源开发建议

文旅业视阈下的乡村科普资源本身具有较好的

体验感和交互感特点,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条件,其关键在于资源的联动整合、提升开发以及人才培养等。此外,乡村科普教育的目的在于让科学文化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更为广大的群众中进行传播,进而全面提升人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因此乡村科普资源的开发应不仅关注利用已有的聚集资源点,还要尽力挖掘非聚集区域的乡村科普资源。

(一) 引导乡村科普资源开发均衡化

通过以上资源点的空间分布分析发现,产业科普资源、田园林间科普资源、生物科普资源具有以沿海都市、旅游目的地等空间为核心的距离衰减趋势,而地文科普资源、水文科普资源和区域人文科普资源则广泛分布在旅游热点地区。充分发挥地文科普资源、水文科普资源以及区域人文科普资源的游客市场优势,激活产业科普资源、田园林间科普资源和生物科普资源的开发,使之六类科普资源空间均衡化。

(二) 打造乡村科普旅游全域化

进一步扩展都市和旅游目的地空间依赖型的产业科普资源、田园林间科普资源和生物科普资源的经济带动性,引导当地对乡村地文、水文以及区域科普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形成不同类型品牌的全域乡村科普旅游目的地。以产业化思路带动村民参与科普资源建设热情,一方面,以经济效益吸引村民自主进行科普资源建设;另外一方面,为满足游客的科普旅游需求,村民也自发产生科普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乡村科普产业、乡村科普教育、乡村科普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模式。

(三) 发挥科普文旅联动开发优势

随着民众科普意识的提高以及城乡游客市场的繁荣,科普项目与乡村文旅项目具有市场联动、开发联动和产业联动的优势。首先,近年来城市亲子游客对于科普教育具有广泛的需求,可以此为契机开发各类乡村研学科普活动;其次,乡村居民对于科学教育的需求类型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科普学习特征,而文旅业和科普联合服务具有在地性、直观性和实用性,可有效促进村民提升乡村生活与生产品质。此外,通过文旅业的产业思维进行乡村科普产业的孵化,不仅可以增加科普资源的数量还可以让村民产生科普致富的动力。

(四)推动游客村民科普互动

开发远离城市空间的地文科普资源、水文科普资源、区域人文科普资源的游客与村民交互科普模式,一方面,来自于城市的游客到以上三类科普资源进行旅游时,希望体验在地化且真实性程度较高的自然环境、文化氛围、民间习俗、餐饮美食等,而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村民,游客在接受服务的同时也是深度体验以上科普资源的内涵和价值。另一方面,城市游客参与消费科普资源的同时,本身现代的城市居民行为习惯和生活模式也会对当地乡村民众产生同化影响。通过对在此三类资源工作的服务人员和周边村民进行科普培训,让他们对资源产生科普自觉,在服务过程中将无形的地文、水文以及区域人文科普意识传递给游客。此外,在各个资源的游客中心对游客进行科普宣传,使游客在体验感受各类科普资源时的行为符合科学规范。

参考文献:

[1] 顾媛,张锋,张璟,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于农业科普工作的

- 几点思考[J].农业科技管理,2018,37(5):60-62,66.
- [2] 杨铭铎,郭英敏.科普旅游的研究进展[J].科普研究,2015,10(2):86-94.
- [3] 余兵.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以河南省为例[J].中州大学学报,2019,36(3):31-34.
- [4] 葛永芳,许金如.论江苏科普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与对策[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36(4):46-48+59.
- [5] 唐顺英.山东省科普旅游资源特色评价及其分区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5):674-677.
- [6] 刘雁玲,杨开太,唐庆,等.靖西五岭森林公园生态科普旅游资源的开发[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3(3):64-67.
- [7] 古旭,张瑞,郭吉朋,等.古树名木资源科普旅游开发研究[J].林业调查规划,2018,43(1):156-159,190.
- [8] 颜际春,李东林.重庆地质科普旅游资源类型与特色分析[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8(1):116-117,119.
- [9] 王丽丽,崔庠.吉林省历史文化遗产类科普旅游资源的开发[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4(2):149-151.

(责任编辑:白 晔)

Spatial Patter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Travel Industry Perspective

WANG Guanghui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big data method, through the steps of collection, cleaning and screening, the obtained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are divid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natural environmen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nd social humanitie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Then the two categories are divided into six sub-categories of geo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hydrolog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bi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industri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rural fores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nd regional humanitie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vel industry and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Through the GIS spatial statistics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e agglomeration analysis and distribution research of rural science resource points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ideas of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Fujian Province are proposed.

Key words: travel industry;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spatial pattern; development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研究

魏佳思

(福建江夏学院 会计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为探寻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联,选取了 79 家福建省上市企业,对其 2015 年至 2018 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描述性和回归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企业社会责任中,企业对员工、顾客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呈负相关;企业对股东、政府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而企业对债权人、供应商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间则不相关,最后则针对分析结果,分别提出了针对企业与政府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创新绩效;福建

中图分类号: C9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2-0079-06

引言

下图 1 所示为福建全省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的统计,从其数据可以看到,在该项经费中,全年预计支出 620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14.2%,占福建全省生产总值的 1.7%。截至 2018 年底,福建全省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38522 件,比上年增长 24.2%;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9.85 件,比上年增加 1.85 件。全年共登记技术合同 7753 项,成交额 110.9 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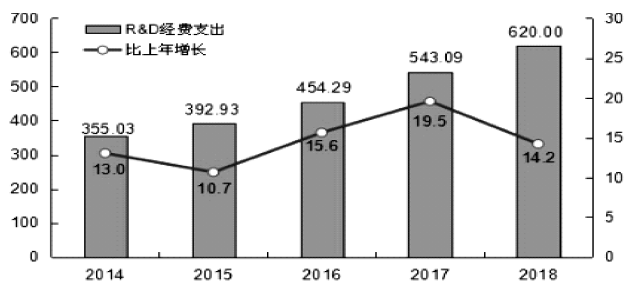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18 福建省 R&D 经费支出

Fig.1 R&D expenditure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18

收稿日期:2019-07-01

基金项目:2019 年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JAS19219)。

作者简介:魏佳思(1984-),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企业财务管理研究。

而在下表 1 则为福建统计局官网公布的 2019 年 1-5 月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经济指标,指标中可见福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396.34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2293.77 亿元。

表 1 2019 年 1-5 月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指标

Tab. 1 Economic indicators of enterprises above scale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January to May 2019

| 分类标准 | 指标名称 |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 |
|-------|----------------|----------|---------|----------|---------|
| | | 1-5月(亿元) | 同比增减(%) | 1-5月(亿元) | 同比增减(%) |
| | 总计 | 22293.77 | 11.9 | 1396.34 | 12.7 |
| 按行业 | 采矿业 | 305.22 | 16.7 | 14.92 | 10.8 |
| | 制造业 | 21061.66 | 11.8 | 1305.53 | 12.1 |
|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电业 | 926.9 | 12.9 | 75.9 | 25.6 |
| 按规模 | 大型企业 | 5981.62 | 7.3 | 494.87 | 6 |
| | 中型企业 | 6803.78 | 8.9 | 411.06 | 9.1 |
| | 小型企业 | 9370.75 | 17.2 | 483.82 | 24.2 |
| | 微型企业 | 137.62 | 22.5 | 6.59 | 29.7 |
| 按控股情况 | 国有控股企业 | 2492.46 | 5.9 | 157.29 | -9.5 |
| | 非国有企业 | 19586.72 | 12.7 | 1226.6 | 16.2 |
| 按注册登记 | 集体企业 | 60.43 | 12.1 | 1.46 | 24.8 |
| | 股份合作企业 | 36.44 | 17.1 | 2.47 | 197.6 |
| | 股份制企业 | 15088.17 | 14.1 | 927.42 | 12.8 |
| |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 6829.16 | 7.1 | 449.89 | 11.9 |
| 按轻重工业 | 轻工业 | 11233.48 | 11.7 | 725.67 | 18.1 |
| | 重工业 | 11060.29 | 12.1 | 670.68 | 7.5 |

上述对福建省 R&D 经费支出与 2019 年 1-5 月福建省规模以上企业经济指标的叙述在大数据时代

之前可能无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联,但在当前可以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的时代里,通过数据处理,总是能够找到看似不相连的数据之间的关系。更何况,在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点中,企业的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本身就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企业需要完成的社会责任是建立在企业获利上的,而企业的获利与否,与企业创新之间又息息相关。

因此,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是否存在内敛的关系,便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以及实际上的行动意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所有公司必须关注的课题,公司都以更具策略性和全面的方法去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图3所展示的一间公司可以用来识别其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框架也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象。从图中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象包括:组织利益相关者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公司内部)、经济利益相关者 (economic stakeholders)(公司外部)和社会利益相关者(societal stakeholders)(公司外部)。其中组织利益相关者包括有员工、经理、股东和工会,这些都是公司最重要的内部利益相关者。^[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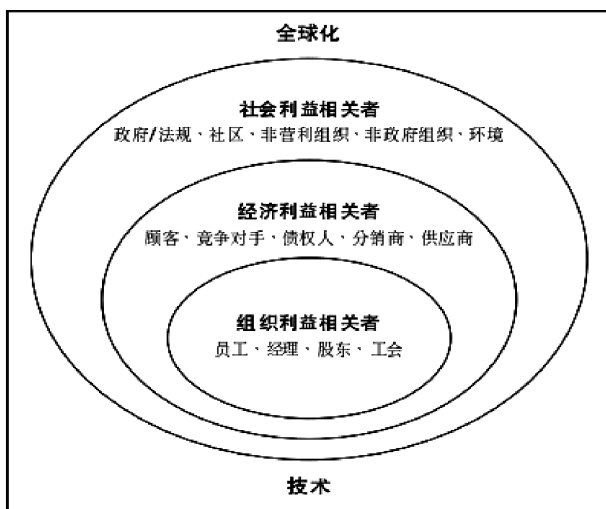


图2 利益相关理论简图

Fig.2 Brief sketch of Interest-related theory

(二) 创新绩效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创新当然不仅是“新思想、新

思维、新设备或方法的发现”。在定义上,创新指的是相对已有的东西而言,会是一种原创且更有效的东西,因而通常是“新”且更有用的。

在企业领域,创新绩效是一个很难被量化的指标,但另外一个同样可以表达该含义的指标则非常容易获取,那就是企业获得专利。专利即是专利权,而专利授权数是最为直观的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获得授权的专利数才可以直接在企业投入使用,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2]通过前文对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的叙述,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如下图4所示本文研究的理论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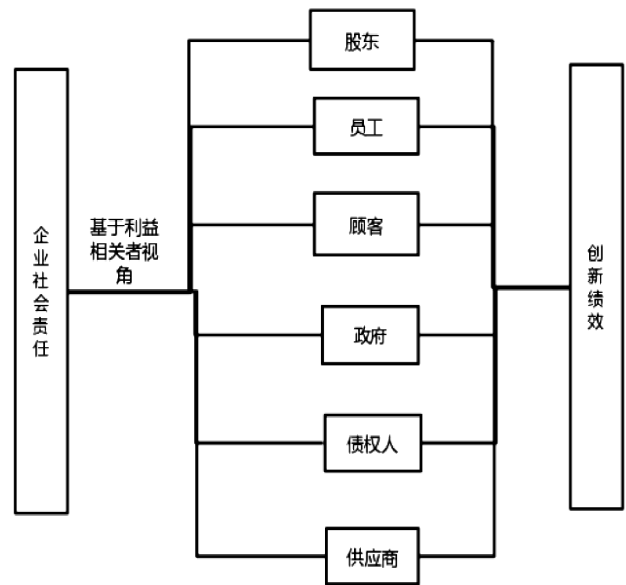


图3 本文理论结构模型

Fig.3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model in this paper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企业中,创新可能与效率、生产力、质量、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积极变化相关联。而效率、生产力、质量、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积极变化所带来的必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化。^[3]企业能够将创新活动转化为切实的绩效改进方面的互补作用。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为工作组提供创新机会和资源来提高利润和绩效。无论是在现有企业、公共服务机构,还是由家庭中的个体发起的新企业,创新都是企业家精神的特定功能,它是企业家创造新的财富生产资源或赋予现

有资源以增加创造财富潜力的手段。^[4]

颠覆性创新是未来商业成功的关键。企业有必要创造和培育创新环境,管理人员需要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并将变革发挥到自己的优势。^[5]随着技术使用的增加,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公司将不得不重新设计其业务以保持竞争力,从而间接地完成创新。而持续性创新虽速度较慢,但有可能在长期内为全球技术系统创建新的基础。

总结来说,企业创新无论对企业的生存还是发展都是具有正向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水准也与企业生存和发展之间有着正相关。因此,为对这种论述进行研究,本文以福建为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下表 2 所示假设:

表 2 研究假设

Tab.2 research hypothesis

| 假设 | 假设描述 |
|-------|--------------------------|
| 假设 F1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 假设 F2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股东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 假设 F3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顾客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 假设 F4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政府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 假设 F5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债权人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 假设 F6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供应商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拟以福建省为例就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按照 2018 年福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 年,福建共有 133 家 A 股上市企业,1 家 B 股上市企业。从 134 家企业中进行数据选取,数据选取时间范围为 2015-2018,在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后,共得到有效数据 79 份。数据来自对相关数据库(国富安、巨潮资讯等)的查阅以及各企业官网。

(三) 变量选取

1. 解释变量

在本文中,因为研究对象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

创新绩效,因此解释变量也由此两者组成。其中,企业创新绩效以企业专利授权数进行替代。^[6]而企业社会责任则包括对员工、股东、政府、顾客、债权人、社会、供应商等诸多相关利益方,具体表述见下表 2 所示。

2. 控制变量

为尽量排除探寻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时由企业因素带来的差异性影响,选取资产报酬率、托宾 Q 值、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四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使分析结果更为准确,其计算公式如表 3 所示。

表 3 选取变量释义

Tab.3 Definition of selected variables

| 变量选取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计算公式 |
|------|------------|------|------------------|
| 解释变量 | 专利授权数 | X1 | — |
| | 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 | Y1 | 为员工支出/营业收入 |
| | 企业对股东社会责任 | Y2 | 税后利润/股本总数 |
| | 企业对顾客社会责任 | Y3 | 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
| | 企业对政府社会责任 | Y4 | 实际支付税额/营业收入 |
| | 企业对债权人社会责任 | Y5 |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
| 控制变量 | 企业对供应商社会责任 | Y6 | 年内应付账款周转次数 |
| | 资产报酬率 | ROA | 息税前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
| | 托宾 Q 值 | Q | 企业市价(股价)/企业的重置成本 |
| | 资产负债率 | DTA | 期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
| | 企业规模 | SIZE | 总资产 |

三、实证分析

(一) 模型构建

从前文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业绩的假设以及变量的选取中,本文构建了如下所示模型:

$$X1_{it} = a_1 Y1_{it} + a_2 Y2_{it} + a_3 Y3_{it} + a_4 Y4_{it} + a_5 Y5_{it} + a_6 Y6_{it} + a_7 ROA_{it} + a_8 Q_{it} + a_9 DTA_{it} + a_{10} SIZE_{it} + \gamma \quad (1)$$

$$X1_{it} = a_1 Y1_{it} + a_2 Y2_{it} + a_3 Y3_{it} + a_4 Y4_{it} + a_5 Y5_{it} + a_6 Y6_{it} + a_7 ROA_{it} + a_8 Q_{it} + a_9 DTA_{it} + \gamma \quad (2)$$

其中,i 表示样本公司,t 表示年份, γ 是为了消除其他因素影响而引入的随机变量。

(二) 描述性分析

表 4 解释变量描述性分析

Tab.4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interpretative variables

| 指标 | 样本数 | 均值 | 方差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X1 | 79 | 21.06 | 60.03 | 9 | 0 | 820 |
| Y1 | 79 | 0.29 | 0.35 | 0.12 | 0.014 | 0.84 |
| Y2 | 79 | 0.31 | 0.56 | 0.14 | 0.022 | 0.53 |
| Y3 | 79 | 0.37 | 0.21 | 0.24 | 0.036 | 1.31 |
| Y4 | 79 | 0.077 | 1.2 | 0.032 | -0.019 | 0.898 |
| Y5 | 79 | 0.073 | 0.06 | 0.045 | 0.032 | 2.789 |
| Y6 | 79 | 0.051 | 0.32 | 0.037 | 0.01 | 0.107 |

在表 3 的解释变量描述性分析中可以看到,在专利数上,最小值是 0,最大值为 820,表示在统计的 79 家企业中,获得专利数最大的企业与最少的企业间有着极大的差距。而在对员工社会责任上,最大与最小之间差距较大,说明接受调研的企业企人力成本差距极大。在对股东社会责任上,最小值为 0.022,可见有

企业对股东利益并不能很好的满足。在对顾客社会责任上,均值为 0.37,可见接受调查的 79 家福建省企业,其获客成本是较高的,可能与调查的企业以传统行业为主有关。企业对政府责任中,最小值为负数,可能是由于退税因素造成的。而在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方面,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有较大出入,这不仅表明受调查的企业其负债水平各有差异还表露了部分企业资产恐怕存在结构性问题。

而在下表 4 的控制变量描述性分析中可以看到,总资产随着时间的前进是呈上升趋势的,这表明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情况良好,业务呈上升趋势。其资产负债率同样也有随时间前进而增多的趋势,但总体而言比较平稳,再对比其托宾 Q 和资产报酬率,其变化同样较为稳定,这与企业的经营规模扩大以及这些被选取的企业都是上市公司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

表 5 控制变量描述性分析

Tab.5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control variables

| 指标 | 年份 | 均值 | 方差 | 中位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总资产 | 2015 | 2.46E+09 | 4.83E+09 | 1.41E+09 | 2.55E+08 | 6.56E+10 |
| | 2016 | 2.8E+09 | 5.22E+09 | 1.54E+09 | 2.4E+08 | 6.87E+10 |
| | 2017 | 3.17E+09 | 5.69E+09 | 1.8E+09 | 2.46E+08 | 7.64E+10 |
| | 2018 | 3.71E+09 | 6.58E+09 | 2.06E+09 | 2.38E+08 | 9.4E+10 |
| 资产负债率 | 2015 | 0.2709 | 0.1689 | 0.2402 | 0.0149 | 0.8682 |
| | 2016 | 0.299 | 0.1732 | 0.2673 | 0.014 | 0.8754 |
| | 2017 | 0.3261 | 0.1746 | 0.3075 | 0.008 | 0.8337 |
| | 2018 | 0.3472 | 0.1698 | 0.3267 | 0.0091 | 0.8639 |
| 托宾 Q | 2015 | 1.9797 | 0.9661 | 1.7892 | 0.1913 | 6.8251 |
| | 2016 | 1.6616 | 0.939 | 1.431 | 0.1743 | 7.6148 |
| | 2017 | 2.1289 | 1.4164 | 1.7971 | 0.2385 | 9.7395 |
| | 2018 | 2.4024 | 1.4882 | 2.0421 | 0.2981 | 9.6519 |
| 资产报酬率 | 2015 | 0.0521 | 0.0485 | 0.0509 | -0.0788 | 0.4879 |
| | 2016 | 0.0506 | 0.0489 | 0.0482 | -0.3651 | 0.2765 |
| | 2017 | 0.0499 | 0.053 | 0.0467 | -0.384 | 0.2466 |
| | 2018 | 0.0532 | 0.0486 | 0.0454 | -0.2463 | 0.2601 |

(三) 回归分析

注:*,**,*** 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 t 值

表 6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业绩回归性分析

Tab.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变量 | 专利授权数(X1) | | |
|----------------|-----------------|-------|-------|
| | 系数 | 标准误差 | Sig. |
| 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F1) | -.305**(-4.683) | 0.068 | 0.000 |
| 企业对股东社会责任(F2) | .264**(.563) | 0.021 | 0.000 |
| 企业对顾客社会责任(F3) | -.194**(-3.289) | 0.024 | 0.000 |
| 企业对政府社会责任(F4) | .156**(.305) | 0.021 | 0.000 |
| 企业对债权人社会责任(F5) | -.069(-0.967) | 0.631 | 0.000 |
| 企业对供应商社会责任(F6) | .124(2.369) | 0.011 | 0.000 |

对比上表 5 所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业绩回归性分析,从其中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业绩之间的关系既有正相关也有不相关还有负相关。也就是说前文的假设既有成立项也有不成立项。结合前文与表 5 内容,可以得到下表 6 所示假设成立与否确认表。

表 7 假设成立与否确认表

Tab.7 Assumption validation table

| 假设 | 假设描述 | 是否成立 | 实际情况 |
|-------|--------------------------|------|------|
| 假设 F1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否 | 负相关 |
| 假设 F2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股东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是 | — |
| 假设 F3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顾客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否 | 负相关 |
| 假设 F4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政府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是 | — |
| 假设 F5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债权人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否 | 不相关 |
| 假设 F6 |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供应商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 | 否 | 不相关 |

从中可以看到,假设 F1、F3、F5、F6 因为回归分析结果与假设结果相左,并不成立,而假设 F2、F4 则与回归分析结果高度吻合,假设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选取相应变量开展的对福建 79 家上市企业描述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前文所做的关于企业创新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假设既有成立的部分也有未成立的部分,并由此得到以下结论:

1.在对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的回归性分析中,两者呈 0.05 水平上的负相关,假设 F1 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一项并不成立。这说明在企业的经营中,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于创新绩效有妨害。

2.在回归分析中,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股东社会责任呈 0.05 水平的正相关,假设 F2 成立。表明在企业的经营中,要为股东赚取利益,企业在企业创新绩效上要有作为。

3.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顾客社会责任的回归分析表明二者在 0.05 水平呈负相关,假设 F3 不成立。表明在顾客社会责任和创新绩效上,企业并不能获得一致,恐怕在经营中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4.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政府社会责任的分析表明二者在 0.05 水平呈正相关,假设 F4 成立。这也表明

在企业的经营中,创新绩效同企业对政府社会责任有重合之处,企业的创新可以提高企业对政府社会责任。

5.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债权人社会责任以及企业对供应商社会责任之间都并不存在相关,因此假设 F5、F6 不成立。

6.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不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的研究,其研究结果中,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企业对顾客社会责任、企业对债权人社会责任、企业对供应商社会责任都存在有相应的正相关关系,与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有出入。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福建省上市企业,研究对象的选取有明显的地域倾向,其结果也仅适用于福建省区域,不具备地域空间上的普适性;第二则是样本的来源中,研究对象多为传统制造企业,而近年来传统制造业的疲惫已是有目共睹,因此以这些企业为对象的研究结果其呈现与以往学者的研究有出入也在意料之中。

(二)相关建议

1.从前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福建上市企业而言,对政府社会责任与对股东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的。因此建议企业在面对政府工作时,要积极应对政府相关规章制度,配合政府工作,将企业对政府社会责任纳入公司常规管理,提升其对政府责任履行效率;^[7]而在对股东社会责任上,要充分发挥股东大会力量,合理配置优化股权,积极履行对股东社会责任。

2.在研究中也发现,就福建区域而言,企业创新绩效与员工社会责任、对顾客社会责任都呈负相关,与债权人社会责任之间则是不相关,这样的情况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提高对顾客、员工与债权人的关注与投入。而员工和顾客是企业的根本,债权人也是企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企业不愿意对员工、顾客和债权人履行社会责任,显然是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8]而在其他地区的研究中也显示对员工、顾客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履行是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此,为提高福建省上市企业发展,加强其市场竞争力,建议相关部门从政策层面对福建省企业进行引导,加强企业对员工、顾客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履行,进而扭转当前福建省上市企业创新绩效与对员工、顾客社

会责任负相关,与对债权人社会责任不相关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YANG W,YANG S.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under the Chinese Context –Based on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Large, Small and Medium–Size Listed Companies [J].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16 (24): 143–150.

[2] WANG C,LIANG H.Research on the Relev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of Commercial Listed Companies [J]. Friends of Accounting, 2016(4):80–83.

[3] 李文茜,贾兴平,廖勇海,等.多视角整合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8(2):237–

245.

[4] 龚晨,毕克新.低碳情境下制造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预测, 2018(3):25–27.

[5] 刘海龙,齐琪.基于文献分析的企业社会责任创新研究模型构建[J].财会月刊(下),2017(8):75–80.

[6] 杨泽帅,孙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绩效的互动:基于101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J].新疆农垦经济,2017 (8):90–99.

[7] 李岚.战略导向、社会责任与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J].经济经纬,2018(5):128–134.

[8] 邹非,朱庆华,王菁.基于多案例分析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对绩效的影响[J].科技与管理,2019(1):96–103.

(责任编辑:白 晔)

Research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EI Jiasi

(School of Accounting,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79 listed companies in Fuji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2015 to 2018 was described based on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of descriptive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terprises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 and custom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nterpris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shareholders, govern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enterprises are not relevant between creditors, suppli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ujian

汉语俗语在留学生中级口语教学的考察分析

杨鹤澜

(东北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汉语俗语是民间的智慧,是民间口语的精华,了解并能正确运用一些俗语是留学生进入中高级阶段汉语口语能力的必然要求。文章分别选取三本有代表性的汉语中级水平口语教材作为分析对象,整理并考察汉语俗语在这三本口语教材中出现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我校国际教育学院五个中级班开展有关汉语俗语学习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反映了中级阶段留学生汉语俗语学习接受情况及对汉语常见俗语的掌握程度。该调查及分析有助于教师反观留学生中级口语教学。

关键词:汉语俗语;中级口语;口语教材;调查问卷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85-05

一、汉语俗语及俗语与留学生口语教学

(一)汉语俗语及其特点

俗语也称常言、俗语,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受某种事和物的启发,有感而发,看似普通但其实极其珍贵的语言。俗语经过人们口口相传并不断地补充、修改完善,最终成为固定语句。俗语在世界上诸多语言中是普遍存在的。汉语俗语是汉民族口语的精华。广义的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俗成语等民间语言;狭义的俗语指的是较为固定的、流传时间较长的、富有哲理的、生动活泼独立通俗的语句,如“开水不响,响水不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汉语词典中对俗语的定義分别有:“俗语,民间流行的、通俗而语意警醒或诙谐生动的定型语句,也说俗语”^[1];“俗语,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

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也叫俗语”^[2];“俗语,(1)民间流传的说法(2)通俗流行并已定型的语句(3)方言土语”^[3]。归纳起来,俗语这一概念的特点有两点:其一是通俗并广泛流行,其二是语句定型,内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本文所论的俗语即是狭义范畴的俗语,不包括谚语、歇后语等在内。汉语俗语作为老百姓口语的精华,它表意幽默,形象生动,相对而言简单易懂,说理深刻。在朴素的话语中蕴含智慧和真理,话俗理不俗。这是俗语内容上的特点,同时俗语语言多运用比喻、夸张、对比、对仗的手法,同时注意押韵,体现出了汉语独有的语言风貌,又工整凝练,实在是汉语语言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俗语按内容分类包括:修身治学类、为政类、待人处事类、智谋技艺类、伦理道德类、世态习俗类和生活常识类等,可见俗语内容包罗万象,可以说是生活的提炼。俗语从来源上看源头不一,有的来自典籍,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有的来自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来自文学作品,如“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三国演义》)。还有很多俗语来自老百姓的生活之道,如“火候不到不揭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俗语广泛地应

收稿日期:2019-05-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01320021551500);2017年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1704040110)。

作者简介:杨鹤澜(1981-),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研究。

用于我们的言语中,无论学历水平如何,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使用一些俗语。可以说,中国人真实生活中,离不开俗语。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在课本中,甚至更多地是在生活中学到俗语。

(二)汉语俗语与留学生口语教学

俗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这么普遍,留学生在汉语口语学习中是否会接触到汉语俗语呢?是否应该学习一些常用的俗语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些留学生在初学汉语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老师可能会在课堂上用“不怕慢,就怕站”这六个字来鼓励他。这六个字每个汉字都很简单,语音又押韵,也反应出学习过程中的特点,对学生来说,既好记又可以带来学习动力。这六个字学生可以轻松地学会并灵活应用,殊不知无形中也学习了汉语的俗语。许多学生可能会在课堂上学到几则俗语,不过留学生缺少对汉语俗语的整体认识。

俗语具有简练生动的特点,同时蕴含着汉文化汉民族的特点,在留学生进入到中级阶段以后,汉语口语学习中应该适当学习一些汉语俗语,让自己的汉语更中国、更地道。学者周小兵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禁忌语、吉利话、隐喻、成语、歇后语、习惯用语等,大多含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反映出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中高级交际文化教学的重点”^[4]。我们在中高级别口语教学中应该重视汉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民间语言的教学,应该将中国老百姓的活生生的语言输

入课堂教学,学生们学到的口语应该是中国人真正说的,真正用的汉语。俗语学习既是语言教学也是文化教学,口语教学中离不开中国人常说的俗语,俗语中蕴含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文化信息,中国的传统习俗等又是文化的因素。因此,在口语课中适当加入俗语的教学十分有必要。

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汉语教学俗语的研究散见一些论文,近年来许多学位论文也将焦点集中于此,如:石美丽(2012)、杨程(2014)、韩姝雯(2015)、黄翘楚(2015)、吴雅婷(2016)、刘佳(2017)、彭潇颖(2018)都撰写了关于俗语或熟语教学的学位论文。

二、三本中级口语教材中汉语俗语出现情况考察

我们针对留学生的口语教材中是否有俗语的介入呢?这里我们基于中级阶段口语教学,择取三本中级口语教材,考察汉语俗语在教材中出现的情况,看看俗语出现的几率和教材对俗语的注释情况。笔者选取的三本口语教材难度相当,各有侧重,其中两本是普通汉语进修中级口语教材,一本是汉语言本科专业系列教材。三本教材的编写出版年限不同,对待俗语的讲解及重视程度也略有差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推进,教材对俗语的注释更趋于细致化。三本教材俗语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三本口语教材的基本情况及俗语在教材中的基本信息表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hree oral textbooks and basic information of common sayings in the three textbooks

| 教材名称 | 《中级汉语口语(第二版)2》 | 《汉语中级口语教程(下)》 | 发展汉语《中级口语(II)》 |
|---------|--|---|---|
| 出版信息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 |
| 教材类别 | 普通语言进修教材 | 汉语言本科系列教材 | 普通语言进修教材 |
| 教材编写突出点 | 口语知识讲解系统化,对口语中经常使用的语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并增设口语常用语单元。 | 教材有意识在中华文化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引导他们走进中国社会,走进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领略汉语与中华文化魅力;每课有一首诗词。 | 课文和练习注重突出口语风格;选文立足“中国事情”突出中国元素,兼顾世界性话题和跨文化交际问题。任务性练习的设计完善,便于学习者在自助和互动中完成具体语言任务。 |
| 教材总课数 | 16 | 16 | 15 |
| 俗语条目数 | 12 | 11 | 17 |
| 俗语出现处 | 主课文 | 主课文 | 主课文及课后习题 |
| 注释情况 | 主课文后均有对俗语的汉语注释,无拼音和英文注释。 | 只有作为生词出现在主课文中的五个俗语有中文注释,其他俗语无注释。 | 在课文中出现的俗语有英文注释,无中文注释,习题中出现的俗语部分有英文注释。 |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这三本教材每本教材俗语的数量都在 10 则以上,主要都在课文中出现。在注释方面,《汉语中级口语教程(下)》这本教材存在一定缺憾,注释部分欠缺。其他两本教材均有注释,由于发展汉语《中级口语(II)》出版时间略近些,编者对俗语给出了英文注释,这一点较之其他两本教材有所进步。同时近几年出版的发展汉语《中级口语(II)》在俗语数目上也较之其他两本教材更多。三本教材详细的俗语条目见表 2。

表 2 三本口语教材中出现的汉语俗语一览表

Tab.2 A list of common sayings in the three oral textbooks

| 教材名称 | 教材中出现的俗语条目 |
|----------------|--|
| 《中级汉语口语(第二版)2》 | 1.太阳从西边出来 2.恭敬不如从命 3.可怜天下父母心 4.人怕出名猪怕壮 5.人不可貌相 6.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7.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8.好女不嫁二夫 9.说曹操,曹操到 10.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11.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12.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
| 《汉语中级口语教程(下)》 | 1.可怜天下父母心 2.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不如意事七八九,如意之事一二三 4.一回生,二回熟 5.一招鲜,吃遍天 6.吃一堑,长一智 7.贪多嚼不烂 8.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9.五十步笑百步 10.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1.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
| 发展汉语《中级口语(II)》 | 1.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2.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3.天上掉馅饼 4.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5.高不成,低不就 6.站着说话不腰疼 7.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8.脱了裤子放屁 9.隔行如隔山 10.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11.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12.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3.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4.远亲不如近邻 15.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6.打退堂鼓 17.这山望着那山高 |

表 2 列出了三本教材中出现的具体俗语条目,这些俗语都是中国人在口语会话中常说常用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俗语中有来自老百姓生活朴素语言,如“这山望着那山高”,也有来自于历史典故的内容,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很有趣的是不同的教材中有重复出现的两个俗语,分别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可怜天下父母心”,可见这两句俗语的普及性。课文中所选的俗语都是紧贴课文会话,非常贴切地穿插在口语会话中,俗语的使用让口语会话更加生

动,也显得教材口语内容更本色,具有口头语言的特点。通过对三本中级口语教材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汉语口语教材中注意到了汉语俗语在口语会话中存在的普遍性的特点,教材的课文中适时地加入了俗语的内容以还原中国人的会话。可见,汉语俗语在中级阶段口语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掌握一些常用俗语是对中级水平学生的要求,同时也可以切实提高学生口语水平。

三、中级水平留学生俗语学习与掌握情况调查反馈

(一)调查问卷反馈情况

为了考察中级学生俗语学习情况,我们在国际教育学院中级水平的 5 个班级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1 份,回收问卷 50 份,该调查有效。此次涉及调查的学生国别情况如下:亚洲生源:韩国 22 人,朝鲜 14 人,越南 2 人,日本 1 人;欧洲生源:俄罗斯 4 人,白俄罗斯 2 人,波兰 4 人,非洲生源:多哥 1 人。所有学生汉语学习年限均在一年以上,所测学生汉语学习的平均年限为 2 年。此调查问卷意在反映出中级阶段留学生对俗语是否知晓,对中国人常说常用的 10 则俗语的了解情况以及对俗语学习的兴趣度。此次调查问卷共 20 道题,题 1-4 意在察看学生对俗语的基本掌握情况,调查反馈见图 1。6-14 题为 10 则具体俗语条目,考察学生们的掌握情况,见图 2。15-20 题意在调查学生对俗语的总体感觉及学习意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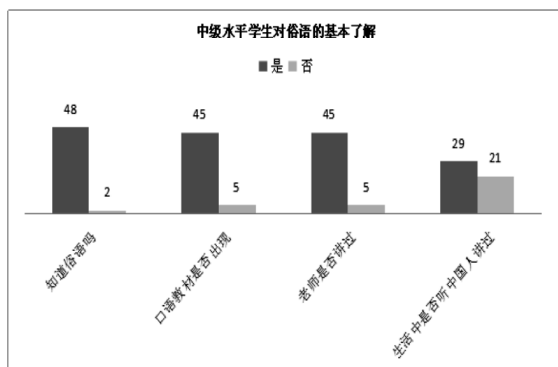


图 1 留学生对汉语俗语基本了解情况反馈图

Fig. 1 Feedback of foreign students' basic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ommon say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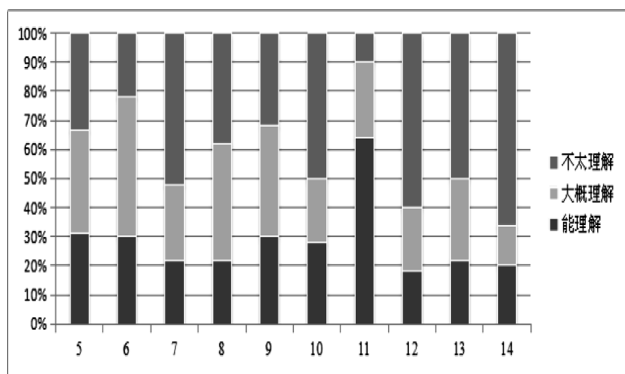


图2 调查问卷中10则常用汉语俗语学生作答情况图

Fig.2 Ten commonly used Chinese common sayings were used in the questionnaire

(二)调查问卷反馈分析

通过图1我们可以看出中级水平的留学生对俗语有一定的了解,教学和学习中也接触过俗语,但是在与中国人实际对话中听到的不多。这可能是由于留学生跟中国人对话主要限于生活简单对话,没有一些俗语使用情境。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对具体的10则俗语的理解情况。这10则俗语包括:“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不怕慢,就怕站”“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从反馈的情况来看,学生理解最好的俗语是11题,“不怕慢,就怕站”,只有10%的同学表示不太理解,这句俗语很有可能是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经常说的鼓励学生的话语,因此熟悉度最高。学生理解度最低的俗语是12题“不管三七二十一”(60%不太理解)和14题“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66%不太理解)。这两句话在中国人的口语中是较为常见的俗语,不过对于其含义,许多同学表示不能理解。笔者在教学中也发现学生对这类没有文字障碍,但实际意义却摸不着头脑的俗语存在疑惑。这也反映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留学生对一些常用俗语能够理解,但是那些具有独特民族性、有民间文化积淀,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一些俗语比较难理解其真正含义。

还有余下的题目15-20目的是考察学生对俗语的整体印象,察看学习意向。调查结果如下:32%的学生认为学习俗语很有必要,68%学生认为可以学一

点;24%的学生认为俗语不难理解,70%学生认为俗语个别的难理解,6%学生认为难理解;34%的学生认为俗语挺有趣,64%学生认为俗语还可以,2%学生认为俗语没什么意思;42%学生很想在汉语口语教学多学习俗语,56%学生可以学一点,2%不想学习;关于学习方法方面,42%学生喜欢在课堂学习,26%学生喜欢看相关书籍,还有32%学生倾向于看电视剧电影学习;如果开设一门俗语课程的话,40%学生表示非常欢迎,48%学生表示有时间会学,12%学生表示不感兴趣。留学生普遍认为俗语比较有趣,对俗语的学习有一定的兴趣,且有学习的必要,学习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课堂、看书、电视剧)。

四、留学生中级口语课引入俗语学习的必要性

通过上述对教材的考察和对留学生俗语学习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中级口语教材中涉及了一些俗语语言点,中级口语教学需要汉语俗语的介入。中级水平留学生自身也已经学习掌握了一些汉语俗语,并对俗语有一定的兴趣,有学习意愿。汉语俗语是汉语口头语言千百年来的精华积淀,在民间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想要练就纯正的汉语口语能力,势必需要提高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熟语的学习。同时,俗语中蕴含着中国民间智慧,其句式有汉语的对仗、比喻、夸张、押韵的特点,言简意赅,同时还存在着古汉语的句式特点,对于学生提高汉语水平,增进汉语文化学习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汉语教师在口语教学中应重视起俗语内容的教学。对教材中提到的俗语,应准确精当地阐释,帮助学生理解并会运用,也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增加几则适合语境的汉语俗语,增加课堂的生动性。另外,如果教学单位有条件,可以开设以汉语俗语为主题的选修课程或讲座,丰富学生的学习。

参考文献:

[1] 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1254.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47.

文选(周小兵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328.

- [3]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596.

(责任编辑:陈 果)

- [4] 周小兵.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M]/汉语教学名家

Analysis of Chinese Common Sayings in Intermediate Oral Teaching for Foreign Students

YANG Hel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04)

Abstract: Chinese common saying, the wisdom of common people, is the essence of folk oral Chinese.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ly applying some common saying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foreign students on th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s. This article selects three oral Chinese textbooks as analysis objects. So as to collect and examine the appearance of Chinese common sayings in these three oral textbooks. On this basis, a questionnaire on Chinese common sayings learning was conducted in five intermediate classes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flec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mmon sayings and the mastery of Chinese common sayings. The survey and analysis in this paper may help teachers reflect on the intermediate oral teaching for foreign students.

Key words: Chinese common saying; intermediate oral course; oral Chinese textbooks; questionnaire

MOOC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生自主性学习策略研究

罗锦英

(武夷学院 教务处,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MOOC作为一种新型学习方式,是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MOOC对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MOOC时代地方高校学生自主性学习现状主要表现为学习主动性不够、学习目标性不强、学习策略不正确、学习缺少沟通和合作、学习缺乏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等。基于高校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现状,探索MOOC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策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性。

关键词:MOOC;地方高校;自主性学习;学习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90-04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教育信息化加快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和学方式,着力提升学生的信息化素养、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MOOC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高级形态,是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随着MOOC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尤其是优质资源紧缺的地方高校,不断将慕课引入日常的教学,希望借此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但MOOC教学要在学生自主性学习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进行,而地方高校学生由于生源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学生在自主性学习能力上稍弱,导致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较低,因此在MOOC背景下探索地方高校学生自主性学习策略显得尤其重要。

一、MOOC背景下自主性学习的内涵和特征

MOOC背景下自主性学习是一种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引导下,以MOOC资源为依托、以学习者为核心、通过运用信息科技与互联网技术进行高效学习、资源

传播的一种学习方式。^[1]

MOOC背景下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2-3]:

(一)学习的主动性

MOOC具有大规模、开放性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慕课与传统教学相比可以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主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方式可以自由安排,以期实现高效学习。

(二)学习的独立性

学生学习不受时间、地点等条件的限制,可以不用过分依赖教师或同学,就可独立开展学习活动;同时可以借助MOOC平台的过程性学习统计和分析功能,来独立评估自己的学习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

(三)学习的合作性

自主性学习虽然具有独立性的特点,但它并不是独立封闭式的学习过程。学生可以根据课程学习进度安排与团队其他成员协作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相互沟通交流、互教互学,共同提高,使有效学习得以实现。

(四)学习的创造性

MOOC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自己未曾接触过的知识。学生在自主学

收稿日期:2019-09-24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JAS170524)。

作者简介:罗锦英(1983-),女,汉族,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习的过程中,很容易受新思想的启发,完成知识的再创造。

(五)学习的趣味性

MOOC 的视频以某个知识点为一小节,所以一个视频通常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很符合人脑认知规律和网络时代碎片化学习的特点。同时,学习过程中会有类游戏化设置,可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兴趣。

二、MOOC 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现状分析

MOOC 在地方高校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完全融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受以往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的影响,地方高校学生学习习惯于依赖教师,期望在教师的“满堂灌”和监督下学习,自主性学习能力严重缺失。^[4]

(一)学习主动性不够

长期受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地方高校学生已经习惯于按照老师的进度进行学习,对老师依赖性极强。王成成等人调查发现,有 71.6% 的学生认为即使有了 MOOC,现实中的老师也是不可或缺的。^[5]在比较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时长与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的时长,发现学生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长基本集中在 1~5 小时,而学生每天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的时间基本集中在 1~2 小时,相比于学生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间,用于 MOOC 学习的时间较少,学生更喜欢利用互联网进行娱乐或者交流,而平时 MOOC 学习只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6]

(二)学习目标性不强

一部分学生选择 MOOC 只是为了修学分,而不关注课程的学习内容。学习时有急功近利的心理,比较关注作业内容和要求、课程结束时间、考试时间、考试方式及试题难易程度等。他们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所以学习过程中,只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部分章节,学习中遇到难题也很容易放弃,从而导致 MOOC 辍学率较高。^[7]

(三)学习策略不正确

学习策略对于学生 MOOC 自主性学习效果有着重要影响。黄德群等人^[8]调查发现,大部分地方高校学

生没有较好的学习策略,他们在策略使用上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王晓璐等人调查发现,学生对 MOOC 的学习方法较单一,对 MOOC 的学习内容几乎全盘接受,不会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调整学习进度,学习效果较差。^[9]

(四)学习缺少沟通和合作

MOOC 学习不同于其他课程学习,其授课内容大多是老师提前录制好的,学生线下个人完成学习,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缺少面对面的沟通和合作。同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难题等困惑时,无法及时得到老师的解答,有时只能等老师或者助教上线时再咨询,或者等到翻转课堂上再进行提问,使得知识的理解和消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而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五)学习缺乏自我监控与自我评价

大量研究表明,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要取决于学生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能力等因素。目前地方高校有很大一部分学生缺乏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能力。^[10]陈燕翔通过问卷调查发现,79.5% 的学生表示自己在没有教师的监控下不能很好地进行学习,16.4% 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从未进行自我评测,有 69.9% 的学生偶尔会进行自我评测。^[11]因为缺乏自我监控,所以学生利用更多的空余时间进行娱乐,从而很难按照课程学习进度进行学习;因为缺乏自我评价,所以学生在学习策略和学习能力上没有正确的认识,从而导致自主性学习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三、MOOC 背景下提高地方高校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策略

(一)引导学生了解、参与 MOOC, 加强学生对 MOOC 的认知

地方高校受多方条件的制约,在师资和优质资源等方面紧缺,为了共享各名校的优质在线教学资源,需充分利用 MOOC 开展教学。王世明等人调查发现,地方高校多达 31.78% 的学生没有尝试过慕课学习,因而地方高校要充分利用学校网站、宣传栏、选课说明会等途径加大 MOOC 学习平台的宣传力度,提高 MOOC 平台在学生中的知晓度,让更多学生了解并参

与 MOOC 学习,同时鼓励学生多参加校企合作的一些活动,如超星 Online 成长夏/冬令营等活动,体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享受 MOOC 学习带来的乐趣。^[4]

(二)实施“MOOC+翻转”教学,增强 MOOC 自主学习的效果

有研究认为,学生在 MOOC 学习过程当中真正学到的只有 5%的知识,但如果将 MOOC 更好地融入传统课堂,构建基于 MOOC 的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创造性思维,学生就能学到 90%的知识。^[12-13]随着信息化教学的发展,地方高校的学生可轻松获取各类优质 MOOC 资源,不再单纯依靠教师课堂传授知识,故教师需转变教学方式,更多的去引导学生利用 MOOC 进行课前课后自主性学习、课堂疑难问题的解答和讨论等,不断增强学生自主性学习的意识,掌握多样化的学习策略,从而提高学生自主性学习效果。

(三)重视个性化教学,提高 MOOC 学习的主动性

目前,MOOC 平台的课程主要构成是视频资源,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老师事先录制好的讲课视频或者拓展学习材料,由于每个学生学习基础和能力都不一样,所以导致 MOOC 总体学习效果不理想。首先 MOOC 平台可以开通学生专区,鼓励地方高校学生自行制作自己感兴趣课程的微课,展示在慕课平台。^[4]这样不仅可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还能加强学生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次,通过课前学生线上预习情况的反馈,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知识点掌握情况,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教师在课堂中对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深度互动和讨论。最后在 MOOC 注册之初,可以要求学生填写一些兴趣爱好等信息,在学习过程中,平台可以根据学生学习时长,推送些其感兴趣的视频或者时事新闻等,不仅可吸引学生自主学习兴趣,还可以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

(四)搭建自主性学习平台,增强 MOOC 学习过程中的沟通和合作

首先 MOOC 自主学习平台要保障多用户同时使用下平台依旧能够平稳地运行、用户体验感强、具有大数据分析、分析和反馈等功能;其次,由于平台缺少老师和同伴间的互动交流,故 MOOC 自主学习平台要强化师生、生生间的联结。基于社交软件的沟通交流

是联结师生的有效途径,国外的 MOOC 平台已经实现了与国外主流社交软件的联结,如 FaceBook, YouTube 等,但是我国 MOOC 平台还没有实现与主流社交软件,如微博、微信、QQ 等的联结。^[4]所以在搭建自主性学习平台时可与拥有大规模使用客户的主流社交软件建立联系,建立 MOOC 相应的社交版块,在几乎不改变老师上课习惯前提下,采用微信等社交软件进行实时答疑,而学习者也可以根据他们个人的喜好,拥有充分的交互自主权,从而更好推进师生、生生间沟通交流的粘性。

(五)建立自我监控和多元化评价机制,提高 MOOC 自主学习的效能感

地方高校学生在 MOOC 自主学习过程中,需对自身的学习情况有一定的自我监控,这样才能随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调整自己学习的节奏,已达最佳的学习效果。MOOC 自主学习过程中,需强调过程性评价,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可以引导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方向性。地方高校可以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过程性评价主要包括课前的导学评价、课中的讨论互动评价和课后的实践评价。终结性评价如客观题闭卷考核、主观题开卷相结合等的考核方式。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再仅关注最终的考试成绩,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效能感。

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地方高校只有不断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的习惯,使得学生懂得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与自己调控,才能实现地方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张宏娟.建构主义和英语语言学课堂教学[J].中国教育月刊,2015,37(S1):77-78.
- [2] 吕敏.网络环境下中学生自主学习管理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
- [3] 陈明.慕课时代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研究[J].文教资料,2016(30):180-181.
- [4] 王世明,李彩云,贾凯威.地方高校“慕课”教育的现状分析与对策[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1):72-76.
- [5] 王成成,徐华莉.MOOC 环境下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研究:

- 以某农业大学为例[J].农业灾害研究,2018,8(2):75-78.
- [6] 罗锦英.地方本科院校学生 MOOCs 学习行为研究[J].武汉轻工大学学报,2019,38(3):114-119.
- [7] HEW F,CHEUNG W.Students'and instructors'use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Motivations and challenges[J].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2014,5 (1):45-48.
- [8] 黄德群,林育曼,张其志.地方高校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现状与对策:以 MOOC 为视阈[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36(9):118-12.
- [9] 王晓璐,谢丽湘.慕课时代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策略研究[J].读与写杂志,2016,13(11):59-60.
- [10] 张梅.基于形成性自我评价的大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培养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1):140-144.
- [11] 陈燕翔.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自主学习存在的问题及管理策略优化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8.
- [12] 吴志春,张树明,姜勇彪.提高大学生利用 MOOC 进行自主学习之对策研究[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7,33(9):1-4.
- [13] 徐辉富,魏志慧,顾凤佳.直面变革:中国式 MOOCs 的实践探索[J].开放教育研究,2013,19(6):11-17.
- [14] 周长花.自主学习背景下高校慕课建设的策略[J].才智,2016(30):118-120.

(责任编辑:冯起国)

Research on Autonomous Learning Strategies of Local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OC

LUO Jinying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Wuyi University,Wuyishan,Fujian 354300)

Abstract:MOOC, as a new learning mode, is an important way and means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MOOC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college students on autonomous learning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ack of learning initiative, the weak of learning objectives, the wrong of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lack of self-monitoring and self-evalu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tonomous lear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for local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OC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Key words: MOOC; local college; autonomous learning; learning strategy

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基于安徽省6所高职院校的问卷调查

魏 婷, 王东华, 田 荣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处,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为探讨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关系,研究选用了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安徽省6所高职院校的318名高职生进行测试。得到结果如下:(1)高职生在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偏爱被试、母亲偏爱被试这几个因子和自我效能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2)高职生学生干部与否在父亲严厉惩罚、父亲过度保护、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严厉惩罚这几个因子上差异显著;(3)高职生的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与其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4)高职生的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过分干涉对其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因而得出高职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相关关系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94-04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类型之一,与学科型普通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截然不同。高等职业教育相对于以文化学习和理论研究为代表的普通高等教育而言,更偏重于技能培训和技术应用,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每年的高职毕业生人数超过了全日制本科生,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我国,目前大学仍然实行分批次招生,高职教育处于最后一个批次,高职生的文化课基础相对薄弱,综合素质较低,容易出现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过程中,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对待孩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倾向,包括父母传达的态度和情感。研究发现,父母教养孩子的方式影响孩子的社会性发展。^[1]

1977年班杜拉提出了自我效能理论,用来解释在某种情景中动机产生的原因。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某工作能力的推测与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动机。金引丽等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情绪和生理状态、言语劝导都对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影响。^[2]侯永梅等对医学院学生的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父母教养方式三者存在着一定的关系。^[3]已有文献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有重要的影响,而对于高职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不多,本研究选择了高职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旨在研究高职生的自我效能感和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为高职院校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安徽省6所高职院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一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40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318份。

(二) 研究工具

1.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由心理学家

收稿日期:2019-07-07

项目基金:安徽省2016-2018年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Szzgjh1-2-2018-29)。

作者简介:魏婷(1990-),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Schwarzer 等人编制,中文版的 GSES 由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共有 10 个问题,采用 4 点计分,1=很不符合,2=较不符合,3=比较符合,4=很符合。GSES 的信度良好,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重测信度 $r=0.83(p<0.001)$,折半信度为 $r=0.82(n=401,p<0.001)$ 。GSES 只有一个维度。^[4]

2.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由 Carlo Perris 等人编制,1993 年岳冬梅等人对 EMBU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一共 115 个条目。该量表有父亲和母亲两个方面,其中父亲教养方式分量表有 6 个维度,共 58 个条目,分别是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惩罚与严厉,父亲过分干涉,父亲偏爱,父亲拒绝与否认,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分量表有 5 个维度,共 57 个条目,分别是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母亲惩罚与严厉,母亲过分干涉,母亲过度保护,母亲偏爱,母亲拒绝与否认。量表采用 4 点计分,1=从不,2=有时,3=经常,4=总是。^[5]

(三) 研究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 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以及是否是学生干部上的差异分析

表 1 显示高职生在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偏爱被试与母亲偏爱被试这几个因子和自我效能感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 1 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Tab.1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efficacy

| | 男(N=141) | | 女(N=177) | | t |
|-----------|----------|-------|----------|-------|-----------|
| | M | SD | M | SD | |
| 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 51.475 | 8.705 | 53.333 | 7.998 | -1.979* |
| 父亲严厉惩罚 | 21.121 | 7.278 | 19.582 | 6.893 | 1.929 |
| 父亲过分干涉 | 21.220 | 4.163 | 20.531 | 4.395 | 1.421 |
| 父亲偏爱被试 | 6.177 | 5.548 | 8.972 | 5.045 | -4.644*** |
| 父亲拒绝否认 | 11.284 | 3.963 | 10.260 | 3.507 | 2.441 |
| 父亲过度保护 | 13.801 | 3.188 | 13.525 | 3.023 | 0.79 |
| 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 51.610 | 9.055 | 52.610 | 8.391 | -1.02 |
| 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 | 36.312 | 6.481 | 34.949 | 6.842 | 1.806 |
| 母亲拒绝否认 | 15.036 | 4.929 | 14.469 | 4.797 | 1.034 |
| 母亲严厉惩罚 | 15.965 | 6.038 | 15.215 | 5.794 | 1.125 |
| 母亲偏爱被试 | 6.376 | 5.660 | 8.910 | 4.890 | -4.209*** |
| 自我效能感 | 2.605 | 0.489 | 2.394 | 0.448 | 4.009*** |

(注:* $p<0.05$, ** $p<0.01$, *** $p<0.001$.)

表 2 显示高职生学生干部与否在父亲严厉惩罚、父亲过分干涉、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严厉惩罚这几个因子上差异显著。

表 2 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在学生干部与否上的差异检验

Tab.2 The tes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efficacy on student cadres

| | 担任学生干部(N=137) | | 未担任学生干部(N=180) | | t |
|-----------|---------------|--------|----------------|--------|---------|
| | M | SD | M | SD | |
| | 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 52.518 | 8.226 | 52.472 | |
| 父亲严厉惩罚 | 21.329 | 7.228 | 19.378 | 6.840 | 2.454* |
| 父亲过分干涉 | 21.387 | 4.120 | 20.378 | 4.374 | 2.086* |
| 父亲偏爱被试 | 7.796 | 5.780 | 7.639 | 5.171 | 0.25 |
| 父亲拒绝否认 | 11.102 | 3.586 | 10.356 | 3.756 | 1.788 |
| 父亲过度保护 | 14.102 | 2.926 | 13.267 | 3.151 | 2.411* |
| 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 51.905 | 8.353 | 52.339 | 8.976 | -0.439 |
| 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 | 36.781 | 6.296 | 34.556 | 6.833 | 2.971 |
| 母亲拒绝否认 | 15.642 | 4.985 | 13.939 | 4.526 | 3.177** |
| 母亲严厉惩罚 | 16.387 | 5.937 | 14.856 | 5.785 | 2.308* |
| 母亲偏爱被试 | 7.745 | 5.669 | 7.772 | 5.157 | -0.045 |
| 自我效能感 | 2.515 | 0.469 | 2.464 | 0.485 | 0.949 |

(注:* $p<0.05$, ** $p<0.01$, *** $p<0.001$.)

(二) 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表 3 结果显示,高职生的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和其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表 3 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Tab.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f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efficacy

| | 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 父亲严厉惩罚 | 父亲过分干涉 | 父亲偏爱被试 | 父亲拒绝否认 | 父亲过度保护 | 自我效能感 |
|-----------|-----------|----------|----------|---------|----------|----------|---------|
| 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 0.846*** | -0.151** | -0.066 | -0.003 | -0.171** | 0.158** | 0.258** |
| 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 | 0.075 | 0.570*** | 0.717*** | 0.073 | 0.581*** | 0.611*** | 0.175** |
| 母亲拒绝否认 | -0.107 | 0.776*** | 0.538*** | 0.113* | 0.830*** | 0.587*** | 0.106 |
| 母亲惩罚严厉 | -0.159** | 0.857*** | 0.496*** | 0.120* | 0.756*** | 0.492*** | 0.068 |
| 母亲偏爱被试 | 0.029 | .192** | 0.095 | .964*** | 0.091 | 0.146** | -0.06 |
| 自我效能感 | 0.224*** | 0.104 | 0.131* | -0.048 | 0.098 | 0.11 | 1 |

(注:* $p<0.05$, ** $p<0.01$, *** $p<0.001$.)

(三) 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为预测变量,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表4可得,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过分干涉是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解释率分别为6.6%和2.2%,影响系数分别为4.962和2.765。

表4 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ing styles on self-efficacy

| 因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 ² | ΔR ² | F | B | β | t |
|-------|-----------|-------|----------------|-----------------|--------|-------|-------|----------|
| 自我效能感 | 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 0.258 | 0.066 | 0.066 | 22.469 | 0.015 | 0.267 | 4.962*** |
| | 父亲过分干涉 | 0.297 | 0.088 | 0.022 | 7.643 | 0.017 | 0.149 | 2.765** |

三、讨论

(一) 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以及是否是学生干部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高职生在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偏爱被试、母亲偏爱被试这几个因子和自我效能感上性别差异明显。可看出父母亲在生活中给予女孩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更多,更加偏袒女孩,但是女生的自我效能感还是比男孩的低,这可能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方式有关,对女孩有很多约束,认为女孩应该文静、内敛,不张扬,导致女孩不能像男孩那样任意表现自己。

在父亲严厉惩罚、父亲过分干涉、父亲过度保护、母亲严厉惩罚和母亲拒绝否认这几个因子上,高职生学生干部与否差异显著,可以看出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的父母更加严厉,对他们的夸奖不多,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谦虚的认同。

(二) 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

由表3可知,高职生的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母亲过度保护与干涉这几个因子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这跟陈玉珠的研究基本一致,她认为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

关心能为子女提供更多的信任 and 安全感,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并且充满自信。^[1]而经常严厉的惩罚、干涉和否认批评会使子女缺少自信、缺乏主见,甚至引发他们的焦虑和自卑感。

(三) 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由表4可得,高职生的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过分干涉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意味着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与父亲过分干涉水平越高,其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

四、结论

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高职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高职生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当前的应试教育导致社会、学校和家庭还普遍存在“以学习成绩论成败”的现象,这让文化课基础薄弱的高职生感到不被认可,体验到挫败感,从而引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要想提高高职生的自我效能感,父母需要调整教养方式,摆脱以成绩论好坏的思维,注重情感教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投入更多的耐心、关心,在生活学习上给与足够的空间,多鼓励孩子,当他们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高职院校应根据学生的特点结合自己学校的优势,着重培养高技能型专业人才,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轻松的实践氛围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其次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和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通过管理情绪,学会为自己的失败经历正确归因来提高自我效能感,也进一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从而完善自己,提高心理素质;还可以多开展社会实践,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的自信。

当然这次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样本单一,都来自安徽的几所高职院校,不能代表所有高职生群体,统计方法也不够全面等。

参考文献:

[1] 陈玉珠,初中生自我效能感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J]. 社会心理科学.2013,28(5):69-73.

[2] 金引丽,桂守才.一般自我效能感研究综述[J]. 淮北职业技

- 术学院学报.2014,13(2):33-34.
- [3] 侯永梅,郑江敏.医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4,13(1):70-72.
- [4] 王才康,胡中锋,刘勇.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应用心理学.2001,7 (1): 37-401.
- [5] 岳冬梅,李鸣皋,金魁和,等.父母教养方式的初步修订及其在神经症患者的应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7(3):97-143.

(责任编辑:张文静)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effic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WEI Ting, WANG Donghua, TIAN Rong

(Students' Affairs Division, Anhui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Technology, Wuhu, Anhui 241002)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effic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study selects the parenting 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to conduct 318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6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Anhui Province. test.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obvious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of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the father's refusal to deny, and the mother's preference for the subject and self-efficacy;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of severe punishment by father,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father, excessive interference of father, refusal of denial by mother and severe punishment by mother; (3) the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of father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xcessive interference of fathers,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of mothers' emotions Mother overprotection and interferenc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fficacy; (4) the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of mot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excessive interference of fathers hav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self-efficacy. Therefore, the parenting styl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elf-efficac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parenting style, self-efficacy, correlation

基于 EGP 和 ESP 学习策略的比较研究

陈紫娟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系, 福建 南平 353000)

摘要:以 158 名 EGP 和 156 名 ESP 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 Oxford 语言学习策略量表对被试学习策略进行调查。将问卷和被试成绩输入 SPSS23.0 中,用 t 检验对比、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发现,EGP 和 ESP 学生在学习策略使用方面有显著差异($p < 0.05$),两类学生策略之间呈正相关($r > 0$);策略和成绩呈显著差异($p < 0.05$),EGP 进入方程的策略是元认知策略和记忆策略,ESP 进入方程的策略是认知策略。这表明,元认知策略是影响 EGP 学生成绩的主要因素,而影响 ESP 学生成绩的主要因素则是认知策略。

关键词:EGP;ESP;学习策略;学习成绩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098-07

2017 年,教育部颁布新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明确指出:“英语教学在注重发展学生通用语言能力的同时,应进一步增强其职业英语交流能力,以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专业学习和职业岗位等不同领域或语境中能够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流。”由此可见,高职教育向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迁移,通用英语教学将不再是英语教学的主要任务,而是以通用英语(EGP)和专门用途英语(ESP)并驾齐驱的教学模式。

高职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差,虽有少数学生能使用通用英语对一般性的话题进行讨论,但涉及具体学科领域时,仍无法解决专业性问题。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学生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水平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难点。Ellis^[1]在研究中发现学习策略是影响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策略的使用对英语学习和教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EGP 和 ESP 学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授课内容、要求和教学环境也不尽相同,因而在学习上采用的策略也大相径庭,针对两种不同学习任务采用合适的学习策略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

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因此,本研究对 EGP 和 ESP 学生使用学习策略有何差异进行比较,以期提高学生成绩刻不容缓。

一、文献综述

(一)EGP 和 ESP 的定义

EGP 是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 的缩写。夏丽^[2]认为通用英语是一门英语语言课程,不受任何地域、任何因素和任何职业的影响,任何人都应掌握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基本语言技能,掌握语言的共核。文秋芳^[3]认为通用英语没有涉及特定的领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人都应了解的知识范畴,并能满足人的普遍交际需求。

ESP 是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的缩写。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重要性越发突出。英语不仅用于人们的日常交流,而且在专业领域上也被广为运用。正如刘润清所预测的专门用途英语的学习在高职院校将成为一种潮流。1964 年, Halliday 在《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一书中首次提到了专门用途英语这一概念。Strevens^[4]认为 ESP 应用于某个专业学科,是英语教学的一个分支,而另一个成员是 EGP。Robinson^[5]认为 ESP 是一个涉及教育、培训和

收稿日期:2019-10-11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高校外语教改科研专项(JZ180110)。

作者简介:陈紫娟(1988-),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

实践的事业,它汲取了三个主要的知识领域:语言、教育学和学生的专业领域。Robinson 侧重于实践,对 ESP 定义的理解更为宽广。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Naddabi^[6]通过描述统计法对 EAP 和 ESP 学生采用的学习策略进行对比时发现,ESP 学习中学生使用最多的是补偿策略 (3.50),最少使用的是情感策略 (2.75);EAP 学习中学生使用最多的也是补偿策略 (3.46),而使用最少的却是认知策略(2.58)。Yagoub 等^[7]选取 40 名 GEP 学生为受试,其中 20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另 20 名学生作为实验组接受了一个学期意象策略的培训。结果表明,实验组在英语词汇掌握方面要优于对照组。Tabatabaei 等^[8]发现 EFL 学生偏爱社交策略,而 ESP 学生偏爱认知策略。Afshar 等^[9]研究了 355 名 ESP 学生,发现他们使用最频繁的是补偿策略 (2.04),最不频繁的是情感策略(1.64);ESP 学生成绩和学习策略呈正相关($r=.14, p<0.05$)。

汪蓓^[10]选取的受试对象是实验组(网络班)和控制组(普通班)的学生,用 SPSS 分析两组的平均分,发现网络班使用策略的频率更高。陈红娟^[11]通过描述性统计法进行分析,发现 EGP 和 ESP 学生最常用都是视觉重复策略($M=4.1542, M=4.0542$)。EGP 学生最少使用语言编码策略($M=2.5087$),而 ESP 则是文字编码策略($M=2.4673$)。陈兆军等^[12]和郭晶晶^[13]对 ESP 学生使用策略调查时发现,他们最经常使用情感策略 ($M=3.419, M=3.217$);且郭晶晶^[13]用相关分析法发现,学习策略和成绩呈正相关($r>0, p<0.05$)。催国森^[14]用 t 检验对 EGP 和 ESP 学生使用词汇学习策略进行对比,发现两类学生都较少使用元认知策略;对比均值和标准差发现,EGP 学生策略种类的使用低于 ESP 学生 (EGP5 种,ESP8 种)。而张萍^[15]运用 SAS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时却发现,EGP 学生策略的使用高于 ESP 学生 (EGP15 种,ESP9 种),即两位学者在此研究的结果恰好相反。

笔者将“EGP”“ESP”“学习策略”等关键词输入知网发现,2015-2019 年关于 EGP 和 ESP 学生学习策略对比研究发展稍加滞后。且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只对一个学习对象使用的策略进行研究;如将两类学生放在一起研究,受试对象是 EGP 和 ESP 的

较少;即使研究对象是 EGP 和 ESP 学生,也集中在词汇学习策略的比较。因此,笔者选取 EGP 和 ESP 为受试,对两类学生使用策略有何不同进行对比(不放在词汇策略上),以期提高学生策略使用频率和效度,进而提升学生英语习得水平,并为高职教师的教改提供借鉴。

二、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 (1)EGP 和 ESP 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性是什么?
- (2)EGP 和 ESP 学生使用策略之间呈现正相关吗?采用的策略和学习成绩有显著差异吗?
- (3)学生在 EGP 和 ESP 学习中进入的线性回归方程的策略有何不同?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

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受试从福建某高职院校随机抽取 320 名大一学生,EGP 学生 162 名(广告、物流和建筑专业),ESP 学生 158 名(商务英语、旅游管理和计算机)。对他们分别开设了一学年的通用英语课程(大学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商务英语、旅游英语和 IT 英语),且 EGP 学生在通用英语课程结束后,不再学习此课程。因此,这 320 名大一学生均有很好的代表性。

2.研究工具

(1)问卷。本研究采用 Oxford 语言学习量表。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籍贯;第二部分为学习策略问卷,共 50 题,分为 6 个部分,分别是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策略的回答以李克特 5 级分类法划分(1-5)，“完全或几乎不适合”(1)到“完全或几乎完全适合”(5)。

(2)测试。EGP 学生所测试卷采用全国高等学校应用能力 B 级考试卷(PRETCO-B),而 ESP 所测试卷是从 BEC 初级、杨华主编的《实用旅游英语》、任军站主编的《计算机英语》及该校特色校本教材(根据各专业特点编写)中选取。经过校内外多名英语教师反复检测和实验,EGP 和 ESP 试卷的难易程度基本一致,以尽可能保证数据结果的可信度。

(三)数据收集和分析

问卷发放 320 份,回收 320 份,有效问卷 314 份(158 份由 EGP 学生完成,156 份由 ESP 学生完成),有效率 98%。所有测试卷由笔者亲自监考和批改,问卷统一在课堂上完成,受试者根据自己策略使用情况勾选数值,勾 1 计 1 分,勾 2 计 2 分,以此类推。将所得数据输入 Excel,运用 SPSS23.0 进行分析。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比 EGP 和 ESP 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性。运用相关分析法对比 EGP 和 ESP 学生使用策略间及策略和成绩相关性。采用回归分析来对比两类学生线性回归方程有何不同。

三、研究结果

(一)EGP 和 ESP 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性

为了对比两类学生使用策略的差异性,笔者将 314 份问卷数值录入 Excel 表,再运用 SPSS 分析,结果如表 1、2。

表 1 EGP 和 ESP 学生策略使用情况

Tab.1 Strategies used by EGP and ESP students

| | EGP | | ESP | | T 值 | 显著性 |
|-------|--------|--------|--------|--------|---------|------|
|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 |
| 记忆策略 | 2.2532 | .54344 | 3.0997 | .65394 | -8.826 | .000 |
| 认知策略 | 2.2233 | .46969 | 3.1960 | .63403 | -10.911 | .000 |
| 补偿策略 | 2.7068 | .69400 | 3.3419 | .64572 | -5.935 | .000 |
| 元认知策略 | 2.1660 | .54604 | 3.1496 | .82233 | -8.818 | .000 |
| 情感策略 | 2.3671 | .59818 | 3.0449 | .73839 | -6.315 | .000 |
| 社交策略 | 2.2637 | .57339 | 3.2628 | .82157 | -8.845 | .000 |

表 2 成绩情况

Tab.2 Achievements

| 学习对象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的标准误 | t | Sig. | |
|------|-----|--------|---------|--------|--------|------|
| | | | | | (双侧) | |
| 成绩 | EGP | 55.373 | 13.3643 | 1.5036 | -6.850 | .000 |
| | ESP | 72.083 | 17.0064 | 1.9256 | -6.840 | .000 |

表 1 表明,EGP 和 ESP 学生在 6 类学习策略上的 t 值显著水平为 0.000(p<0.05),表明两类学生在 6 类策略上具有显著性差异,ESP 学生对 6 类学习策略使用的频率显著大于 EGP 学生。表 2 表明,EGP 和 ESP 学生在成绩上的 t 值显著水平为 0.000(p<0.05),表明两类学生在成绩上具有显著性差异,且 ESP 学生学习成绩(M=72.083)也显著优于 EGP 学生(M=55.373)。此外,两类学生策略使用相似处在于都是补偿策略的使用频率最大(M=2.7068,M=3.3419),而不同之处在于 EGP 学生最少使用的是元认知策略(M=2.1660),而 ESP 学生最少使用情感策略(M=3.0449)。

(二)6 类策略之间、策略和成绩的相关性

为了研究 EGP 和 ESP 学生使用策略间、策略和成绩的相关性,本部分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表 3、4、5。

表 3、4 表明,两类学生策略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0, p<0.05)。EGP 学生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相关性最高(r=0.768);ESP 学生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相关性最高(r=0.799)。

表 3 EGP 策略间相关性

Tab.3 Correlation between EGP strategies

| | | 记忆策略 | 认知策略 | 补偿策略 | 元认知策略 | 情感策略 | 社交策略 |
|-------|-------------|--------|--------|--------|--------|--------|--------|
| 记忆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1 | .654** | .399** | .655** | .574** | .437** |
| | 显著性(双侧)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认知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654** | 1 | .424** | .768** | .472** | .552**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 .000 | .000 | .000 | .000 |
| 补偿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399** | .424** | 1 | .321** | .421** | .410**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 .004 | .000 | .000 |
| 元认知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655** | .768** | .321** | 1 | .632** | .646**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004 | | .000 | .000 |
| 情感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574** | .472** | .421** | .632** | 1 | .572**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000 | .000 | | .000 |
| 社交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437** | .552** | .410** | .646** | .572** | 1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表 4 ESP 策略间相关性

Tab.4 Correlation between ESP strategies

| | | 记忆策略 | 认知策略 | 补偿策略 | 元认知策略 | 情感策略 | 社交策略 |
|-------|-------------|--------|--------|--------|--------|--------|--------|
| 记忆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1 | .789** | .471** | .730** | .672** | .700** |
| | 显著性(双侧) |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认知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789** | 1 | .596** | .767** | .709** | .758**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 .000 | .000 | .000 | .000 |
| 补偿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471** | .596** | 1 | .590** | .527** | .528**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 .000 | .000 | .000 |
| 元认知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730** | .767** | .590** | 1 | .799** | .743**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000 | | .000 | .000 |
| 情感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672** | .709** | .527** | .799** | 1 | .785**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000 | .000 | | .000 |
| 社交策略 | Pearson 相关性 | .700** | .758** | .528** | .743** | .785** | 1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表 5 表明,EGP 和 ESP 学生 6 类学习策略和成绩均呈显著正相关($r>0, p<0.05$)。不论是哪类学生,补偿策略和成绩相关性都最低($r=0.233,0.478$)。

(三)学习策略和成绩的回归结果

6 类学习策略哪些是影响成绩的主要因素,以及策略和成绩存在怎么样的线性模型关系,此部分将用

回归分析法,得出表 6、7。

表 6 表明,6 类学习策略预测成绩时,进入回归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 2 个,多元相关系数为 0.669,决定系数(R^2)为 0.447,亦即 2 个变量能联合预测成绩 44.7%的变异量。从每个变量预测力的高低来看,对成绩最具预测力的为元认知策略,其解释变异量为

表 5 策略和成绩的相关性

Tab.5 The relevance between strategies and achievements

| | | 记忆策略 | 认知策略 | 补偿策略 | 元认知策略 | 情感策略 | 社交策略 |
|----|-------------|--------|--------|--------|--------|--------|--------|
| 成绩 | Pearson 相关性 | .580** | .534** | .233* | .631** | .422** | .406**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039 | .000 | .000 | .000 |
| | N(EGP)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 成绩 | Pearson 相关性 | .537** | .688** | .478** | .554** | .509** | .584** |
| | 显著性(双侧)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 N(ESP) | 156 | 156 | 156 | 156 | 156 | 156 |

表 6 EGP 学生使用策略和成绩的回归结果

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EGP students in us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scores

| 选出的变项顺序 | R | R ² | R ² Δ | F 值 | FΔ | B | Beta | T | 显著性 |
|---------|------|----------------|------------------|--------|--------|--------|------|-------|------|
| 1.元认知策略 | .631 | .398 | .398 | 50.887 | 50.887 | 10.743 | .439 | 3.890 | .000 |
| 2.记忆策略 | .669 | .447 | .049 | 30.718 | 6.750 | 7.209 | .293 | 2.598 | .011 |

表 7 ESP 学生使用策略和成绩的回归结果

Tab.7 Regression results of ESP students in us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scores

| 选出的变项顺序 | R | R ² | R ² Δ | F 值 | FΔ | B | Beta | T | 显著性 |
|---------|-------|----------------|------------------|--------|--------|--------|-------|-------|-------|
| 1.认知策略 | 0.688 | 0.473 | 0.473 | 68.295 | 68.295 | 18.453 | 0.688 | 8.264 | 0.000 |

39.8%。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EGP学生回归方程为:成绩=0.439*元认知策略+0.293*记忆策略。

表7表明,6类学习策略预测成绩时,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1个,多元相关系数为0.688,决定系数(R^2)为0.473,亦即1个变量能联合预测成绩47.3%的变异量。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ESP学生回归方程为:成绩=0.688*认知策略。

四、讨论

(一)EGP和ESP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性是什么?

ESP学生学习策略使用的频率显著大于EGP学生,成绩($M=72.083$)也显著优于EGP学生($M=5.373$),这与催国森^[14]研究结果一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EGP学生处于三线城市,外国人少,几乎无需使用通用英语习得的日常交际进行交流,且他们认为通用英语的习得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徒劳无益,故使用学习策略频率不高,对英语的学习花时少,认真度不高。而ESP学生习得的是与本专业相关的英语,此类英语不仅融合了其他相关课程,还起到促进作用;同时,ESP学生对专门用途英语的学习意识性更强,认为此英语的习得对今后的工作大有裨益。

两类学生在补偿策略的使用频率最大($M=2.7068$, $M=3.3419$),这与袁凤识^[10]调查结果不同。受试者为高职院校学生,他们的英语功底弱,碰到不太熟悉的词只能猜测它的含义。由于单词的匮乏,在英语交流中,有时只能借用手势来表达抑或用相近词和短语来代替。EGP学生最少使用的是元认知策略($M=2.1660$),而ESP学生最少使用情感策略($M=3.0449$)。元认知策略的实质是利用认知过程的知识去把控成绩,EGP学生认为通用英语学无所用,学习最终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挂科,无较强的学习目的性,无法对学习进行计划、监控和检查。此外,笔者对ESP被试者个人信息中的性别做了观察,发现ESP学生情感策略使用频率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是男性,情感没女性丰富,对情绪把控性较低,焦虑感弱,因而较少使用该策略。

(二)EGP和ESP学生使用策略之间呈现正相关吗?采用的策略和学习成绩有显著差异吗?

两类学生策略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0$, $p<0.05$),说明一种策略的使用会影响另一策略,亦即一种策略能更好地融合和促进其他策略的使用。EGP学生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相关性最高($r=0.768$)。认知策略是对知识的处理和调控,而元认知策略就是运用在认知过程的知识去把控成绩。EGP学生学习目的性不强,对知识的处理和把控性弱必将影响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从而影响成绩;ESP学生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相关性最高($r=0.799$)。由于ESP学生大部分是男性,情感不易控制,元认知策略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把控性,可以减少他们学习中的盲目性、冲动性。

EGP和ESP学生6类学习策略和成绩均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这与Griffiths^[17]和黄蕾^[18]研究结果一致。2011年我国新《英语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是英语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可见,策略的形成和使用已成为英语学习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习策略使用的差异会直接影响成绩的高低,无论是EGP还是ESP学生都需使用策略来引导学习,进而提高英语水平。此外,补偿策略在两类学习中使用频率最高,但与成绩的相关性最低。虽然学生用其他方式(猜单词意思、借用手势表达、用相近词等)去弥补学习上不足,但这些方式只会让他们停留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而放弃了对新单词、新知识的挖掘和提升,最终无法提高成绩。

(三)学生在EGP和ESP学习中进入的线性回归方程的策略有何不同?

1.成绩=0.439*元认知策略+0.293*记忆策略

从以上回归方程得知,元认知策略是影响EGP学生成绩的主要因素,这和蒋红^[19]研究结果一致。孔文、李清华对元认知和认知策略和成绩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元认知策略可用于不同领域,而认知策略只用于某一任务或某一领域。本研究中EGP受试者是从学习通用英语的班级随机抽取3个(广告、物流和建筑),他们专业涉及不同领域。元认知策略能高效地对他们学习目的、学习规划和学习方法进行调整,提高学习意识,使学生能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估整个学习过程。因此,EGP学生需加强元认知策略的使用频率和

效度,从而提高英语水平。此外,笔者还发现,在研究问题一中,EGP 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的频率最低 ($M=2.1660$),而元认知策略又是影响成绩的主要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EGP 学生成绩平均分普遍偏低 ($M=55.373$)。

2. 成绩=0.688* 认知策略

从以上回归方程得知,影响 ESP 学生成绩的主要因素则是认知策略,这与 Omid 等^[20]研究的结果一致。ESP 受试者分别来自商务英语、旅游管理和计算机专业,他们学习的分别是商务英语、旅游英语和计算机英语,即在认知策略应用下某一特定任务的学习。认知策略包含目标语言使用、重复、记笔记、翻译、阅读、归类等,涵盖了专门用途英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而言,如不能提高此策略的使用,就无法在商务谈判和日常事务上应对自如。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而言,如不能提高此策略的使用,就无法接待外国来的游客,也无法带团到外国旅游。对计算机专业学生而言,如不能提高此策略的使用,就无法看懂英语计算机术语进行编程。目前,ESP 学生使用认知策略的频率处于中等水平($M=3.1960$),应进一步增强此策略的使用频率,让学生知晓此策略的使用还能与其他专业课程相融合,进一步促进专业课的学习。

五、结论

通过对 EGP 和 ESP 学生使用的学习策略进行对比,可得出以下结论:

1. ESP 学生策略的使用频率多于 EGP 学生,成绩也优于 EGP 学生;EGP 和 ESP 学生使用频率最大的都是补偿策略。EGP 学生使用最少的是元认知策略,而 ESP 学生则是情感策略。

2. 两类学生策略之间、策略和成绩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补偿策略和成绩相关性最低。

3. 影响 EGP 学生成绩的主要因素是元认知策略,而影响 ESP 学生成绩的主要因素则是认知策略。

如何根据不同任务下(EGP 和 ESP)学习的学生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提高英语学习效率,进而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笔者提供以下几点建议:

1. 强化学习策略的培养。高职学生对学习策略没有详尽的了解,他们只是根据自身喜爱去选择某一策略。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解说每一类策略的含义、相关性及策略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加强策略地培养和训练,提高策略的使用率。

2. 不同任务下(EGP 和 ESP)的学习选择不同的策略。教师应根据不同类型学生培养不同的学习策略。对于 EGP 学生,重视元认知策略地培养,指引学生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计划,培养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能力。对于 ESP 学生,重视认知策略地培养,不断完善学习步骤和方法,增强对信息的处理和调控能力,提高专门用途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3. 激发 EGP 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习兴趣。教师应激发 EGP 学生的学习动机,让他们知晓通用英语是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技能,对日后的生活和工作益处颇多(与外国客户交流和出国旅游之用等)。另外,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摒弃传统的教学,采用新型的信息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进而不断提升学生英语水平。

参考文献:

- [1] 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 542.
- [2] 夏丽. EGP 与 ESP 相结合教学的势在必行及教学模式创新[J].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13, 4(2): 44-46.
- [3] 文秋芳. 大学英语教学中通用英语与专用英语之争: 问题与对策[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4(1): 1-8.
- [4] STREVEN P. ESP after twenty years: a re-appraisal. In M. tickoo (Ed.), ESP: state of the art[M]. Singapore: SEAMEO regional center, 1988: 42.
- [5] ROBINSON P. ESP today: a practitioner's guide [M]. 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1991: 1.
- [6] ZAKIYA A. N. ESL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repertoires in EAP and ESP contexts perceived success and pedagogical mediation [D]. Ottawa: School of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Canada, 2006.
- [7] YAGOUR Z, MORTAZA A. The impact of imagery strategy on EFL learners' vocabulary learning [J].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69): 2264 - 2272.
- [8] TABATABAEI O, HOSEINI H. EFL and ESP learners' use of

-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a study of collocations[J].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2014(1):112-120.
- [9] AFSHAR H,SOHRABI S,MOHAMMADI R.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ranian ESP learners' learning strategy use, learning styles and their English language achievement[J].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5(192):724-729.
- [10] 汪蓓.网络教学模式与非网络教学模式学生词汇学习策略对比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0,21(4):87-89.
- [11] 陈红娟.高职高专学生第二语言 EGP 和 ESP 词汇策略比较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15.
- [12] 陈兆军,周永清.专门用途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调查研究:以旅游专业英语为例[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28(5):102-106.
- [13] 郭晶晶.专业英语学习中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的关系:以英语教育(学前方向)专业为例[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33(2):74-78.
- [14] 催国森.非英语专业学生与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策略对比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8,34(8):78-81.
- [15] 张萍.硕士研究生基础英语和专业英语词汇学习策略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3(6):442-449.
- [16] 袁凤识,刘振前,张福用.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差异研究[J].外语界,2004,103(5):25-32.
- [17] GRIFFITHS C.Patterns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use[J].System,2003(3):367-383.
- [18] 黄蕾.高中学生性格、英语学习策略、英语学习成绩三者关系的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2.
- [19] 蒋红.网络自主学习中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与学业成绩的元分析[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9(3):30-34.
- [20] OMID T,HOURIEH-SADAT H.EFL and ESP learners' us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a study of collocations[J].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4(1):112-120.

(责任编辑:陈 果)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ased on EGP and ESP

CHEN Zijuan

(Department of Art Design,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In this study, 158 EGP and 156 ESP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nd Oxford's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the subjects. The questionnaires and the scores of subjects were fed into SPSS23.0 and analyzed by t-test,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etween EGP and ESP students ($p < 0.05$).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strategies ($r > 0$),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rategies and achievements ($p < 0.05$). As for EGP, the strategies to enter the equation were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and memory strategies. As for ESP, the strategies to enter the equation were cognitive strategies. This shows that metacognitive strategy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EGP students, while cognitive strategy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ESP students.

Key words: EGP; ESP; learning strategies; achievements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翁委凡

(闽江学院 数学与数据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通过对 M 学院教学秘书的调查访谈,结合 M 学院的教学秘书队伍建设,以及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显著特点,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提出建立教学秘书与思想政治辅导员之间的常态沟通机制,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以及加大教学秘书队伍建设的投入等对策,有效提高教学秘书的工作质量,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运行,从而促进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秘书;教学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2-0105-05

应用型本科高校,主要面向高校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以本科教育为主,以学科为依托,以应用型专业教育为基础,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为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供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的高等院校。^[1]长期以来,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以教学环境的改善与应用型师资及双师型人才的引进^[2]为突破口,而对教学管理队伍的科建设重视不够,尤其是基层教学秘书队伍。教学秘书,作为教务管理部门与师生之间的桥梁,直接服务于教育管理一线,在促进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管理质量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目前,国内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秘书在开展教学管理工作时,尚无完善的、科学的工作体系可循,缺乏学科支撑,而主要依靠老带新式的经验传授与自身的经验积累。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学生也随之呈现出新特点,尤其是自我中心意识强烈、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显著特点,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管理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教学秘书队伍的建设带来新的挑战。

一、以 M 学院为例分析教学秘书队伍的现状

笔者以 M 学院为例,调查对象为 17 个二级学院(部)的 31 位教学秘书,发放调查问卷 31 份,回收 31 份。根据对问卷的统计分析和对一些教学秘书进行的访谈,发现当前教学秘书队伍建设存在不少问题,调查情况统计详见表 1。

第一,女性占绝大多数,且年轻教学秘书呈现出了一定的流动性。教学秘书岗位要求从业者严谨细致、善于沟通协调,而女性在这方面具备先天优势,因此,历年来各学院的教学秘书均以女性为主。另外,35 岁以下的教学秘书占总人数的 58%,且超过一半的教学秘书工作年限在 3 年以下。据了解,近一年来有 6 位教学秘书工作一年即辞职或调岗。

第二,教学秘书队伍学历以本科和硕士为主,但是专业相关度较低,且缺乏系统的岗前培训。根据 M 学院近 3 年的招聘要求,新入职的在编教学秘书要求硕士以上学历,非在编人员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对于

收稿日期:2019-06-05

作者简介:翁委凡(1987-),女,汉族,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研究。

专业的要求均设置为不限。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员都是“先上岗、再培训”,缺乏系统的岗前培训。即使是专业相关度较低的新入职教学秘书,也只能直接上岗后通过“老带新”的方式熟悉业务流程,并在业务操作中慢慢摸索积累经验。系统性岗前培训的缺失,使得新入职教学秘书无法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第三,岗位编制有限,职称评定较难,晋升空间受限。M学院的教学秘书队伍中在编仅11人,各二级学院(部)的编制平均人数少于1人。其次,新入职教学秘书在工作一年后,年度考核合格即可获得初级职称。尚无职称的人员是6位工作未满1年的补缺型新入职教学秘书。中级职称重在考察业务能力,大部分教学秘书通过工作经验的积累,可以获得中级职称。但高级职称的评定对科研业绩的要求较高,而教学秘书受工作性质的限制,较难在科研领域有所突破,因此高级职称的比例很少。2位高级职称人员中,有1位是通过之前在中学任教获得的中教高级职称转聘的。非在编人员进行职称晋级后工资绩效涨幅较小,导致动力不足,再加上平时工作繁琐,无暇开展科研或论文撰写,所以大部分人员仍是初级职称。另外,相比辅导员队伍完善的晋升体系,教学秘书队伍很难获得相关岗位的晋升,晋升空间受限。渴望晋升的教学秘书只能转岗,导致队伍的人员流动性大。访谈中,除2位高级职称的人员外,其他在编人员均表示出了调整岗位的意见。

表1 M学院教学秘书基本情况统计表

| Tab. 1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teaching secretary in M university | | | |
|---|-------------|-------------|---------------------|
| 性别 | 男:2人 | 女:29人 | |
| 年龄 | 20-29:7人 | 30-34:11人 | 35-39:7人 40以上:6人 |
| 学历 | 本科以下:1人 | 本科:13人 | 硕士:17人 博士:0人 |
| 从事岗位年限 | 1-3年:16人 | 4-6年:1人 | 7-9年:7人 10年及以上:7人 |
| 专业相关度 | 教学管理相关专业:4人 | 所在学院对口专业:8人 | 非教学管理、非所在学院对口专业:19人 |
| 编制情况 | 在编:11人 | | 非在编:20人 |
| 岗前培训方式 | 老带新:30人 | | 系统性培训:1人 |
| 职称 | 尚无职称:6人 | 初级:17人 | 中级:6人 高级:2人 |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 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显著特点给教学管理带来的新问题

大学生在心理上正处于“准成人”阶段,即正逐步成熟而又未完全成熟,受当前经济社会和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影响,身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上大学前较少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独立自主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无法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受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思想状况也由此呈现出显著特点,给教学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是自我中心意识强烈。随着学生家庭物质条件的逐渐丰裕,从小在家长宠爱及关注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常常以自我为中心。^[3]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当代大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功利意识随之加强,也越来越意识到个人权利,却较少注意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在与M学院教学秘书的访谈中,有多位教学秘书提到选课时,即使教学秘书再三强调时间节点,却仍会有若干学生没有按时选课,后又通过各种途径纠缠教学秘书要求选课。这些突发的额外权利诉求,不仅增加了教学秘书的工作量,也让教学管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难以为续。

二是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校园后,学生们突然开始独立面对生活,家长与老师不再太多参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规划。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及不适感。加之,信息化时代下,互联网已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4]互联网为学生的学习及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让部分学生沉迷于虚拟世界。让他们在面临挫折与失败时相对脆弱,无法及时地进行心理调适。每年的“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即旨在呼吁全社会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关注。个别学生在由于自身原因无法按时修完学分时,采取言语骚扰、社交媒体造谣、自残威胁等不恰当的方式表达不合理诉求,给教学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二) 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于2015年明

明确提出推动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5]可见,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教学管理制度的建设还存在诸多掣肘。一方面,教学管理的模式与方法还相对比较滞后,没有整合的管理系统,而是各部门分割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比如M学院设有教师人事系统、实验实训管理平台、教务管理系统等多个系统,众多的资源无法整合,导致教师的职称、获奖情况或科研成果等信息需要多个部门反复采集。在业务归属上,有的同一业务却分割管理,例如:学生自行修读在线开放课程的学分认定由教学科负责,而该门课程成绩却由学务科登记。实践类课程的管理既归属于教学科,又由实践科负责。另一方面,原则性的制度内容过多,缺乏操作性的表述,学生面对这些制度时往往无从下手,只能向教学秘书寻求帮助。教学秘书常常忙于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无暇进行管理技术的创新。

(三) 队伍建设投入不足

传统的思想向来是重视教学科研,而对于管理工作不够重视,认为教学管理无非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性质简单,没有技术含量。^[6]因此,高校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往往将大量的精力集中在教学、科研工作上。M学院现有的31位教学秘书中,在编人员仅11人,非在编人员比例达到65%。且教学秘书的工作往往也得不到理解与支持。根据教育部令第43号文件精神,高等学校应按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但未对教学秘书的配比进行明确规定。结合学校教务处对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配备情况进行的统计和其他文献的数据^[7-8],各二级学院根据师生的数量规模一般配备1至2名专职教学秘书,配比约为1:500。M学院约1.8万名学生,教学秘书有31人,配比约为1:580。教学秘书的培训通常通过“老带新”的经验传授形式展开,而非系统性的专业化规范化培训。加之教育管理工作任务繁重,教学秘书在日常工作中疲于应付,无暇深入思考并创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与同样是行政人员的辅导员或机关工作人员相比,教学秘书职称评定困难,晋升空间狭小,加上工作的繁琐容易使其产生倦怠感,导致人员的流动性较大。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的对策

(一) 建立教学秘书与思想政治辅导员之间的常态沟通机制

新时期,大学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却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同时,由于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分别由教务处与学工部负责。两个部门的大部分工作相对独立,缺乏相互沟通与配合。在面对选课与学生管理一系列的教学管理工作时,频频发生各种突发状况。有在选课期间无动于衷却在报名截止之后四处奔走的,有在挂科后电话“轰炸”任课老师的,有在大四临毕业时才发现漏选课程的,更有部分学生对自身的毕业学分要求漠不关心影响正常毕业的。遇到各种情况时,他们往往会不知所措,教学秘书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去弥补这些学生的失误。

面对新时期的大学生,针对他们思想状况的新特点,教学秘书需主动作为,建立与思想政治辅导员之间的常态沟通机制,加强沟通协调。辅导员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他们更容易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班上学生的特点。因此,在展开一些比较重要的教学管理工作时,教学秘书通过与辅导员沟通,如定期向辅导员报送“学务事项周安排表”,列明每周各项学生事务工作的时间节点,从而让辅导员能够关注学生近期是否及时完成相关工作。一方面通过平时的班会或年级大会,辅导员可以跟班委或学生强调相关工作的截止时间,也针对班上个别忘性较大、做事马虎或对学业不甚上心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提醒,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遗漏相关事项。另一方面,教学秘书应及时向辅导员更新学生的学习情况,包括每学期的学生不及格率、每学年的学业预警、以及毕业班学生的学分修读情况等,让辅导员可以根据学生的新情况及时进行沟通指导,促进学生自省改进,从而共同营造良好的学风纪律,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以M学院下设的数学院为例,2017—2018学年及之前学年的各项学务工作中总有一些学生忘记报名;而自2018—2019学年第一

学期起,辅导员与教学秘书建立了常态沟通机制,学生的事务工作如选课、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等完成率达到了100%,有效地避免了因个别学生错过报名时间而带来的一系列恶性循环。

(二)完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管理制度

应用型本科高校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构建科学的教学管理制度对提高院校运行的有序性,推动院校的内涵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应用型本科高校应根据教学管理工作中的各主体的职权划分及岗位工作规范作出具体的规定,从而让教学管理工作人员,特别是对实操性要求较高的教学秘书,在面对具体工作时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其次,遵循应用型本科高校注重应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并根据教学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不断创新管理制度。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科研课题立项等应及时根据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调整。再次,改变教学秘书在常规工作中依靠个人经验等进行管理的落后做法,以信息论、决策论、控制论等科学方法为依托,尤其依靠不断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展开工作。通过相关制度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包括违规行为的处理与纠正。

(三)加大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的投入

教学秘书作为最基层的教学管理人员,同时扮演着管理者与服务者的双重角色,贯穿于教学管理工作的始末。因此,加大对教学秘书队伍建设的投入,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在教学管理中的作用,从而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1.严把“入口关”,选聘优秀的教学秘书队伍

教学管理的工作特性要求教学秘书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主动的服务意识;具备高等教育管理学及心理学相关理论素养,掌握行政管理学、档案管理、应用文写作等基本的秘书专业知识,熟练计算机实用操作;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能够在繁杂的工作事务中学会心理调适;而且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开拓创新。^[9]

2.加强培训,优化专业化结构

一是进行系统性的岗前培训。对于新入职的教学秘书,务必针对岗位性质及职责进行集中培训,有助

于相关人员尽快熟悉工作环境,更早进入工作状态。二是实现技能培训常态化。通过定期的集中培训及研讨班,让教学秘书解放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不断吸收借鉴最新的教育管理理念,适时地总结与调整,提升自身业务素质。三是设置相应的岗位进修计划,鼓励教学秘书等一线教学管理人员通过进修提升自己,从而不断提高教学秘书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对M学院31位教学秘书进行问卷调查中发现,有24位教学秘书在意见建议中提到,希望学校多提供培训机会,建议学校通过定期开展学习研讨班等方式让教学秘书能够在学习中提升职业素养。

3.完善教学秘书岗位的考核及晋升机制

可以参考教师教学竞赛等活动,定期开展教学秘书业务水平评比活动,通过奖励政策提高教学秘书的工作积极性。同时,深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职务晋升机制,让教学秘书通过良好的工作表现获得晋升,从而提高工资待遇等。通过更加丰富的激励措施,让教学秘书岗位不再是一潭死水,从而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到教学秘书的岗位中来。M学院的31份问卷调查中,有9份提到,希望能像教师或辅导员队伍那样,每年度举办教学秘书队伍考核,评选出“优秀教学秘书”。另外,21位教学秘书提出希望在职称评定上能考虑教学秘书的工作特点,在学术要求及工作表现考察上进行更合理的设置,完善教学秘书队伍晋升渠道。

应用型本科高校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与转型重塑的关键时期,其教学管理队伍中的教学秘书在促进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发展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用型本科高校应把教学秘书队伍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本文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管理的特殊性,研究教学秘书与思想政治辅导员之间的常态沟通机制,并提出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以及教学秘书岗位考核与晋升机制的建议,辅助教学秘书有针对性地提高业务素质,从而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学秘书队伍,夯实高校教学管理队伍,为学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提供组织保证。

参考文献:

- [1] 王景丽.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

- 究: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J].中州大学学报,2017,34(5):116-120.
- [2] 陈莉. 创新创业教育视域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探析[J]. 教育与职业, 2019, 934(6):66-69.
- [3] 范登峰. 高校院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探索[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0.
- [4] 刘静. 当代大学生思想状况问题、成因及变化趋势研究: 以安徽农业大学为例[D].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2013.
- [5] 王一迪, 柳音. 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政策的解读及对策、建议[J]. 考试周刊, 2017(74):143-144.
- [6] 冯方盛, 刘吟. 地方高校教学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1(3):59-61.
- [7] 肖康舒. 高校教学秘书队伍的现状与思考[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 35(12):159-161.
- [8] 张文艳. 新形势下高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研究: 以浙江财经大学为例[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9):36-38.
- [9] 徐新丽, 杨江帆. 新建本科高校教学秘书的工作特性及素质要求[J]. 武夷学院学报, 2017, 36(1):88-91.

(责任编辑:叶丽娜)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ecretary Tea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WENG Weifa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Data Science,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of the teaching secretary of M university,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ecretary team of M university and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stat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ecretary tea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establish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secretary and university counselor, improv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crease input in developing the ranks of teaching secretary. These counter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eaching secretary's work efficiency, ensure the teaching routine, and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eaching secretary; teaching management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No.2 Vol.39, Feb., 2020

- On Jianyang Bookshop Publishing in the Song Dynasty JIN Leilei(1)
- On Zhu Xi's View of the Monarch ZHOU Yanzhi(5)
- Interpretation 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uyi Traditional Dwellings LIN Chao(10)
- Practice the Path of Xi Jinping's Discourse on National Unity in the New Era CHEN Wei(16)
- Connotation, Logic and Practice: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Cultural Confidence WANG Jikun(21)
- Reasons for the Unstable Marriage of Floating Couple LIU Lin(26)
-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ntegrating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into Internet in Quanzhou
..... LIU Jiali, LV Jin, CHEN Yihua(32)
-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rime Number Theory to Criminal Judgment Documents Writing
..... ZHANG Amei(37)
- Under the Civil Code Compilation Regarding the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 Legal Remodeling
..... LI Jiao (43)
- On Presupposition of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and Stereotype of Target Audienc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 LIN Jiajia(49)
- An Investiga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Jangle Nanci TANG Jinbao(54)
-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on: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Factors of Mazu's Overseas Communication
..... LIN Jing(63)
- On the Advertising Language of Minbei Dail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 Dan(70)
- Spatial Patter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Travel Industry Perspective
..... WANG Guanghui(74)
- Research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WEI Jiasi(79)
- Analysis of Chinese Common Sayings in Intermediate Oral Teaching for Foreign Students
..... YANG Helan(85)
- Research on Autonomous Learning Strategies of Local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OC
..... LUO Jinying(90)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effic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 WEI Ting, WANG Donghua, TIAN Rong(94)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ased on EGP and ESP CHEN Zijuan(98)
-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ecretary Tea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WENG Weifan(105)